

# REMEMBRANCE

#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 《记忆》333期

## 目录

### 【思想文化】

2 辩证法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二）/王若水

### 【百年国史】

6 百年歌声：简析词曲中的近现代中国（二）/马昌海

——清末民初新式学堂中的歌声（下）

30 绘本特殊年代

——漫笔童年饥饿（1959--1966）（四）/墨娃

### 【评论】

38 对党内斗争的看法/吴忠

44 “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74）/李南央（美）

47 车厢速写——关中换粮/巴悌忠

附一： 1981年2月19日黄钢先生的回信

附二： 1981年2月26日编辑的回信

### 【述往】

49 竹海葱茏——童年记忆（四）/万润南（法）

59 我在内蒙兵团的经历（二）/张保和（美）

74 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七）/杜钧福

### 【资料】

85 反党分子迟群、谢静宜言论摘录（三）

清华大学材料组编（1976年11月16日）

### 【补白】

29 1981年8月4日的一通电话/李南央

###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 辩证法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二)

王若水

### 三、毛泽东继承列宁

毛泽东在 1937 年作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讲演时，他的主要参考书籍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哲学经典，而是当时苏联一些哲学家如米丁、西洛柯夫、爱森堡等人的著作。毛也参考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自从 1988 年国内出版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以后，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了。

《实践论》是讲认识论的，《矛盾论》是讲辩证法的。这两篇文章都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思想的解释和发挥。这个解释和发挥的功劳属于苏联哲学家；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增添。但是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写得冗长累赘，加上翻译的问题，读起来佶屈聱牙；毛泽东把这些著作中的精华加以集中和概括，又用通俗易懂的、形象的、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应该说他在普及化方面做了“贡献”。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所谓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而不仅仅是对立）。“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可以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而不单单是相互斗争，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由于继承了列宁，对“对立”和“斗争”不做区分。这样，毛泽东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也就肯定了斗争的普遍性。矛盾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因此斗争也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当毛泽东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时，他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斗争就没有世界。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毛泽东所说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党内出现政策和路线上的分歧，这当然是正常的，然而为什么一定要用“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呢？为什么不说“讨论”和“争论”呢？难道党内总是无穷无尽地“斗争”下去，党就可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吗？如果党内只有斗争而没有统一，党的生命能维持吗？

同样，由于继承了列宁，毛泽东也不说对立面的相互排斥和斗争是相对的，只是说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他依照苏联哲学家的观点，对“同一性”的含义作了如下的概括：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这个对矛盾同一性的概括并不完全。尽管它说矛盾的同一性和“一致性”“互相合作”是一个意思，可是这两种情形却没有把矛盾双方的和谐一致包括在内。

#### 四、《矛盾论》的矛盾

《矛盾论》着重阐述了这个由列宁提出的命题：斗争是绝对的，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它的论证。

在“矛盾诸方面的斗争性和同一性”这一节中，毛泽东说：事物的运动有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的状态（量变）和显著变动的状态（质变）。在第一种状态中，事物表现出的面貌是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等等；在第二种状态中，则表现出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等等状态的破坏。“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面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说同一性只存在于第一种状态中，不存在于第二种状态中，可是当他说斗争存在于两种状态中时，他的意思只能是这样；否则他说的同一性是暂时的就没有根据了。

可是，按照毛泽东在同一节里对“同一性”的定义，这个间只有两个含义：一是指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一是指矛盾双方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当毛泽东说同一性不存在于第二种状态时，他显然是从第一种含义来

说的。他的意思似乎是：当矛盾双方不再保持联合、团结的关系时，就没有第一种意义的同一性了。显然他把“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和“团结、联合”等看作是一回事。这里他犯了一个混淆概念的错误。是否敌对的矛盾双方就不是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了呢？

在下一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中，有一段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毛泽东说的“同一性”只是暂时的含义。毛说到炸弹在未爆炸时，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而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待到爆炸时就变成外部冲突了。同样，在人类历史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其实，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并不等于矛盾双方处于团结或联合的关系。

毛泽东在解释同一性的第一种含义时举例说：“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这种互相依存的情形，并不因为革命的爆发而消失。互相对抗的两个阶级仍然是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如果不是这样，对抗或革命又怎么可能呢？当然，剥削阶级可能被消灭，但它也是在社会中被消灭，不会存在于社会之外。那时，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同一性没有了，但它们之间的斗争性也没有了。

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建立过统一战线，联合在一起。当两党关系破裂时，双方不再共处于统一战线这个共同体中了，然而双方仍然共处于中国的环境中，双方还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不是一刀两断，从此天各一方，井水不犯河水。如果是那样，那么不仅是同一性没有了，连斗争性也没有了。

人类社会中，矛盾斗争的最激烈的例子莫过于战争。战争毫无疑问是对抗。那么，交战双方是不是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呢？毛泽东本人的军事著作已经给了回答。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的所有分析都是以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为基础的。在《论持久战》中，他谈到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前者是防御，后者是进攻，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谈道：“战争中的

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解决了战争的问题。”可见，他在这里也承认战争双方是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没有进攻就无所谓防御，没有防御也无所谓进攻。一方的胜利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对分析战争完全适用。

如果同一性的意思只是团结、联合、调和、均势，那么它的存在的确不是永久的。然而同一性是一个宽泛得多的哲学概念。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对抗只是矛盾的一种形式（因此不能说没有对抗的地方就没有矛盾）。他应当补充说：团结、联合也只是同一性的某种形式，不能说团结和联合的破裂就意味着同一性的消失；同一性仍然存在，只不过是采取了另外的形式罢了。

我们在这里只是讨论了同一性的第一种含义：如果谈到第二种含义，毛泽东的关于同一性的暂时性的论证也是不能成立的。在事物处于质变的状态时，正是矛盾双方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的时候。可是这种转化不正是同一性的第二种含义吗？

毛泽东强调同一性是需要条件的；难道斗争性就不需要条件吗？斗争要以同一性为条件；双方没有关系，是斗争不起来的。本文前面援引过恩格斯的话：“所有的两极对立，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为条件；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结之中，……”这就是说同一是对立的条件。《矛盾论》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这是对的。既然如此，如果同一性不存在（哪怕是暂时的），斗争性就没有地方可“离”，因而不能存在了。因此，同一性应当是始终伴随着斗争性的，不能说前者是暂时的，后者是非暂时的。在“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这句话之后，本来应当说“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这样才顺理成章。但毛泽东接下去却说“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样就和上一句不衔接了。为什么毛泽东不说“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呢？因为他想要论证，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因此就只能说同一性要以斗争性为条件，而不能说斗争性也要以同一性为条件。他没有意识到，当他说“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这句话时，实际上已经暗含同一性是斗争性的条件这个意思了。❷

【百年国史】

## 百年歌声：简析词曲中的近现代中国（一）

### ——清末民初新式学堂中的歌声（下）

马昌海

#### 五、学堂乐歌的主要题材及代表作

当时的“乐歌”题材非常广泛，有反君主专制、鼓吹民主革命、宣传妇女解放的；有呼唤民族觉醒、富国强兵、团结御侮、振兴中华的；有倡言破除迷信、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兴办实业的；有勉励敬业乐群、敦品力学、惜时爱物的；提倡体育锻炼、学习知识、反映学生生活的。其歌词内容，大多富于教育意义，对培养学生的优良品德起着积极作用。但清末的有些“乐歌”，在宣扬“修身”和“爱国”的同时，掺杂着一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识；有些“乐歌”在强调民族自尊的同时，流露出华夷之辨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 （一）“学堂乐歌”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宣扬“富国强兵，以御外侮”的爱国歌曲。

《祖国歌》李叔同词，据民间《老六板》曲调改编。<sup>1</sup>有音频：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千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身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在《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回忆儿时的唱歌》中忆及：“那时候的有志青年，大家忧心忡忡，慷慨激昂地发挥他们的爱国热忱。李叔同先生这歌曲便是在那时候作的（1905年），这歌曲在沪学会

<sup>1</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3页。

的刊物上发表之后，立刻不胫而走，全中国各地的学校都采作教材。我的故乡石门湾，是一个很偏僻的小镇，我们的金先生也教我们唱这歌曲。我还记得：我们一大群小学生排队在街上游行，举着龙旗，吹喇叭，敲锣鼓，大家挺起喉咙唱这《祖国歌》和劝用国货歌曲。”

《大中华》李叔同根据意大利作曲家 Bellinide 歌剧 Norma 第一幕第三场的《诺尔玛》乐队大进行曲填词。<sup>2</sup> 有音频：

万岁、万岁、万岁，赤县膏腴神明裔。地大物博，相生相养，建国五千余岁。  
振衣昆仑之巅，濯足扶桑之漪；山川灵秀所钟，人物光荣永垂。猗欤哉，伟欤哉，  
仁风翔九畿；猗欤哉，伟欤哉，威灵振四夷！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的国》李叔同词：<sup>3</sup>

东海东，波涛万丈红。朝日丽天，云霞齐捧，五洲唯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昆仑峰，缥缈千寻耸。明月天心，众星环拱，五洲唯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华》刘质平（李叔同高足之一，从事音乐教育60年）词曲：<sup>4</sup>

《中国国体》华航琛词<sup>5</sup>，曲调改编自【日】奥好义《勇敢的水兵》

中华民族震亚东，创造共和气象雄，永远民主一统国，追踪欧美表雄风。

《何日醒》，夏颂莱根据日本奥山朝恭谱曲的《樱井诀别》（一说《木南公》）曲调填词。<sup>6</sup> 收于沈心工1904年编写出版的《学校唱歌集》。全曲共八章。13

<sup>2</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9-20页。

<sup>3</sup> 载于1906年李叔同自编《音乐小杂志》。

<sup>4</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4页。

<sup>5</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6页。

<sup>6</sup> 选自沈心工编《学校唱歌集》1904年5月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24页。

岁的周恩来 1911 年在辽宁铁岭银冈书院就读时，非常喜欢这首当时流行的歌曲。

《鸦片烟》：

一朝病国人都病，妖烟鸦片进。呜呼吾族尽，四万万人厄运临。

饮吾鸩毒迫以兵，还将赔款争。上海闽粤，厦门宁波，通商五口成。

香港持相赠，狮旗猎猎控南溟。谁为戎首，谁始要盟，吾党何日醒。

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的原因：社会制度腐败，思想观念陈腐不堪，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落后。道光皇帝左右依违、和战不定以致全局被动。

《圆明园》：

江淮湖广红巾横，南疆方用兵。欧人乘吾衅，英法联军猝入城（广州）。生擒粤帅逼燕京，宫廷猛一惊。热河北狩（承德避暑山庄），仓促言和，奇羞城下盟。宫阙 que 灰飞烬，咸阳一炬劫圆明。内忧未已，外患迭乘，吾党何日醒。

这段歌词讲的是 1857—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江淮湖广红巾并非元末朱元璋领导的红巾军起义，而是借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粤帅是指时人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战，有林则徐的前鉴；和，则为琦善的下场。所以叶名琛就采取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对策？

《东海滨》：

斯拉夫族东趋猛，西比利亚平。黑龙江已定，黑鹫军旗列戍营。

诱吾边将缔新盟，重将界线评。乌苏里外，兴凯湖东，从今拔汉旌。

崴埠（海参崴）占形胜，东洋舰队一时成。引狼入室，揖盗开门，吾党何日醒。

这段讲的是沙俄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及兴凯湖东 10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行径。

《甲申》：

镇南关外风烟暝，南藩（越南）泣请兵。黑旗军（刘永福）犹整，上国援师远出征。法军舰队肆横行，吞舟跃巨鲸。宁波石浦，沪尾基隆，隆隆战炮鸣。鼓浪闽江进，兵轮船厂一时倾。自顾不暇，遑恤藩屏，吾党何日醒。

这段歌词讲述了 1883—1885 年中法战争的进程。

《甲午》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演唱视频：

风波蓦地潮流劲，扶桑杀气生。三韩初告警，舰队横飞陆队行。  
牙山黄海平壤经，烽烟辽海盈。金州旅顺，威海荣城，纷纷一掷轻。  
一旦辽东并，强俄德法猝缔盟。谁应吾请，谁为吾争，吾党何日醒。

这段歌词描述了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的进程。

《海军港》：

欧洲均势恒相競，风潮东亚侵。胶州先起衅，德国无端驻戍兵。  
大连旅顺让俄登，东清铁道成。广州湾口，威海卫城，相将隶法英。  
新界九龙订，三门湾又起纷争。河山锦绣，豆剖瓜分，吾党何日醒。  
这段歌词讲述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狂潮。

《义和团》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演唱视频

汽车电线中途梗，妖拳满燕京。教堂烧已尽，使馆围攻武卫营。  
大沽敌舰炮齐鸣，长驱八国兵。官庭鼎沸，惨杀横施，燕云市血腥。  
警报中宵紧，乘舆飞輶向西行。何以排外，何以交邻，吾党何日醒。

《东三省》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演唱视频

辽东半岛风云紧，强俄未撤兵。呜呼东三省，第二波兰错铸成。  
哥萨克队肆蹂躏，户无鸡犬宁。日东三岛，顿起雄心，新愁旧恨并。  
舰队连檣进，黄金山外炮声声。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

歌词讲的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沙皇俄国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军，企图将东三省变成第二个波兰（“黄俄罗斯”）的狼子野心及而后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

的，争夺在华权益的1904—1905年日俄战争。

《南洋公学院歌》创作于南洋公学成立后第二年（1897）。歌词由总教习张焕纶撰写，师范生张惕铭、姚立人、沈庆鸿（心工）等同谱宫调。

警！警！警！黑种奴，红种烬，黄种酣眠鼾未竟。毋依冰作山，勿饮鸩如酖，焚屋漏舟乐未央，八百兆人，瞽眼同一阱。醒！醒！醒！

警！警！警！胚羲轩，乳孔孟，神明摇落今何剩？碧眼红髯，仿佛流风韵；不耻为之奴，转耻相师证，漫漫万古如长暝。醒！醒！醒！

警！警！警！野吞声，朝饮恨，百年养士期何称。毋谓藐藐躬，只手擎天臂一振；毋谓藐藐童，桃李成荫眼一瞬，自觉觉人、不任将谁任？醒！醒！醒！

警！警！警！水东流，日西轫（通仞，一仞八尺），朱颜弹指成霜鬓。策驽马，追八骏，九连之衢苦不迅。矧（shen，况且）乃缒藤凿迂径，玩物惕时，买椟珠谁问？醒！醒！醒！

南洋公学校歌以“警醒”为题，表达了振兴科技、拯救中华民族的办学思想，培养人才，策鞭急赶世界先进水平。警、醒两字同韵，作为校歌题目切合时代背景而构思精妙，每段以“警”开头，用“醒”结尾，反复吟唱，撼人心扉。

《警醒歌》辛亥革命后佚名者仿照歌曲《国脉》，借用小山作之助作曲的日本军歌《敌人几万》填词。<sup>7</sup>

警中华立国命脉，竞争世界成，民无学识安能奋兴，速改奴隶性。于今我国五族共和本无贵贱分，文明各国自由平等，学校人人进。天演淘汰，优胜劣败，弱肉而强吞。英灭印度，俄亡波兰，朝鲜属日本。前车覆辙后车鉴，唤醒我国民。江海之水滔滔不返，桑榆景可趁。结我团体，振我精神，黄种博令名。天府雄国物产丰富，环球莫与京。愿我同袍尽天职，醒醒醒醒醒！

《大国民》华树田词，【美】法伊尔曲。<sup>8</sup>

<sup>7</sup> 选自冯梁编《军国民教育唱歌》1913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27页。

<sup>8</sup> 选自华航琛：《共和国民唱歌集》1906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41页。

亚东民国大国民，赫赫同胞轩辕孙，祖国之流泽长且深，祖宗之遗念远且存，保国保种保我家庭，尽我天职献我身。枪林炮雨，仇莫忘，大敌在前我军壮。横刀向天人莫当，国民侠骨有余芳，大旗翻飞正当阳，黄龙灿灿风飘荡，祖国千秋万岁之金汤，增我历史之荣光。

《尽力中华》赵元任 1914年采民间焰口调填词。<sup>9</sup> 1919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以《尽力中华歌》为代国歌。

听我们同唱中华，中华中华！听！君不闻亚东四万万声的中华，中华！都用同气同声，同调同歌，中华中华！来三呼万岁，中华，中华中华！听！君不闻亚东四万万声的中华，中华！都用同气同声，同调同歌，中华中华！

看！我们唤醒中华，中华中华！看！君不见亚东四万万人的中华，中华！是同种同胞，同志同心的中华，中华！来发愤尽力，中华，中华中华！看！君不见亚东四万万人的中华，中华！都振起精神来振作振作，中华中华！

《黄河》杨晳[xī]子（杨度）词，沈心工、曾志忞、冯梁谱曲<sup>10</sup> 有音频。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黄河》是最早由国人自己作曲的学堂乐歌之一。杨度 1904 年创作了歌词，翌年由沈心工谱曲，风行一时。通过歌颂黄河，控诉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西北边的唐努乌梁海位于当时的中俄边境），表达了强烈地爱国主义精神。歌曲的旋律表现出一种宏大的气魄和激情；后半部声调铿锵有力，情感起伏有致，生动地传递出在辛亥革命前夕，爱国青年面对祖国山河破碎，立志投笔从戎、为国捐躯的慨然之情。歌词被梁启超载入《饮冰室诗话》卷二(1910)。

<sup>9</sup>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资料》音乐出版社 1994 年；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 13 页。

<sup>10</sup> 选自沈心工编《学校歌唱集》1904 年 5 月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 16 页。

1936年冬，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人物黄自在收有这首乐歌的《心工唱歌集》序中盛赞：“我最爱《黄河》一首，这个调子非常的雄沉慷慨，恰切歌词的精神，国人自制学校歌曲有此气魄，实不多觏[gòu]。”

著名老作家茅盾（沈雁冰）在《我的学生时代》一文中也说：“对于音乐，我是喜欢的，音乐用的是沈心工编的课本，其中有一首《黄河》……曲调悲壮，我很喜欢。”直到晚年，茅盾还能诵唱此歌。

1992年11月16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艺术委员会通过入选《黄河》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第一首歌曲。

杨度（1875-1931），原名杨承瓒，字皙子，号虎公、虎禅，湖南省湘潭县姜畲乡石塘村人。10岁丧父，为名儒王闿运门生，光绪举人，中榜眼。两度留学日本，曾于《新民丛报》发表《湖南少年歌》，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句。后被谱曲收入小学音乐教材，传遍三湘四水，少年毛泽东曾反复吟唱。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将好友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了孙黄合作。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力邀杨度，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仍坚持走君主立宪道路。1906年，清政府派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写下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作为考察报告上报清廷。而后，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为统计局局长。

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人，参与过清末变法维新。与袁世凯私交颇深，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他组织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策划。袁世凯赐匾题字，称杨度为“旷代逸才”。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发布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第一名。

杨度后在天津、青岛租界闭门学佛反省。在上海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1927年在北京设法营救过李大钊、成舍我。1928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与进步人士交往，参加中国互济会同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进步团体。1929年秋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夏衍单线联系。在白色恐怖下，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坚持地下工作。掩护进步人士，并周旋于各色人物间为中共搜集情报。1930年，杨度加入中国自由

大同盟。1931年9月1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6岁，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周恩来、潘汉年前往吊唁。杨度病中自题挽联：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著有《杨度集》等传世。

《长江长》佚名词曲：<sup>11</sup>

长江长，黄河黄，滔滔汨汨浩浩荡荡。来自昆仑山，流入太平洋。灌溉十余省，物产何丰穰，浸润四千年，文化吐光芒。长江长，黄河黄，我祖国，我故乡。

颂扬民族气节的爱国名曲《苏武牧羊》蒋荫堂词，田锡侯曲<sup>12</sup> 数种歌词大同小异。有音频：

苏武牧羊北海边，雪地又冰天，羁留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野幕夜孤眠；心存汉社稷，梦想旧家山。历尽难中难，旄落犹未还，兀坐绝寒，时闻笳声入耳痛心酸。

苏武牧羊久不归，群雁却南飞，家书欲寄谁？白发娘，倚柴扉，红妆守空帏。三更徒入梦，未卜安与危？心酸百念灰，大节不少亏，羝羊未乳。不道终得生随汉使回！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归），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坐（在）塞上，时闻笳声入耳心痛酸。

苏武留胡节不辱！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盼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永（定）不亏。能使（终教）匈奴惊心碎胆共服汉德威。

辽宁省盖县蒋荫堂填词的一首小调性歌曲。在民国初期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借古人抒发一腔爱国情怀，口口相传，短短几年就传遍了中国大地，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乃至农村翁媪、童子亦会唱，堪称奇迹。

<sup>11</sup> 选自沈心工编《学校歌唱集》1904年5月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7页。

<sup>12</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48页。

## （二）“军国民教育”的军歌，其代表作有：

《从军歌》沈心工编：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忍情轻断思家念，慷慨捧出报国心！  
昂然含笑赴沙场，大旗招展日无光，气吹太白入昂月，力挽长矢射天狼。  
采石一载复金陵，冀鲁吉黑次第平，破浪楼船出辽海，遮天铁鸟扑东京！  
一夜捣碎倭奴穴，太平洋水尽赤色，富士山头扬汉旗，樱花树下醉胡妾。  
归来夹道万人迎，朵朵鲜花掷马前，门楣生辉笑白发，堂内腾欢骄红颜。  
国史标明第一功，中华从此号长雄，尚留余威惩不义，要使环球人类共沐大  
汉风！

《从军乐》梁启超词，民歌《梳妆台》曲调，共十段歌词，现选三段。<sup>13</sup>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演唱视频。

1. 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  
莫退让，发愿做军人，发愿做军人。

5. 从军乐，前敌时。枪林立，硝云涌，弹星驰。我军一鼓长志气。望敌营，  
白一色，片片是降旗，片片是降旗。

7. 从军乐，乐无穷。人一世，死一遍，再难逢。男儿死有泰山重，为国民，  
舍生命，含笑为鬼雄，含笑为鬼雄。

《从军乐》权国垣词，沈心工编曲<sup>14</sup>曲调是沈心工以日本歌曲《手戏》为基础改编的新歌，《快哉》《共和国民》《孝父母》等也使用了这首曲调。

<sup>13</sup> 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1910年上海图书馆、上海书局石印本；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29页。

<sup>14</sup> 选自黄子绳、权国恒编《唱歌教育》上册，1905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31页。

手持干戈愿从戎，决胜冲前锋，从军之乐乐无穷，朝廷重战功。

海进宏开万国通，祸机深重重，存吾家国保吾种，端在军队中。

《黄帝子孙尽雄武》 梁启超民国初年根据德国作曲家 F·W·寇肯的《年轻的新兵》(《露营歌》)填词。寇肯有歌剧和奏鸣曲等作品，其歌曲《真挚的爱》流传尤广。李叔同以此歌填词作早期学堂歌曲《幽居》。用李颀的边塞诗配《年轻的新兵》的《古从军行》，出现于辛亥革命以后。后来王元振女士又为它填写了《从戎曲》的歌词，见吴梦非编《简易师范音乐》第二册(1936)。<sup>15</sup>

黄帝子孙尽雄武，屹立中流作砥柱，仇我何人不蚩尤，逐敌无地非涿鹿，中国少年谁敢侮。亚雨欧风卷地来，猛虎毒蛇实悍哉，丈夫不辞浴血死，悍我邦国靖风霾。誓使鸿功铭石鼓，岂因骏骨上金台！不见张骞傅介子，凿空万里威八垓！

《军歌二十四章》黄公度词，分别由李叔同、叶中冷、华航琛创作了三种不同的曲调。全曲共分三部分，每部分8首。

《出军歌》8首：

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纪谁为主？是我神明胄。

君看黄龙万旗舞，鼓鼓鼓！

一轮红日东方涌，约我黄人捧。感生帝降天神种，今有亿万众。

地球蹴踏六种动，勇勇勇！

南蛮北狄复西戎，泱泱大国风。婉蜒海水环其东，拱护中央中。

称天可汗万人雄，同同同！

绵绵翼翼万里城，中有五岳撑。黄河浩浩流水声，能令海若惊。

西禹步横庚庚，行行行！

怒搅海翻喜山撼，万鬼同一胆。弱肉磨牙急欲啖，四邻虎眈眈。

今日死生求出险，敢敢敢！

剖我心肝挖我眼，勒我供贡献。计口缗钱四万万，民实何仇怨。

<sup>15</sup> 选自张秀山编《最新音乐中等教科书》1913年版，后与《古从军歌》等歌曲一起选入杜庭修编《仁声歌集》仁声印书局1932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43页。

国势衰微人种贱，战战战！

国轨海王权尽失，无地画禹迹。病夫睡汉不成国，却要供奴役。

雪耻报仇在今日，必必必！

一战再战曳兵遁，三战无余烬。八国旗扬笳鼓竞，张拳空冒刃。

打破天荒决人胜，胜胜胜！

《军中歌》8首（略）

《旋军歌》8首（略）

《中国男儿》石更（一说杨度）词，辛汉配歌。<sup>16</sup> 有音频。曲调源自1901年的日本学堂歌曲《学生宿舍的旧吊桶》，学生准备考试时用吊桶打冰凉的井水浇头提神的情景，使得词作者小池友七、曲作者小山作之助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日本歌曲被引进中国，重新填入了激励中国男儿自强，誓死保卫祖国，拯救中华的歌词，成为传唱一时的乐歌《中国男儿》。以此曲填词的还有《大哉军人》《醒狮》《旅行歌》《运动会》等。

上海新式学堂的数量在当时全国最多，校园里经常能听到留日学生的消息，陈天华的蹈海赴死，邹容的《革命军中马前卒》，秋瑾的慷慨就义……广为传唱的学堂乐歌《中国男儿》体现了青年为祖国牺牲的血性和视死如归的决心。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我有宝刀，慷慨从戎，击楫中流，泱泱大风，决胜疆场，气贯长虹，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列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1926年，在风起云涌的北伐战争中，《中国男儿》改变了其校园歌曲的身份，以不变的旋律为仁人志士添入反帝的革命内涵，提出了联合工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派的号召，成为一首革命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

<sup>16</sup> 载辛汉编《唱歌教科书》上海普及书店1906年2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31-32页。

### （三）倡导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其代表作有：

《勉女权》秋瑾 1907年词，曲调近似于日本幼儿歌曲《风车》<sup>17</sup> 有音频。

我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自由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1904年，秋瑾挣脱家庭的束缚，到日本留学加入光复会及同盟会。两年后回到上海，1907年1月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批判压迫妇女的伦理观念和礼俗。刊载了秋瑾填写的学堂乐歌《勉女权》。歌词中第一次提到“男女平权天赋就”。报纸只办了两期，3月就被清政府停刊。

上个世纪初，在溺死女婴现象还普遍存在的中国，女孩子受到现代教育的机会很少。1906年，除教会女校外，全国只有女学生306名，但在学堂乐歌中，也有专门写给女子体操课之用的歌曲。

《女子体操》沈心工 1906年词，曲调源于德国民歌《离别爱人》或莫扎特的《各种小鸟尽来到》又译《小鸟一起飞起来》：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演唱视频。<sup>18</sup>

娇娇这个好名词，决计吾们不要。吾既要吾学问好，吾又要吾身体好。操操，二十世纪中，吾辈也是英豪。

娇娇这个好名词，决计吾们不要。弗怕白人那样高，弗忧黄人那样小。操操，二十世纪中，吾辈也是英豪。

娇娇这个好名词，决计吾们不要。吾头顶天天起高，吾脚立地地不摇。操操，二十世纪中，吾辈也是英豪。

<sup>17</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31-32页。

<sup>18</sup> 选自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84页。

《妇女运动》佚名词曲：<sup>19</sup>

好姐姐，快自强，大家努力莫退让。女权扩张张张张，女子参政新气象。好妹妹，要奋斗，救国责任不让人。非、奋勇前进进进进，男女平权世界新。

#### （四）倡导科学技术和新文化，振兴实业；其代表作有：

《格致》俞桀词，美国歌曲曲调<sup>20</sup>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致知”（《礼记·大学》）。新式学堂统称自然科学“声光化电”为“格致”。

茫茫大海古董品，离离奇奇真富盈。非天之磨荡无以生，非地之蕴蓄无以存。动植矿物通地纷纭，距离算术考察精，声光化电尤研究，标本仪器辨分明，各国赛会资历练，眼界豁如意向增，纵云欧美新学问，格致发明推圣经。愿吾青年酌古又准今，他日博学乃成名。

《劝工场》汪翔词，佚名曲：<sup>21</sup>

劝工场，劝工场，工业振兴国富强，富强非一端，工为万事之滥觞，天然富利数农桑，工艺未修器不良。立公司，重通商，工业不盛无输将。考工记周官，详文顾惠工兴卫邦。迩来科学更炽昌，新理推究判低昂。劳力愈减产愈旺。战争移向工业场，英德法，最扩张，美洲犹属强中强。祝我国工业良，早登世界竞争场。

从李鸿章1872年提出修铁路到1889年朝廷最终同意，居然争论了整整17年。近代中国外患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急。李鸿章在1865年提出要开办电报，朝廷不准：“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

<sup>19</sup> 选自华航琛《共和国民唱歌集》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86页。

<sup>20</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39页。

<sup>21</sup> 汪翔，权国垣《教育唱歌》下册，湖北学务处1905年，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34页。

尊君亲上乎？”直到14年后，朝廷才准允李鸿章开设电报工程事业。

《铁道》汪翔词，英国歌曲曲调：<sup>22</sup>

火轮车真个便，如今世界大改变，去如游龙来如闪电，转眼千里不相见，汽笛一声啵啵啵，漫天烟雾侧身过。火车之利利如何，我生此时真快乐。

卢沟桥，汉口岸，消息流通流不断，快马如飞轻舟似叶哪及火轮一寸铁，祝我帝国好好好，祝我铁路早早早。一时勤劳百世安，从今不歌行路难。

《铁道唱歌》日本歌曲，钱仁康译词，与《扬子江》同一曲调，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演唱视频：

汽笛一声呜呜吹响，火车开步走，离开新桥车站，风驰电掣不停留，穿过夜空，但见爱宕山中景色幽，皓月当空，她是旅客们的好朋友。

《飞艇》王德昌词，民间鲜花调（茉莉花）<sup>23</sup> 用此曲调填词的歌曲，还有《梅花》、《剪辫》等。

飞艇身如鸟翼轻，孤飞万里绝风尘。万头攒动人声沸，初看如鸟复如星。中国男儿大有人，起与列强相抗衡，不怕空中大战争。

《新闻报》汪翔词，佚名曲：<sup>24</sup>

新闻报一张纸，海内寄耳目，见闻实赖此。新闻事，报不已。交通利益诚无比，朝野上下是与非，或褒或贬严如史。新闻报街上卖，清晨早早起，先睹为实快。新闻报奇且怪，言者无罪闻者戒。

新闻报报新闻，中外广搜罗，天下皆同文。新闻报，日日新。学界愈进报愈增，据事直书公且信。文言雅可道俗情，新闻报一纸刊，国民公议论。报纸极大

<sup>22</sup> 选自苏钟正、汪翔《教育唱歌》下集，湖北官书局1905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37页。

<sup>23</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38页。

<sup>24</sup> 选自黄子绳、汪翔《教育唱歌》下集，湖北省督学处1905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98页。

观，新闻报快快看，胜读野史与稗官。

《文明结婚》华航琛词 德国民歌曲调：<sup>25</sup>

欧美心醉自由神，饶他无限深情。吾曹幸作共和民，婚礼喜得守文明。良缘  
缔结自三生，恰好两心相映。

花光灿烂气氤氲，景象无限文明，指环交换证良姻，爱情诚挚结同心。百年  
偕老祝长春，好合如鼓瑟琴。

《劳动神圣》佚名词曲：<sup>26</sup>

不是劳动什么也得不到，劳动神圣，劳动神圣！不是劳动世界也没有了，劳动  
神圣，劳动神圣！一切文明都是劳动出，一切进化都是劳动造就。劳动神圣，  
劳动神圣！劳动神圣，劳动神圣！

#### （五）勉学励志修德、新式学堂生活代表作：

《始业式》夏颂莱词，曲调源自法国歌曲《雪》<sup>27</sup>，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  
合唱团演唱视频。

学堂今朝开校，清晨起床早。同学依然济济，殷勤相问好。

国旗五色飘飘，旭日正相照。从兹进步愈速，知识日增高。

读书人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留辫子的学生坐在了阶梯教室里，学习英语、  
几何、化学、生物。辫子也有了新的功用，可以当作圆规画图。体育和音乐是最  
有趣、最受欢迎的科目，学生们歌唱祖国的河山，也鼓励训练和修养。

《读书》佚名，曲调源自法国歌曲《雪》，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演  
唱视频。

<sup>25</sup> 选自华航琛编《新教育唱歌集》1914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97页。

<sup>26</sup> 选自汪翔，权国垣《教育唱歌》下册，湖北学务处1905年；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32页。

<sup>27</sup> 选自《中华唱歌集》第三册1913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08页。

学生学生学生，读书要用心。平上去入四声，字字要彻清。音要准，读要勤，讲解要分明。字音字义要留心，进步自胜人。

《勉学》1904年吴怀疚词，沈心工引用以美国歌曲《罗萨·李》的曲调为基础的日本歌曲《织锦》编曲。<sup>28</sup>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演唱视频。

黑奴红种相继尽，惟我黄人鼾未醒。亚东大陆将沉没，一曲歌成君且听。

人生为学须及时，艳李秾桃百日姿。末遣光阴等闲老，老大年华徒自悲。

近追日本远欧美，世界文明次第开。少年努力咸自爱，时乎时乎不再来。

1932年，丰子恺先生在一《儿童与音乐》文中描述了儿时学唱《勉学》歌时的情境：“我们学唱歌，正在清朝末年，四方多难，人心动荡的时候，先生费了半个小时来和我们讲解歌词的意义。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政治何等腐败，人民何等愚弱。你们倘不再努力用劲，不久中国一定要同黑奴红种一样。先生讲时，声色俱厉，眼睛里几乎掉下泪来。我听了十分感动，方知道自己何等不幸，生在这样危殆的祖国里。我们唱到‘亚大陆将沉没’一句，惊心跳胆，觉得脚底下这块土地真个要沉下去似的。所以我现在每逢唱到这歌，无论在何等逸乐，何等放荡，何等昏迷，何等冥顽的时候，也会警惕起来，振作起来，体验到儿时的纯正热烈的爱国的心情。”“……我惊叹音乐与儿童关系之大。大人们弄音乐，不过一时鉴赏音乐的美，好像喝一杯美酒，以求一时的陶醉。儿童的唱歌，则全心没入于其中，而终身服膺勿失。我想，安得无数优美健全的歌曲，交付与无数素养丰足的音乐教师，使他传授给普天下无数天真烂漫的童男童女？假如能够这样，次代的世间一定比现在和平幸福得多。因为音乐能永远保住人的童心。而和平之神与幸福之神，只降临于天真烂漫的童心所在的世间。失了童心的世间，诈伪险恶的社会里，和平之神与幸福之神连影踪也不会留存的。”

《励志》苏钟正词：<sup>29</sup>

寸阴尺璧勿抛荒，学问广，知识长。朝夕运甓有陶侃，大知识，从此练，须

<sup>28</sup> 原载沈心工编《学校唱歌集》第一集1904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07-108页。

<sup>29</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55页。

知自治是规律，真自由，先秩序。

奋身跃登大舞场，蹴太华，濯扶桑。扫荡四夷靖八荒，大事业，我但当。恢我祖国之荣光。驾欧美，雄东洋。

《公德养成》汪翔词：<sup>30</sup>

公德公德不可忘，国民细思量。自由平等有纪律，切勿呈荒唐。孔子之道忠与恕，圣教宜尊仰。爱众亲仁谨而信，孝悌重伦常。读书识字明大义，莫呈强权强。文明野蛮非空谈，慎哉勉为良。

芸芸同居社会中，义利判卑崇。个人幸福不足恃，利益大而公。相友相助相扶持，亲睦变时雍。损人利己便私图，鬼蜮伎终穷。妨害公德如害马，败群罪不容。国民国民须自爱，公德慎始终。

《运动》俞桀词，日本歌曲曲调：<sup>31</sup>

运动，运动，广场一片中，跳高跳远，自西而向东。课余时踢球，赛跑惟我从，少年学生，学生，少年个个是英雄。

《运动会》樊耀南词，日本歌曲曲调：<sup>32</sup>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参加运动会。草地碧、旗五彩，日暖微风吹。军乐洋洋歌慷慨，精神增百倍，请和大家同窗快来快来快快来。

《春郊赛跑》李叔同根据德国作曲家赫林《木马》填词<sup>33</sup> 有音频。

跑跑跑，看是谁先到。杨柳青青，桃花带笑，万物皆春，男儿年少。

<sup>30</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01页。

<sup>31</sup> 选自无锡南公城编《学校歌唱集》，上海文明书店1906年9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19页。

<sup>32</sup> 选自沈心工编《学校唱歌集》，1904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19页。

<sup>33</sup> 载于1906年李叔同自编《音乐小杂志》。

跑跑跑跑锦标夺得了。

《纸鹞》沈心工词，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演唱视频。

正二三月天气好，功课完毕放学早。春风和暖放纸鹞，长线向我爷娘要。爷娘对我微微笑，赞我功课做得好。与我麻线多少，放到青天一样高。

《夕会歌》佚名词，曲谱改编自民乐《老六板》<sup>34</sup> 有音频。

光阴似流水，不一会，落日向西垂，同学们，课毕放学归。我们仔细想一想，今天功课明白未？先生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望儿归，我们一路莫徘徊。回家问候长辈，温课勿荒废。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

《终业式》梁启超词，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曲调<sup>35</sup>。以这首曲调填词的学堂老歌有近 20 首。

国旗赫赫悬当中，华旭照黄龙。国歌肃肃谐笙镛，汉声奏大风。借问仪式何其隆？迎接主人翁。呜呼今日少年，来日主人翁。

#### （六）乐群郊游，代表作有：

《春游》吴怀疚词，沈心工借用美国作曲家 Lowell Mason (1792—1872) 的基督教英语赞美诗《一泓泉水》（《流血之泉歌》）的曲调编曲：<sup>36</sup>

云淡风轻，微雨初晴，假期恰遇良辰。既栉我发<sup>37</sup>，复整我襟。出游以写幽情。

<sup>34</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 105—106 页。

<sup>35</sup> 载于《东亚唱歌》1907 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 109 页。

<sup>36</sup> 选自沈心工编《学校唱歌》初集 1904 年；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 14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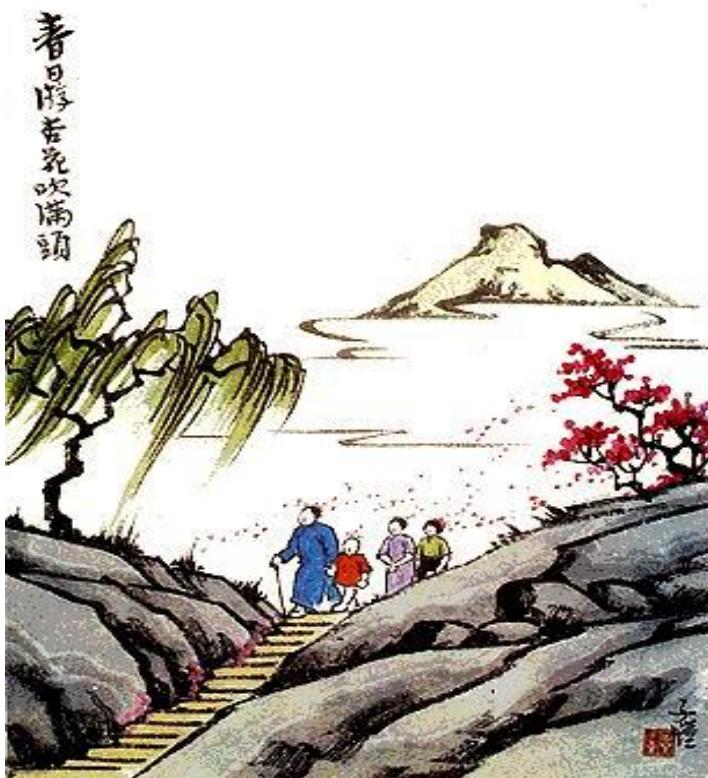
<sup>37</sup> 栒 [zhì]：梳子和篦子的总称，喻像梳齿那样密集排列着。

绿荫为盖。芳草为茵。此间空气清新。歌声履声，一程半程。与子偕行，偕行。

此歌清新明快，唱出了年轻人在春游时的欢乐心情。类似的歌曲还有《杨柳绿依依》、《友谊》、《黄鹤楼》、《旅行歌》等。沈心工创作的学堂乐歌常借用基督教赞美诗的曲调填词，这首《春游》在当时的中小学传唱一时。

### 丰子恺画作《春游》

《春游》李叔同词曲<sup>38</sup>，是我国目前可见的最早的三部合唱歌曲。有音频。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  
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  
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  
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  
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左图：丰子恺画作《春游》）

《旅行歌》沈心工根据日本校园歌曲《宿舍里的旧吊桶》（小山作之助曲）的曲调填词。《中国男儿》《醒狮》《大哉军人》亦采用此曲：

中华大地，亮起玲珑塔。锦绣罗浮山下，朵朵鲜花飒飒，春始英姿总潇洒。  
珠江水，今朝浪谁怕？弄潮儿，我帆挂。

度东风不尽腾云驾。一寸丹心，梦钟青史，唯我中华佳话。中华大地，万盏灯笼遍。内外长城相看，朵朵鲜花灿烂，秋尽英姿总娇艳。问兄弟，神州与谁赛？齐心志，我加冕。载五湖四海千秋胆。岁月峥嵘，大家协力，唯我中华赞叹！

<sup>38</sup> 选自丰子恺编《中文名歌五十首》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44页。

《放牛》沈秉廉词，法国民歌曲调，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演唱视频：

放牛放到山上，山上青草长；放牛放到山下，山下百花香。老牛吃得快活，连赞好食粮；牧童玩得快活，山歌随口唱。

## 六、辛亥革命时期的歌曲，大多仍然是“学堂乐歌”

### （一）宣传三民主义和自由的代表作：

《三民主义问答歌》佚名词曲：<sup>39</sup>

三民主义是什么？民族民权与民生。中山先生所提倡，愿吾同胞要奉行。

三民主义是什么？连接我们各民族。在吾境内齐平等，抵抗外来的压迫。

三民主义是什么？里面分别权和能，民有四权管政府，政府五权治人民。

三民主义是什么？要使经济上平等，这种办法最妥当，平均地权节资本。

五权：孙中山认为西方宪法采取的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制度中，行政机关拥有考试权将可能导致任人唯亲、滥用人才；立法机关拥有监督弹劾权则将可能有国会专制的流弊。他认为应借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中的考试和监察机构及其独立职能，另设考试院和监察院，此乃五权分立之由来。

《中国心》沈秉廉词曲：<sup>40</sup>

正义在我们血里，公道在我们心里，怕什么强权暴力？怕什么阴谋诡计？振作精神，团结团体，依照三民主义奋斗到底！中国要拯救人类，中国要解放自己，誓联合弱小民族，一同来努力奋起，黑暗时代将要过去，快见青天白日普照大地！

《剪辨》沈心工 1906 年词，民间《鲜花调》（茉莉花）曲调：<sup>41</sup>

<sup>39</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 61-62 页。

<sup>40</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 88 页。

<sup>41</sup> 沈心工编《学校唱歌》第二集；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 93 页。

我同袍梳辫子，及时起？自满洲人，进中原，把发剃。叹二百八十六年里，做奴隶。你看那宇宙里，圣贤人，自关壮缪，岳武穆，一般神。问几人剃发梳辫子，拖后身。更看那戏台上，做戏文，自上古起。历汉唐，到宋明。问谁人编发拖辫子，在背心。况当今全地球，五大洲，有哪一国，编发辫，拖背后。愿同袍急将辫子剪，勿再留。

## （二）欢呼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新政的学堂乐歌，其代表作有：

辛亥革命后，无锡人华航琛根据沈心工最早创作的学堂乐歌《男儿第一志气高》的曲调，填写了《共和国民》<sup>42</sup> 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演唱视频。

国民第一资格高，年纪无老小，讲求学问不辞劳，知识开通早。敦品励行重节操，道德真紧要。体育功夫深造，体健身强脑力好，共和程度一齐到，全球人称道。二十世纪我同胞，国民资格高。

《雪中行军》1906年叶中冷、华振编辑，【日本】永井建子曲。<sup>43</sup> 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演唱视频。

哥哥手巾好作旗，弟弟竹竿好坐马，邻家兄弟拿枪来，来到山中演军队。  
山中处处皆大雪，路上无人飞鸟绝。北风刮面如剪刀，黑衣尽变白衣色。  
我等不怕死，哪怕风与雪。

哥哥你做司令官，快步慢步由你说。山中喇叭呜呜吹，山下人家把门开。  
山下人家你莫惊，我等不是外国兵，也非山中有盗贼，乃是学生冒雪来行军。  
将来替你打胜仗，保我中国四万万人人都安宁，四万万人人享太平。

辛亥革命后，《雪中行军》填上了新的歌词，歌名改为《中华大纪念》<sup>44</sup> 纪念革命的胜利。有音频。

<sup>42</sup> 选自华航琛：《共和国民唱歌集》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67页。

<sup>43</sup> 选自赵铭传：《东亚唱歌》1907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15页。

<sup>44</sup> 选自华航琛：《共和国民唱歌集》商务印书馆1912年6月第二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47页。

十月十号义旗扬，革命军队起武昌，霹雳一声江汉平，汉口汉阳树汉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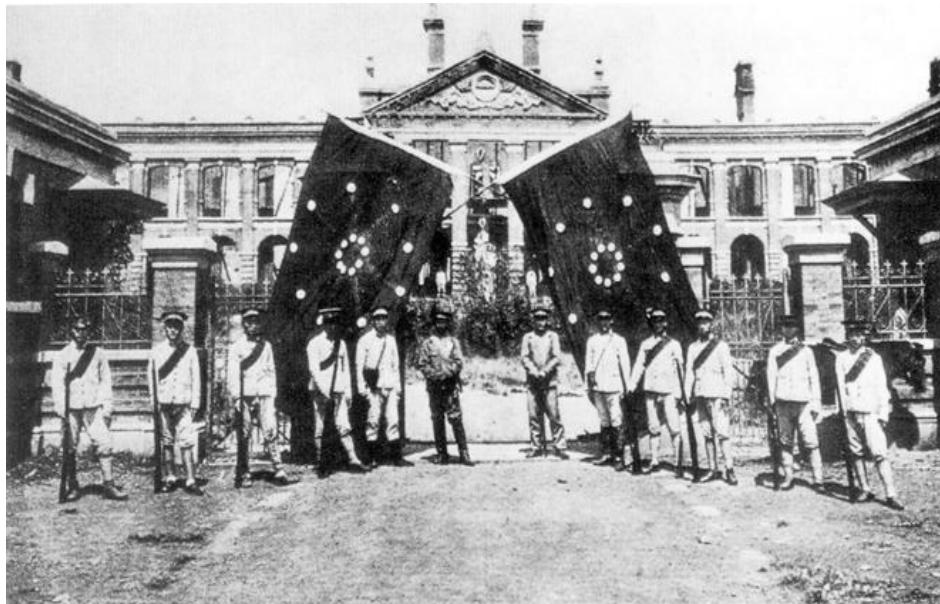
各省闻风争相应，举到江宁。元帅黄兴秦晋滇粤皆反正，江浙联军平金陵，大江以南无膻腥。十七省代表，选黎元洪，组织政府讨虏廷。

虏廷闻之心胆惊。遣使求和到沪滨。和议不成战火紧，孙文归国民气振。

共和元年元旦辰，孙大总统履任到南京。中央政府告成功，誓师北伐捣黄龙，黄龙指日平，四万万人人多安宁。

《革命纪念》佚名词，【美】梅森曲<sup>45</sup>，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演唱视频。

十月十日，湖北武昌，突起了革命军。满城官吏，胆战心惊，仓皇奔逃出城。还我河山，振我民族，不消血战力争。建设共和，扫除专制，大功一旦告成。



武昌首义后在都督府门前合影

《革命军》沈心工词，根据奥好义曲的日本军歌《勇敢的水兵》的曲调填词<sup>46</sup> 有音频。

吾等都是好百姓，情愿去当兵；因为腐败清政府，真正气不平。收吾租税作威福，牛马待人民；吾等倘使再退缩，不能活性命。

<sup>45</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58页。

<sup>46</sup> 选自华航琛：《共和国民唱歌集》商务印书馆1912年6月第二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49页。

《女革命军》华航琛词，民歌《梳妆台》曲调<sup>47</sup>，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演唱视频（第三、四段歌词从略）。

女革命，志灭清，屏弃那粉黛去当兵。誓将胡儿来杀尽，五种族，合大群，俾将来做个共和民。

女革命，武艺精，肩负那快枪操练勤。步伐整齐人钦敬，联合军，攻南京，你看那女子亦从征。

《美哉，中华》沈心工词，朱云望曲<sup>48</sup>，有音频。

美哉美哉，中华民国，太平洋滨，亚细亚陆；大江盘旋，高山起伏；宝藏万千，庶物富足；奋发有为，前途多福，美哉美哉，中华民国。

美哉美哉，中华民国，气质清明，性情勤朴；前有古人，文明开路，后有来者，共和造福；如涌泉源，如升朝旭，美哉美哉，中华民族。

《美哉，中华》还有一首使用中国民间曲调的，歌词基本相同的歌曲<sup>49</sup>

《世界大同》佚名词，【奥】库伯曲：<sup>50</sup>

崇道德，倡和平，非争战，息刀兵，一切民族共图生存，大家提携国际平等，美哉世界大同，壮哉大同之民！▣

### 参考书目：

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5月

汪毓和：《中国近代音乐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余甲方：《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

<sup>47</sup> 华航琛：《共和国民唱歌集》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84页。

<sup>48</sup> 选自沈心工编《重编学校唱歌》第六集；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4页。

<sup>49</sup> 原载杜庭修编《仁声歌集》仁声印书局1932年版；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14页。

<sup>50</sup> 词曲简谱见《先行者之歌》，第65页。

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7月

陈一萍：《先行者之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补白】

## 1981年8月4日的一通电话

李南央

作者按：这篇小小的随记，应该是1981年女儿一岁时，为了找幼儿园打了一通电话后，气不过写下来的。也是一种时代的记忆。

家长：喂！是北海幼儿园吗？

幼儿园：是。

家长：你们现在收托孩子吗？

幼儿园：我们这儿不收孩子。

家长：咦？你们不是幼儿园吗？不收孩子，孩子从哪儿来？

幼儿园：（沉默片刻）我们贴布告。

家长：九月一日收孩子吗？什么时候贴布告呢？

幼儿园：我们幼儿园九月一日不收孩子，什么时候收也不知道。要收时就贴布告，你就天天来看吧。什么时候看到布告，就什么时候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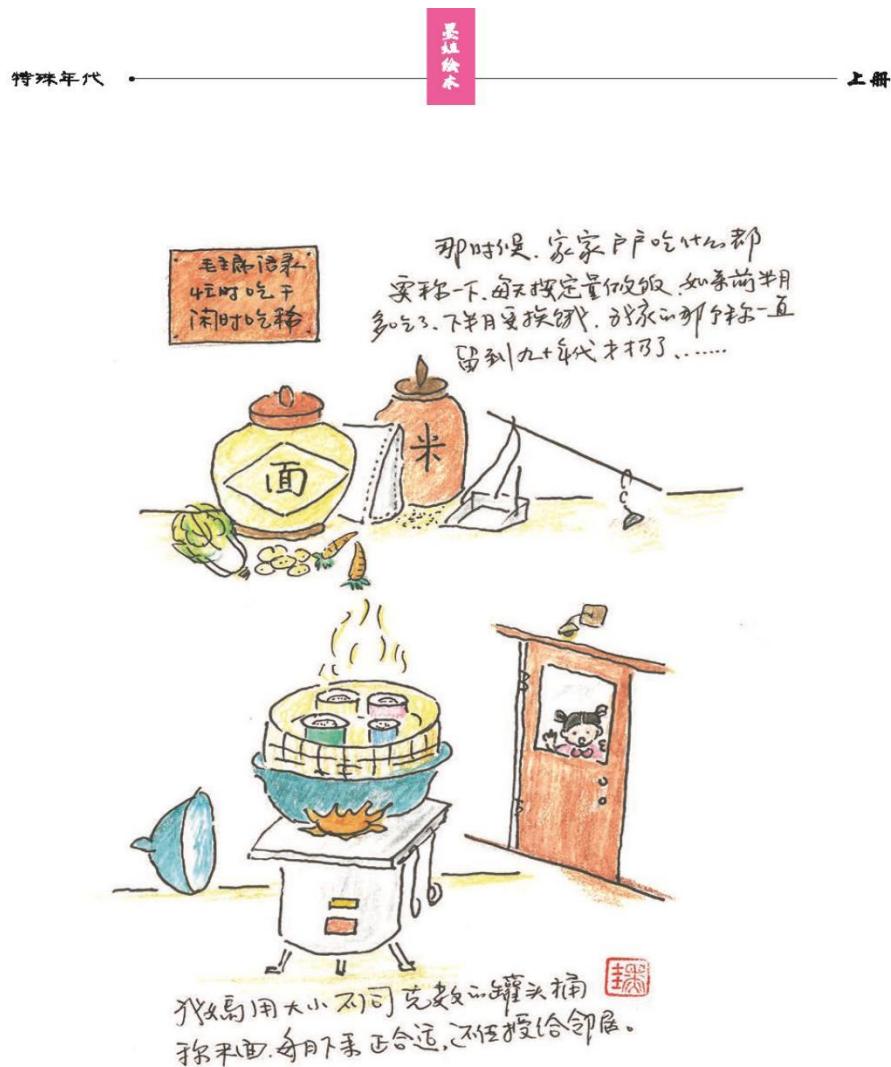
作者评：家住月坛，怎么可能天天到北海去看布告？还不如干脆直说，老百姓的孩子、没后门的孩子，干脆别打进北海幼儿园的主意。▣

【百年中国】

## 绘本特殊年代

### ——漫笔童年饥饿（1959—1966）（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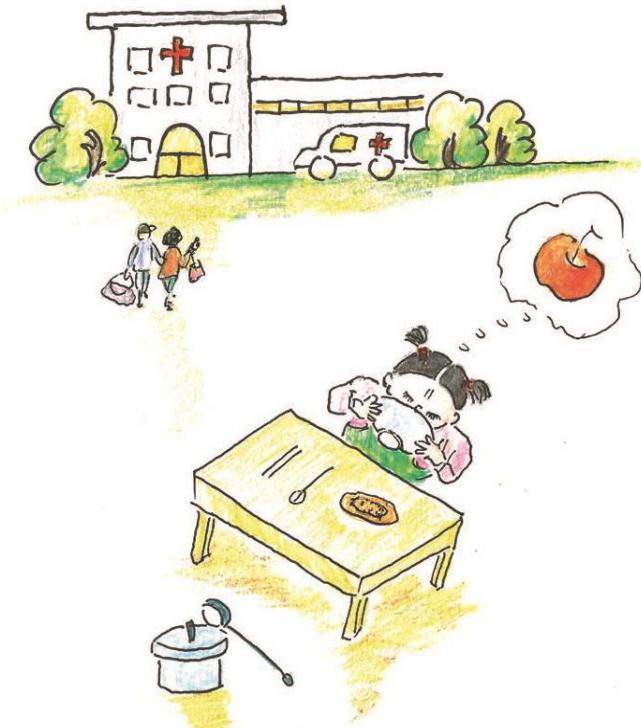
墨娃



·55·

那时候家家户户吃什么都要撑一下儿，每天按定量做饭，如果前半个月多吃了，下半个月要挨饿。我家那个称一直留到90年代.....

我妈用大小不同克数的罐头桶称米面，每月下来正合适，还传授给邻居。



1962年春天，我妈大病一场住进

了医院，我爸是医院、单位、家三处跑。  
早上我爸给我煮点儿棒子面儿粥，弄了几粒咸菜。  
我每次都把碗舔得干干净净，那时候是  
晚上做梦常常是吃苹果……



1962年春天，我妈大病一场，住进了医院。我爸每天医院、单位、家三处跑，早晨我爸给我煮了点儿棒子面儿粥，弄了几粒咸菜，我每次都把碗舔得干干净净。那时候晚上常梦常常是吃苹果。

特殊年代 · 上海

墨娃绘本



我妈住院，医院的伙食很差，顿顿都是粥和白菜汤，严重缺乏营养。我爸单位同事从乡下弄来一只兔子，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喂兔子，兔子很瘦。但是我很开心，一个人在家有伴儿了，可是没几天，这只兔子就成了我妈碗中的汤……



·59·

我妈住院，那里的伙食很差，顿顿是粥和白菜汤，严重缺乏营养。我爸单位同事从乡下弄来一只兔子，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喂兔子，兔子很瘦。但是我很开心，一个人在家有伴儿了，可是没几天，这只兔子就成了我妈碗中的汤……



我妈住院天天想我，星期日的时候，我爸就带我去医院看我妈，还带了午饭，午饭只有一道就是白水煮白菜，没有一点儿油腥儿。快到医院的时候，看见我妈在窗口招手，我高喊：“妈妈，今天二哥打我……”



我妈在医院天天想我，星期日我爸带着我去医院看我妈，还带了午饭，里面就是水煮白菜，没有一点儿油腥儿。快到医院的时候，看见我妈在窗口招手，我大声喊，妈妈，今天二哥打我……



夏日的北京，酷热、闷湿，天黑以后，路灯下到处是蚂蚱。每到这时，我二哥就特别高兴，拿着个大网子跑去捉蚂蚱，然后回家烤着吃，说是有大虾味儿，我看着就恶心，从来没吃过。我妈说民国时，北京人没有吃蚂蚱儿的。

夏天的北京，酷热闷湿，天黑以后，路灯下到处是蚂蚱，每到这时，我二哥就特高兴，拿着个大网子跑去捉蚂蚱，然后回家烤着吃，说是有大虾味儿，我看着就恶心，从来没吃过。我妈说民国时，北京人没有吃蚂蚱儿的。

特殊年代

墨娃绘本

上解



·65·

每天下午，我都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尤其喜欢听孙敬修老师讲故事，还有幼儿诗歌……

特殊年代

吴桂玲

上册



有一回，我妈出去买菜，让我在家看小儿书。我妈刚一出门儿，我就登上缝纫机，想扒窗户往外看，一脚踩空，后脑勺儿朝下摔了下来，脑震荡，昏睡了七天七夜，呕吐不止，快把胆汁都吐出来了……

·67·

有一回，我妈出去买菜，让我在家看小儿书。我妈刚一出门儿，我就登上缝纫机，想扒窗户往外看，一脚踩空，后脑勺儿朝下摔了下来，脑震荡，昏睡了七天七夜，呕吐不止，快把胆汁都吐出来了。



### 摔成脑震荡、每天昏睡、老邻居

们轮流背着我到广播事业局医务所打吊针。  
有人说这是被吓着了。邻居单婶拿着我的小棉袄和盛  
满小米的酒盅在门口叫了三遍我的名字。  
一会儿我就清醒了。牛录奇……



摔成脑震荡后，每天昏睡不醒，老邻居们轮流背着我到广播事业局医务所打吊针，有人说这是被吓着了，邻居单婶拿着我的小棉袄儿和盛满小米的酒盅儿在门口儿叫了三遍我的名字，一会儿我就醒过来了，真神奇……。■

【评论】

## 对党内斗争的看法

吴忠

### 一、党内高级政治生活不正常

我参加革命五十三年了，经历了很多，感到党内斗争很多是偏激、偏重了，正常的也有，少。

我佩服彭老总，同情彭老总，为他平反我很拥护，但我们党内在处理彭德怀问题时有几个站在彭一边替他说话？好像是毛主席一个人做的决定，其实大家都跟上去，都贬彭德怀。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贺老总是土匪，刘帅也这样说，我很不舒服。总理倒没说。就算是土匪，南昌起义人家是军长，北伐军的军长；洪湖、湘鄂西，两把菜刀闹革命；抗日战争是120师师长，后来又是元帅，为什么要跟着人家说他是土匪？聂老总也这样说啊！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后在中南海批判彭德怀，那时我在机械化师当师长，参加了会议，感觉到会议的气氛不大舒服。不管怎么说，彭德怀是有功劳的，平江起义不算晚。斗争过火了。比如罗瑞卿同志指着彭德怀的鼻子训斥：你说长征中我们一军团杀你三军团掉队的人，彭说“没说过”，罗说“说过！”林彪主持会议，在后面说：造谣！可耻！我们不了解情况，只是感觉很过火、刻薄。林彪讲得更狠了，说彭有野心，原来叫彭得华，要得中华，叫石穿，滴水穿石。唯心得很！没有一个人替彭说话。总理说彭很像冯玉祥，是个伪君子。这样评价彭，我听了也不舒服。陈老总在党内以直爽著称，口才好，他说彭在朝鲜时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饮马洛东江”，要打到釜山，把美国赶出朝鲜，陈老总以讽刺的口吻说：啊！成了诗人了！我听了很不舒服。彭德怀很冷静，也没发火，庄重地坐着，顶着压力。这次中南海会议，我的印象很不好。

批判彭德怀时，没有一个人站在彭一边替彭说半句话，可能有但我不知道。当然是毛主席要整彭德怀。我最赞成黄克诚同志的讲话，他在谈到对毛主席评价时说的；他受了很多冤枉，文革时搞到山西那么多年。他说，我们当时在中央工作，参加中央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如果都反对，毛主席能犯那样大的错误？

我认为他的这个话是很公道的，他不只是指彭德怀的事。有人说，毛主席多霸道，谁敢说啊！我不赞成。你当政治局委员、常委，毛主席讲的你不敢说，不是混饭吃吗？如果大家替彭德怀说话，不赞成那样整彭，我不相信毛主席一个人做决定处理彭德怀。现在好像大家都同情彭，当时是这种情况吗？要公道。这种不公道很不好，对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不好。我对总理很尊敬，可他在九大上的讲话不好，他说，南昌起义的优秀代表、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到井冈山与伟大领袖毛主席会师了。我听了不舒服，历来讲朱毛会师，朱德就坐在前台，总理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林彪那时是连长，和陈毅同志都不能比，怎么能和朱老总比呢？朱德的扁担也在林彪肩上扛？我们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不正常。

为彭德怀平反是应该的，我很赞成；但在庐山会议上谁替彭德怀同志说过话？我赞成黄克诚同志讲的：当时我们在中央工作，中央作出这个错误决定，我们参加讨论、参加研究，如果我们反对的话，毛主席能犯这样大的错误吗？有人说，那不能反对呀，毛主席厉害得很、独裁得很呀！我不赞成。你还是害怕呀，那你当政治局委员、副主席、常委，不能混饭吃啊！我赞成黄克诚。当然毛主席的责任大，但参加会议的、赞成决定的，都有责任。为彭德怀平反时应该说清楚，当时没有给毛主席当好参谋，有责任。黄克诚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我拥护。党风不正。不从这些问题上搞起，不从上面搞起，党风端正得了吗？端正不了！

彭德怀有缺点。反教条主义整刘帅，说把苏联的条令都照搬到中国了，但哪个条令没有你国防部长签字呀！你能说不知道？朝鲜战争180师被搞掉了，彭说：不是说刘瞎子的部队能打仗吗？怎么不能打啊？这个话说得不像话，部队是归你指挥的，怎么能怪刘帅？还刘瞎子呢，不尊重。刘帅德高望重，教条主义作了检讨，说光讲战术不讲战略，军事冲击了政治，检讨很深刻。眼睛看不见，上台都站不稳，主席让他坐下他不坐；肖华不错，扶他坐下他不坐，检讨嘛！我看了心里很不是味道，彭老总喜笑颜开。陈毅、邓小平在批判刘伯承时说了好话。邓小平说，毛主席讲过，刘很支持政治委员制度，对政委很尊重；陈毅说了好话。这时罗帅在，也说了刘帅的好话。这次会，总政搞得很凶，肖华是副主任，主任是谭政；肖华很活跃，动员写大字报。我在的小组，组长邓华，副组长程世才，我发言，说拥护批肖克的教条主义，但引进这些条令，照抄照搬，总政什么态度？是反对还是赞成？我认为总政是赞成的，发文号召大家学习五个条例，怎么都成了

肖克的、刘伯承的？总政一点责任没有？为什么没有自我批评？好家伙，我发言时总政姓邵的一个处长刷刷记录，整理好要出简报，叫我修改，准备整我。我一看记得很好，都是我的话。没什么可改的；再一想，简报一出来不就要批判我？会议有规定，发言允许收回，我就宣布收回我的发言，简报上一句：吴忠同志的发言已收回。熟悉的同志问我发言内容，为什么收回？我说没什么，只是给总政提了点意见。我知道不会放过我的，果然机械化师反教条主义搞了四十三天。

那时机械化师有好多苏联顾问，苏联是一长制，“师长决心图”“团长决心图”等等，我们有政委，应该是“首长决心图”，包括政委、副师长、副政委，是集体领导。有位老兄揭发我教条主义，说我玩弄语言技巧，耍花招。重点是批参谋长，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

反教条主义，我对彭老总印象不好，总政推卸责任，我在会上发表了意见，后来又收回了；当时黄永胜也发言提了意见，家属问题等，甘泗淇发言好一顿批判黄永胜。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宣布说谭震林是大叛徒，我听了很反感。她这样讲话，我们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指责过她吗？我没听到。当时在场的中央领导不会太少，她哪有权力讲这些话？不正常。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就是专案组搞了一个材料，江青第一个在材料上批的，说刘是叛徒、内奸、工贼，传阅传到康生，康生把江青歌颂了一番，总理也把江青批的这段话歌颂了一番，这都有档案。看起来好像是毛主席给刘少奇定的叛徒、内奸、工贼，我看不是，他相信了这些材料，偏听偏信。有的同志对主席说：主席，我有错误；主席说：我的错误比你大，偏听偏信。当然这些话没有向下传达。

我到了卫戍区，首先要看卡片。卫戍区在公安干校、交通干校、四方庵（音）监护了很多人。那时温玉成副总长兼卫戍区司令，我是第一副司令，政委谢富治、吴德等几个。我看相当一部分被关的人是总理批的，有的是总理建议、毛主席同意，林彪跟着同意、完全同意。当然，总理这种做法也是好意，隔离起来群众就不能随便斗了，不受喷气式的苦了。张霖之是中央委员、煤炭部长，被活活打死，总理讲过好几次“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很沉痛。张霖之性格爽直，很公道。我说过，幸亏我在军队工作，如果在地方，非打死我不可，因为让我低头我不干，不干就打，打我也不干，狠打不就打死了吗？在锦州时，要在地方工作就被打死

了。总理的意图是保护这些同志，有些先后出来工作了，对总理很感激，万里同志就是一个。

在广州当过市长的朱光怎么死的，我不清楚。

贺老总有一段住在西山，是总理的房子，总理让他住的；下面一栋是乌兰夫同志住。电影上，老部下看望他是隔着铁窗说话，哪来的铁窗？房子怎么能没有水，还要接雨水？不对嘛！虽然电影允许夸张，但要有历史的真实性，人家要问贺老总在哪个监狱，谁能回答？这样把历史搞乱了。九大时，贺老总很高兴，穿上他的衣服，但九大没让他参加，他情绪很不好，后来就病了。《元帅之死》按这个写法，历史的真实性在哪里？很多人说我傲气很大，我参加革命是干革命，一不混官做，二不混饭吃，因此不需要投机，不需要溜须，不需要拍马，不需要搞鬼。总理对贺老总一直说好话，杨德中最清楚，他是总理的联络员。

这些被保护的同志当时很感谢总理，但现在是否赞成总理用这种方法保护他，我看不见得！当时感激，现在是否还是当时出来的那种心情，不见得！好多同志只说文革中关了多少多少年，没听说哪个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总理关你是保护你。

我到卫戍区，对监护人员状况改变了不少。如罗瑞卿的腿，他两个腿都断了，解手、特别是大便时在洋灰上碰，都要出血，疼得要命。曾绍东介绍时光讲情况，不讲措施；我让他找人做一个高马桶，使罗瑞卿在拄双拐的情况下可以坐到马桶上，不着地，这样就可以不流血了；后来拖延了四五次，曾说：谁负责任？我说：你去做，我负责任！做好后罗瑞卿同志解手时腿不着地，不疼了，喊毛主席万岁，其实毛主席知道什么，是我给他搞的。我知道这类事如果在办公会上讨论，就做不成了。我想过，有人会说“彭罗陆杨啊，你什么感情？”我会回答：要有起码的人道主义吧！有人“左”得出奇，极“左”在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了。

## 二、要说公道话，不报复、不整人

我是1968年5月13号到北京的，“杨余傅事件”以后，担任第一副司令。党内这样的事很多。原来司令员傅崇碧，书记黄作珍，现在改组了，我和杨俊生来。到新的单位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超脱，不要整老班子的同志，不要添油加醋，尽量对原来班子的同志说些公道话，这样有利于团结。我们党内每一次运

动都是搞过的时候多，过分，其实查清后不见得有多大问题。第二种做法我也见过很多，为了让组织上更信任你，就狠整老班子的同志，对被调出去的、对靠边的狠整，是私心杂念，讨好上级领导，把问题搞得过分，无限上纲；以后问题查清，无限上纲的东西谁负责？把原来的班子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做法很多，后果都不好。所以我到卫戍区，采取前一种办法。

我刚来，温玉成在西单召集卫戍区四个师的团以上干部开会，批判杨余傅，主要是批傅崇碧，我说刚来还不熟悉情况，没参加。杨俊生同志比我晚到十天，我说西单招待所团以上干部会我们俩不参加，因为不了解情况，杨俊生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一起下部队，四十多天的会一次也没参加。

我到卫戍区时文化革命已经三个年头。我想，改组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意味着组织上对原班子不信任，对新班子信任。新班子对原班子有两种做法，你搞过头的东西不一定让组织上更信任你，对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有什么好处？查清问题后，你搞的过头的东西谁负责？当然是你负责。

西单招待所的会议简报等材料送给我们，我和杨俊生同志一份都没看，也不看，也不画圈，也不批字。会议结束，让我们去西单招待所见见团以上干部，我们去了。

杨俊生同志到后，卫戍区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师以上干部、卫戍区机关干部参加。杨俊生同志要我代表两人讲话。我从40军带来的秘书李维赛同志对我说，讲话还是要讲部队的优点、机关的优点，我说对呀，我们这几天一面看一面议论过，机关很好，部队也很好；我让李维赛起草讲话提纲，肯定了部队的优点、机关的好作风。

傅崇碧原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卫戍区司令，谢富治是第一政委、第一书记，吴德第二书记，黄作珍书记，刘绍文政委。说傅崇碧带枪冲钓鱼台、冲中央文革，江青加的罪名。九届二中全会后的华北会议上，毛主席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说陈伯达在军队没有职务，为什么常到北京军区、内蒙、山西各地巡视？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会议批判李雪峰、郑维山。江青到会，讲傅崇碧冲钓鱼台，皮包里有四支手枪，用皮包打她的脊梁骨。实际上是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有癫痫病，跟着傅崇碧进去，看到江青发脾气，犯病了，一下子倒下去，皮包摔出去，离江青近一点，她就说打她的脊梁骨，皮包里还有手枪；马上姚文元说：我可以

证明，皮包里是手枪，后面车上还有机关枪。荒唐之极！司机都在，哪里有什么机关枪？手枪是保险柜里找到的，不是皮包里面。以后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江青参加了华北组会议，她一来冷气不能开了，大家热得受不了。她突然手一伸说：吴忠同志，你还欠我的账呢！我莫名其妙，没回答。回来后问吴德同志，吴德也不清楚；我说，是不是江青说傅崇碧带枪冲中央文革，姚文元作证说后面车里还有机关枪，现在傅崇碧下去了，你吴忠应该写个材料、搞个证据向我报告，江青会不会是这个意思？吴德说也有可能。此后我没做出反应。“九一三”事件后，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华北组在陕西厅，江青又来参加了。会议期间江青又伸手说：吴忠同志，你还欠我帐呢！我也没头没脑地说：搞了四五个人，调查了好久，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她也没再追问。

我受审查期间，傅崇碧来看我，我说，我跟其他同志也是这样说，我不欠傅崇碧同志的账。四十多天的团以上干部会我没参加；送来的材料我没看，没画圈，也没批字；我讲话没说过部队被傅崇碧搞坏了；江青两次伸手说欠她的账，我也理解她的意思是要搞个假证据，我没讨好江青整你傅崇碧，不欠你的账。我和傅崇碧讲过几次不欠他的账，至于他欠不欠我的账是另一个问题。

我的性格，别人整过我，我翻过来得势了，绝对不整别人；我认为，给人家搞莫须有的罪名，为讨好上面而狠整别人的同志是小人，如果我得势了反过来整你，来报仇，我也是小人，一样的货色！我一生中没做过这样的人，反而过去整我的人挨整时，我替他们说话，阴法唐就是一个。

阴法唐当团政委时我当旅长，民主大会给我提意见，尖酸刻薄。文化大革命时整阴法唐，他是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说他是支一派压一派的代表，我就不服气：阴法唐又没有夺你司令政委的权，又没有夺你西藏军区党委的权，支左是党委，副司令、副政委、司令、政委去支左嘛，怎么他成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代表呢？斗他的时候很紧张，我让他小孩转告，叫他来我这里一趟，派车把阴法唐接到家里，告诉他检讨要实事求是，不是你的事不要安，要沉住气，不要紧张。后来被搞到盘锦农场劳动，养猪，手都拳不拢了，他老婆去看他，我让四十军接待，给派车送到盘锦农场看望阴法唐。后来我又打电话给六十四军同志（那里归六十四军管），说明法唐打仗很好，工作很好，身体搞坏了以后怎么工作？六十四军就让他疗养。他小孩当兵，妹妹当兵，我都办了，我不怕犯嫌疑。阴法唐解放时，

我给陈锡联同志讲，他就是中印边界反击战时419部队的政委，打仗很好，陈锡联安排阴法唐担任辽宁省军区政委，后来总政安排他到福州军区当副主任，以后又担任济南军区副政委，从济南又到了西藏。我没有因为他给我提意见尖酸刻薄，在他倒霉时就落井下石。

我们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坏就坏在这个问题上。你整他，他翻过来又整你，没完没了，地方也是这样。

总之，到一个新单位，特别是改组班子的单位工作，取第一种做法是妥当的，取第二种做法是有私心杂念的，起码是缺乏经验。党内这种情况，采取第二种做法的人比较多，采取第一种做法的人比较少。但我不搞鬼，不能保证别人不搞我的鬼，所以到北京工作后我高度警惕。文化革命，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我没有陷在林彪、江青、“四人帮”里面去，说明高度警惕是对的，成功的。■

【评论】

## “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74）

——最应该被整治的

李南央（美）

世事诡异，最近太平洋那边发生的桩桩件件，总是可以同《李锐口述往事》连在一起。8月20日，西方大媒体的中文网，纷纷报道习近平在政法系统内开展延安式“整风”的消息。《纽约时报》的题目是：“‘刀刃向内’，习近平对政法系统进行‘整风’。”《华尔街日报》的题目是：“习近平首次进行政法全面整风，加强对政法系统控制”。《法兰克福汇报》的题目是：“习近平的毛式整风”，文内写道：

习近平的亲信中共中央政法委的陈一新将本次整顿行动比作延安的整风运动。1942年至1945年的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起的第一次意识形态化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铺平了道路，还将毛泽东思想提升为党的理论基础。难道习近平也想通过发起一场新的运动，获得同“伟大领袖”并驾齐驱的地位吗？

父亲在他的《李锐口述往事》中对延安整风有这样一段评述：

我个人认为，延安的整风和抢救运动，根本不是什么教育人的问题，用朱正的话说，实际是一场极大的“精神污染”运动。人长着脑袋，不能自己想问题，只能跟着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去思维，只要是党叫你干的事，怎样胡来都可以，把人的头脑、思想品德完全搞昏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必须认识清楚。这个副作用在“建立新中国”以后逐渐暴露无遗。从整胡风开始，后来包括胡适、梁漱溟、马寅初这些大学者，直到反右运动，把党内绝对服从的一套，先是推向文化界，后来进一步推向全体人民，牢牢地巩固了共产党一党的专政，实际就是毛泽东一人专政。

问题是习近平效法毛泽东搞“整风”，他能获得毛泽东当年“绝对服从”，“一人专政”的成果吗？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二。

我刚刚整理到的父亲2002年4月21日的口述录像中有这样一句话：

……因为我其实接触毛接触得比较深啊，这个人是厉害的，真有魅力的呀。

反观习近平，处江湖之远的民众给他起的外号，就不用我在这里一一列举了，反正都跟魅力不沾边。那么近距离接触过他的人呢？我的朋友中就有一位，曾跟正值壮年，本应精力充沛的习近平一起开过小会。朋友说他大失所望，习近平给他的感觉是索然寡味，昏昏欲睡。习近平无毛泽东的魅力，此为原因之一。

在同一段叙述中，父亲还有这样的话：“中国的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投奔延安，投奔共产党呢？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又不是工人，又不是农民，又不是没饭吃，又不是社会上没有出路，是吧？”

李锐们投奔延安，是因为他们以为那里是“红星闪耀”的地方；他们投奔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说，它要建立一个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一样的，那个工农大众的苏维埃共和国。而现如今，早已时过境迁。中国人，甭管活在哪个犄角旮旯，都不是遥望延安，憧憬俄罗斯的李锐们般的左翼青年了，他们实实在在地活在既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的日子里。共产党宣传的主义、理想，它自己即不

信，更不做，已无一丝一毫的感召力，此为原因之一。

既无人格魅力的吸引，也无认同理念的臣服，那么习近平“延安整风”的方式刀刃政法系统所达到的“绝对服从”“一人专政”，只能是高压下恐惧的颂歌。合唱者的调门会越唱越高，领唱者的调门会越唱越荒腔走板——官位越高，恐惧度越高，不知何时那把刀砍到自己头上。真相是：政法系统内人人对习近平恨之入骨，在心里切齿痛骂。而社会呢？面对色厉内荏的政法系统，一定会有更多不惧死的许志永、任志强、许章润、蔡霞……站立出来，面对不畏死的人群，中共豢养的政法系统对人民的威慑力终将化为乌有。

在2002年4月21日那天的叙述中，李锐还有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最大的坏处还不是他的随心所欲，乱来，是搞个人崇拜，搞专制主义。这个是贻害无穷的东西，到现在江泽民还搞这一套。江泽民搞这一套很糟糕啊！什么核心啊，天天大小事情他都要去讲一篇重要讲话，去作秀。西方的民主制度我认为最好的它是有制度，宪法是监督政府权力的，美国是张三、李四都可以当总统。

父亲说的极是。中国由谁当政并非生死攸关之事，只要有制度和宪法套着，即便是习近平这样只有小学生水平的人，也没有什么可怕。所以中国当务之急，不是整什么政法系统，而是用现行的法典，好好地整治、整治习近平，把他关进宪法的笼子，让他在那里面老老实实地为中国人干事儿，而不是肆无忌惮地祸害中国人，甚至祸害他国的人民。我因此强烈建议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将扣留的《李锐口述往事》送一本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呈转习总书记阅，请他了解一下他的父亲习仲勋先生的老友李锐在这本书中都说了些什么。现在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关进宪法的笼子，比日后经法庭审理被判入狱的结局绝对要好！

顺便说一句，8月26日，我收到北京第三中级法院第二十次延审通知书。迟来的审判无公正，“李南央状告海关案”早就失去了审理的公正性，但是在这篇“跟进”中，我还是要表扬一下贾志刚合议庭长：你还在遵守程序。❷

2020年8月31日

## 【评论】

南央按：这是巴悌忠当年写就的一篇小文。父亲李锐看过后以为不错，便将它介绍给了在热河办报时的同事黄钢先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黄钢先生创建了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任常务副会长的同时兼管着研究会的杂志。结果是被退了稿。我以为这一篇“速写”外加那两封回信，不失为对文革刚结束时大陆人文环境的一种“记忆”。

## 车厢速写：关中换粮

巴悌忠

“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几个从西安上车的小姑娘坐在车厢内带着几分得意，几分无聊，轻轻地哼着流行的《祝酒歌》，使得充满“哐当、哐当……”单调噪声的车厢气氛变得有几分生气了。

“快！你真笨，托住口袋后边，举！往上举！”一群倒卖化肥换粮食的农民在车刚刚停稳的一瞬间，就从车门、窗户一拥而上。顿时吸引了全车厢人的目光。

“你慢一点儿，我的包儿怕压！”一个中年妇女看到沉重的粮食口袋就要压在她的包儿上，大叫了起来。

“就放在这儿！”一个约莫十八九岁的姑娘满头大汗地，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把印有“尿素——日本产”字样的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

“唉，咱他妈的不离开农村，以后也得这样拼命去换粮。”那个唱歌声音大一些的，看来满秀气的姑娘叹道。

另几个姑娘也完全没有唱歌的心思了。她们看着这伙手忙脚乱、衣衫不整、满脸汗渍的换粮人，议论了起来：

“四年了都，也不知啥时候能离开那个鬼地方。”

“哈！走得越晚越好，剩下的什么猪呀、桌子呀，全是晚走的人的，能卖不少钱呢！”

“那我也想早走！”

“有本事你去考大学呀！”

“考大学？高中毕业考试时，有一道题最后一步是  $1/2+1/2$ ，我得了个  $1/4$ 。咱这水平，只配当老农民啦。”

“可不是，今年招工听说都要考试了。”

“……”

“快躲起来，查票的来了！”一个一直警惕着的换粮人叫了起来。顿时，有几个人开始紧张地张望起来。

“不躲！赶咱们就下去，下一趟车再上。”那个十八九岁的姑娘粗声粗气地说。面上毫无惧色。

“老乡们，查票啦！没票的不要紧，补个三毛、两毛的都行，可不能一分不花白坐车。”列车员以极通人情的口吻，边拉着长音边推着换粮的人们去列车长处“补票”。几个换粮人可能感到从陕西境内花两毛钱可以坐到甘肃还划得来，便主动去补票了。

“我没钱么，不补！”又是那位姑娘的粗嗓音。

列车员看着她，她若无其事。“没办法，”列车员转过身来，摊开双手，耸耸肩膀，摇着头走了。

绛帐车站到了，西安上车的小姑娘们背上各自的背包——沉甸甸的，下车了。

“哐当、哐当……”列车还是以它那单调的老调子行进着。不知是车厢的哪个座位上，隐隐传来一个女孩子背英文单词的声音。“Yes”念成了“噎死”。渐渐地，她的声音被淹没了。

依然是“哐当、哐当、哐当……”

## 1981年2月19日黄钢先生的回信

小李：

你在17日寄来的速写稿，昨天收到后就看了。我个人觉得在我们刊物上是可以刊载的，因为确有这种情况呵！不过，假如你能同你爱人商量：如果他能在生活中看见的，更有积极意义的事物再为我们写一篇速写，一起登出，我想那就更好了！

当然，也要真正地碰到有这种事，瞎编也不行，不好的。我还欣赏他能够运用“速写”这么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多多运用很有意义。请你转告他吧！

此稿让编辑部同志大家看看，他们看后，最后如何决定，他们还会再告诉你。

好久没有看见你爸爸了！在报刊上常看见李锐同志写的诗文——最近好像在那里看见他还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作品——请转告李锐同志：如果他写了研究鲁迅的文章，还有别的文章，也希望他给我们的刊物发表一些。匆此祝好！

### 1981年2月26日编辑的回信

李南央同志：

黄钢同志转来的速写《车厢速写》一稿，我们都已过阅。总的来讲，作者的文笔还是好的，这样的事情在现在一些场合也是存在的并时时发生的。但这些作品的内容所涉及的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些阴暗面，今天揭露阴暗面也是为了更好地使社会主义前进的一种形式。但歌颂光明，鼓舞人民向“四化”迈进、向前看的作品更是我们每个作者义不容辞的当务之急的任务，所以我们认为这篇作品不宜在本刊发表。但我们非常愿意并欢迎作者有时间的话，多给我们写一些报告文学、速写等好的作品，以后多多加强联系，促进我们的刊物办得更好。

稿子退上，请收。欢迎再来稿。有空让作者来编辑部玩，有什么作品适合我刊用的可随时拿来，谢谢了。此致 敬礼

【述往】

### 竹海葱茏（四）

——童年记忆

万润南（法）

#### 1-17 我的志愿

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会经常被问道：你的志愿？也就是说，你将来长大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长大了要成为……”

我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是在三年级语文课上造句。我记得自己的回答是工程师。我当时心目中的工程师，就是盖房子、画图纸。果不其然，我后来上了清

华土建系。尽管到初中时我就改了口，说想成为高尔基那样的作家，但不管用了，命运之神只记得你的第一个愿望。

班上其他小朋友的回答，记不清楚了。只有一位小女生，细眉凤目、清秀白皙、弱不禁风、嗲声嗲气，她的回答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我长大了要成为护士小姐。”

李玉说：她当年要当拖拉机手，后来果然下乡了。你看，我们那一代人，大多是想成为专业人士。

当今的新一代，可不得了。

新学年开学的时候，广州市的记者在小学校门口随机问新入学的孩子这个古老的问题：

“你将来长大了要成为……？”

一个很朴实的小女孩，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将来长大了要做一个贪官！”

记者：“为什么想成为贪官呢？”

小女孩：“因为贪官有很多好东西……”

前些日子看凤凰卫视的节目《鲁豫有约》。嘉宾是三个小女孩，谈话内容是聊她们假期夏令营的有趣故事。她们也就是七、八岁，我当年造句的年龄、孙女朵朵现在的岁数。一个个豆蔻年华、青翠欲滴，天真可爱得让你不忍喘一口大气。

谈话结束时，鲁豫又问起了她们这个老问题：“长大了你们想成为……”

她们的回答让我倒抽了一口凉气。

第一个回答：“我要像我爸爸那样，有权！”

第二个回答：“我将来要有名。”鲁豫说：“那我将来再去采访你，可以吗？”小姑娘立即恩准：“好吧。”

第三个说她将来“要有钱。”鲁豫附和道，“是啊，没有钱是不行的。”小姑娘小声补充了一句：“也就是当个富婆吧。”

我彻底无语。

朵朵一年级读的是国际学校，结业典礼上，每人要说一句话，恰恰也是回答这个问题：“I will be ……”（我将来要成为……）

她妈妈用视频记录了全过程。一个金发碧眼的奥地利女孩说：“I will be a princess.”（我将来要成为公主）

朵朵对此颇不以为然。评论道：“princess？那是童话里的人物。”

轮到朵朵时，她字正腔圆、一字一顿、语惊四座：“I will be myself.”（我将来要做我自己）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就是做自己。朵朵却在不经意间，对自己的将来做了如此的承诺。当爷爷的，唯有祝福。

我的这个孙女，生于2000年10月29日，恰好和我同一天生日。也爱读书，善于独立思考，处理事情精明强干。我总觉得她像某一位万氏先辈……

### 1-18 我想回家

在上海巨鹿路小学读完三年级，放假了，想家了，我吵着要回外婆家。

在我心目中，“家”，是可以撒野的地方。外婆家是“家”，而上海不是。在乡下，我可以放开嗓子喊，撒开丫子跑，在上海却不可以，太憋屈。在乡下，吃西瓜是一人半个，用调羹挖着吃，西瓜汁喝个够，多痛快！在上海却把西瓜切成薄薄的一瓣一瓣的，汁都流光了，真可惜也真小气。在乡下，我是外婆的“大头外孙”，村里人把对外婆的尊敬和报恩，都转化为对我的呵护和善意。那感觉不说是小皇帝，那也是小王子。在上海我是乡巴佬、阿曲西，受欺负、被歧视。

我很少到弄堂里去玩。只要一出门，就要受欺负。冷不丁，后脑勺被拍一掌，屁股上被踢一脚。回头看，一个个装得若无其事，那个德泰生的小开，叫松年的，得意地一脸坏笑。上海小赤佬，真没种，连欺负人都不敢堂堂正正。

上海人很会骂人。他们会笑嘻嘻地骂你，转弯抹角地骂你，像唱山歌那样骂你。他们会亲热地搂着你的肩膀，管你叫“阿乡”，其实仍是在骂你“乡巴佬”。上海人最瞧不起的，是苏北人。班里有个苏北同学，他们背后用非常难听、侮辱人格的话称呼他。当他的面，却称之为“法国人”。

这“法国人”的称谓，让我大惑不解。许多年以后，我才悟出上海小赤佬骂人的高明。苏北人在上海，大多从事服务业。所谓“扬州三把刀：剃头刀、切菜刀、修脚刀”。理发店的剃头师傅，大多是苏北人。理发店门口，常常有一个圆形的灯柱，里面转着红、蓝、白三色斜条。法国国旗是红、蓝、白三色旗。你是法国人，所以挂法国旗。从职业歧视，到地域歧视，拐了这么一个大弯，还是要骂你“江北佬”。

人到晚年，回忆着这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我心里充满了感恩，包括对那些欺负过我的上海小赤佬。人的成长，需要被呵护、被娇惯，也需要受欺负、被歧视。智慧是平衡发展的结果，情商同样需要被平衡地磨炼。如果一味被娇惯，我也许就永远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霸王。当然，如果一味被欺负，就可能没有自信而畏畏缩缩。童年时的交错体验，让你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生活中有玫瑰、也有荆棘。得意时不要忘形，失意时不失自信。特别是记住了一条：永远不要仗势欺人，因为被人欺负的感觉，我懂。

我吵着要回外婆家。只是回去玩一个假期，我央求；假期结束我会回来，我承诺。父母没有时间送，恰好我母亲有一个表婶，在上海帮人家，就是当保姆，她要回宜兴。表婶就在我们前村住，所以父母就托她把我带回外婆家。

跟着表婶，我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归乡路。

### 1-19 表婶送礼

俗话说：一表三千里。但我家这个表婶，也就是一表三百米。她家的前门是前塘河，外婆家的后门是后塘河，中间是菜园和“场”，间隔也就是三百米。

认真论辈分，她是我母亲的表婶，是我的表外婆。因为她年纪和我母亲相仿，我也就没大没小，跟着叫“表婶”了。鲁迅笔下有个豆腐西施，大约就是我记忆中表婶的模样。我跟着表婶，坐火车、乘轮船。我们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顺便走访了表婶的三、四家亲戚。每到一家，表婶都会送上一小碗猪油，作为见面礼。其过程，让我第一次领略了什么叫刀切豆腐两面光。

在第一家，表婶说：我带了几碗猪油，给你们的这只碗最漂亮。她说的当然是事实。因为其他几碗在那里明摆着，可比较，一目了然。

到第二家，表婶说：你看，这一碗最满。她强调的是数量。

第三家，她说：给你们的这一碗最白。强调的是质量。

最后一家，表婶说：这一碗最好，是一直藏着没拿出来，特地留给你们的。这就无法验证了，但任何人听了都会高兴，起码不反感。

回到村里，外婆自然是嘘寒问暖，问我一路的情况。我就把表婶送油的经过学了一遍。外婆听了，淡淡地评论了一句：“三角落婆”。

当时我不懂这“三角落婆”是什么意思，外婆也没有解释。我想大概是“媒婆嘴”的意思吧。后来网上有高人指点：外婆说的应该是“三姑六婆”。后来人生经历多了，理解到为人处世，诚恳待人，要用心，而不是用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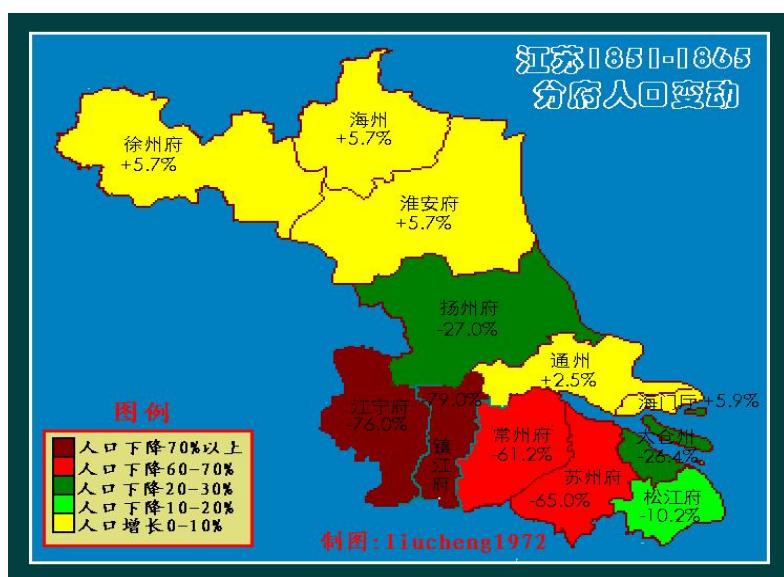
表婶家的大女儿是哑巴，不会说话，但极聪明。下面一连三个儿子，和我们兄弟几个年纪相仿，是一起撒尿和泥的小伙伴。六二年困难时期，宜兴那么富庶的鱼米之乡，也穷到饿死人。我们村上唯一饿死的，就是她家的二儿子。可以想见作为母亲的悲痛。表婶四十出头，就早早离世了。唉，一个善良的好人。

### 1-20 时空穿越

记忆中同表婶有关的，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走到村头，一脚岔进路缺口，猛一抬头，发现全村变了样。我看到了从没见过的宏伟大宅院，粉墙青瓦，门前一对石狮高大轩昂，墙上画着大大的红圈。

我待在那里好长一段时间，直到路旁的表婶喊了我一声：“大南啊，还不回家？”眼前的一切突然消失了，回到了往日的村景。

据村里老人说，我们这里原来是个上百户的大村庄。当年闹长毛，杀了村民无数，放火烧了这个村子。村西头的茅草墩，就是劫后余烬。我们经常可以从土墩里挖掘出精美的瓷片。现在的村落，是在废墟上重建的。我看到的，就是当年的老村。难道上天真的给了我一双穿越时空的慧眼？天晓得……



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地区来说，是一场大劫难。有一张地图，说明了“长毛”时期（1851—1865年）江苏地区的人口变化。

宜兴在常州府西厢，靠近镇江府，是重灾区。在“长毛”时期，镇江府人口下降了79%。常州府人口下降了61.2%。而与常州府一江之隔的苏北通州府，人口却逆势增长了2.5%。

宜兴万氏自然难逃这场浩劫。到光绪年间重修家谱，宜兴万氏南庵公一脉九房，只剩下大房、二房、万进才所属的三房、我们家所属的七房、以及九房。其余四房已找不到后人。一个合理的推测：这四房的后人逃难到苏北去了。

话说1872年冬至这一天，江苏清河知县万青选家里，诞生了一位女婴，按时令节气，取名万冬儿。

万冬儿自幼聪明伶俐，在父亲与客人谈话时，经常在一旁安静地倾听，耳濡目染，学了许多处理问题的本领。

长大之后，万冬儿进万公馆读书识字，并显现出出色的管理才能。处理事情精明强干。

我总觉得我们家的万朵，像极了这位万冬儿。

### 1-21 大有可玩

回到外婆家的那个假期，我玩疯了。捡田螺、粘知了、捉蜻蜓、摸鱼钓虾、爬树抓鸟……是啊，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玩的。

最好玩的，是跟着小舅到瓜田里去守夜。外婆家种了大片的瓜田，西瓜、黄金瓜、香瓜、水瓜……守夜，就是在瓜田里架起一张竹床，支上蚊帐，小舅还带上他那支竹笛，在野外过夜。繁星满天、蛙鼓虫鸣、凉风习习、笛声悠悠。什么叫人间仙境？此其谓也。

但我最想听的，不是笛声，而是另外一种声音。夜深人静，瓜田远处传来清脆的扑哧一声，那是西瓜熟透了以后的自然爆裂声。小舅会打着手电，迅速发现目标，然后把咧着嘴的西瓜抱回来。我们一起龇着牙大快朵颐。那种甘甜、那份水灵，城里人永远品尝不到。运到城里的，都是生瓜蛋子，沤熟的西瓜，再甜也带点馊味。唉，城里人，真可怜。

外婆家后门东边，是一大片竹林。我常把外公的竹刀偷出来，砍一株粗的，做水枪；砍一株细的，做弓箭。一不小心，把手削了，血流如注。外婆心疼得没有半句责备话。不，有责备，是冲着外公的：“竹刀这东西，也不放放好，让小孩子随便就能拿到！”我左手大拇指上至今还留着一个疤痕，就是那个年代留下的印记。

痛苦的日子永远难熬，快乐的日子总是飞快。转眼假期就结束了，要开学了，要回上海了。我开始耍赖，坚决不肯回去。是的，原来我承诺过假期结束就回上海的。夫小孩者，言不必信，惟好玩是归。

你们一定好奇我当年如何耍赖。嘿嘿，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难为情。小时候我让外婆娇惯得在家里脾气坏极了，闹起来惊天动地，谁也劝不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到了学校，却乖极了，老师的话，言听句从。外公常常批评我是“两面派”，把老师的话“鸡毛当令箭。”

结果，是外婆给外公下令箭：“明天到学校去找孙教导，看能不能让大南插个班？”

孙教导说：“我们学校又不是菜园子，想进就进，想走就走！”话说得难听，但面子是要给的。我如愿以偿，留在外婆家读书了。

那一年，我九岁，该上四年级了。

## 1-22 作文读书

四年级那一学年，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作文和读书。

我还记得首篇作文，是记一次郊游。小时候背的唐宋诗词，什么花褪残红、什么江水绿如蓝，不由自主地蹦到作文里来了。还用了“穿过了田野、跨过了小桥、渡过了溪水、登上了山岗”之类的排比句。老师大为赞叹，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在班上朗读了一遍。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我的每篇作文几乎都要被朗读。语文课上的作文讲评，是我最爱上的课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高中。我的作文本，成为班上同学的收藏目标。唉，不知有没有同学手头还保存了一星半点，我真愿意高价赎回来。

我自己的作文，除了第一篇，其余的都在记忆中模糊了。倒是我儿子万方在小学四年级时写的两篇作文，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一篇的题目是《一等星和六等星》，大意是说：仰望夜空，有的星星大而亮，有的星星小而暗。人们按照它的亮度，把星星依次分成六等。最亮的是一等星，最暗的是六等星。万方说，有的六等星，其实比某些一等星大得多，只是因为离地球远，所以显得小而暗。而有的六等星，其实并不大，只是因为离我们近，所以才显得大而亮。然后笔锋一转，说观察社会上的人，道理也一样。有的人其实很优秀，只是因为离我们远，看不到他的光彩，因此不被重视，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另一篇写的是《我最喜欢的动物》。出乎常人所料，万方最喜欢的动物，是乌鸦。他写道：一般人都不喜欢乌鸦，因为它长得丑，叫声也难听。甚至认为它不吉祥，因此讨厌它。文章一转，说乌鸦其实是一种益鸟，每年要吃掉多少多少害虫，默默地为人类做了许多好事。再一转，说有的人也像乌鸦，貌不出众，喜欢提批评意见，说的话不好听，但都是对社会有益的建议。结果被讨厌、被冷落。有一次我和阮铭聊起我儿子的这篇作文，他立刻联系自己，大声说：“我就是这样的乌鸦！”

在同一年龄段做比较，万方的作文写得比我好。不论文采，就思想境界、立意深远而言，要比我当年高出许多。

四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担任我平生第二项公职：图书保管员。农村小学没有多少书，全部儿童读物，都放在一只原来装肥皂的大木箱里。我负责出借登记、图书保管。书籍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中国民间故事和外国童话；另一类是苏联儿童读物。苏联读物中，记得有《铁穆耳和他的队伍》《阿廖沙锻炼性格》……，当然，其中还有我们胡学长也读过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如饥如渴地读遍了所有的书，有的书还读了好几遍。对我童年时代影响最深的，是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许多段落我抄过，甚至背过。

俄罗斯教堂的钟声，轻软地敲在我的心上……

### 1-23 过节演戏

小时候，我跟外公到戏院里去看的戏，除了华佗替关公刮骨疗毒，其余都记不得了。记忆中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出村里老乡自己演的戏，叫《打面缸》，是

逢年过节的保留剧目。套一句现在的流行语，该剧“很黄很暴力”。而我当年，“很傻很天真”，所以现在回忆起来，很逗很有趣。

这是一出四个丑角和一个旦角的戏。英驻村上的一位叫祥珍的漂亮姑娘，担纲女主角，演一个想从良的妓女。四个丑角：一个县太爷、一个四老爷、一个师爷、一个差役。村里有点谱的男人，都争着演这四个角色。

一开场，妓女跪求县官大老爷，恳请从良。县太爷顿起色心，一边把妓女许配给差役，一边打发差役去外地投书，想当晚就去差役家里占便宜。谁料“丑类所见”也略同，师爷和四老爷，也怀着同样的鬼胎。

捷足先登的是师爷。敲开门，调戏了几句，刚想有所作为，又有人敲门了。接踵而来的是四老爷。师爷慌忙躲到灶台底下。四老爷一副轻骨头样，肉麻话还没来得及说完，敲门声又起，吓得躲到了床底下。县太爷登场了。

县太爷的噱头最足，一改公堂上的道貌岸然，满嘴的淫荡小调。而且像变戏法似的，从裤裆下掏出酒壶，从宽大的衣袖里掏出一盘又一盘下酒菜。演到此处，全场往往笑翻了天。

突然敲门声大作。原来是差役觉得不对劲，在半道上折回来了。县太爷慌忙躲进了面缸。进门后，娘子为差役烫酒、擀面、煮饭。结果灶台里烧出了师爷，床底下拖出了四老爷，面缸内擀出了县太爷。一个个在擀面杖的追打下抱头鼠窜，一场闹剧落幕。

此剧是如此的贴近生活。因为在乡下，村干部仰仗权势，也常常上演类似的喜剧。看到大老爷们丑态百出、丢尽颜面，被人一顿暴打，谁都觉得过瘾。

后来在文革中看样板戏《沙家浜》，当胡传魁唱到“水缸里面把身藏”的时候，我就会从心里笑出声来，因为联想到了《打面缸》里的县太爷。我一直觉得胡传魁躲进水缸，其实同日本人没什么关系，应该是阿庆回来了，才更合情理。

我们有新编历史剧，为什么不按这种更合理的情节设计，来一出《新编沙家浜》？

我还设想，如果把《打面缸》的丑角换成某“书记”、某“部长”、某“秘书”，把妓女换成闻名中华的“公共情妇”，改编成小品，在春晚上演，一定十分叫座。

此类谬论，很怪很搞笑。以前一直没敢发表，因为怕担上恶毒攻击的罪名。现在我“老了，无所谓了”，在这里放肆一言，也博大家一笑。

### 1-24 当头棒喝

英驻小学很小，学生也不多。有一间房又高又大，原来是地主家的祠堂，平时是五、六年级的教室，全校甚至乡里开大会时，就是礼堂，《打面缸》就是在这里上演的。另有三间平房。一间作为老师的办公室，另外两间分别作为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的教室。

上五年级了，我满了九周岁，可以加入少先队了。入队仪式就是在教室兼礼堂。结上了红领巾，佩上了一道杠，敲起了队鼓，吹起了小号，飘起了星星火炬的队旗，心里那份激动，仿佛一切都升华了、崇高了。后来读《第三帝国的兴亡》，才知道有声有色的大场面，能对人心造成震撼，因震撼而盲目，是人类的普遍弱点。这一弱点往往被利用来灌输某种特定的价值。

我订阅了《中国少年报》和《少年文艺》，每一期、每一页都读遍了、读烂了。那个年代，求知的欲望，如饥如渴，渴得像海绵吸水。《三国》《水浒》，已不满足连环画了，找到原著，看得昏天黑地。喜欢高尔基笔下的阿廖沙，崇拜保尔·柯察金，还偷偷地爱上了冬妮娅……

因为学生不多，一间教室，两个年级，各坐一边。一位老师，同时上课。前半堂安排这边预习，另一边讲课；后半堂这边讲课，那边做作业。

五六年级的班主任，就是教导主任孙老师。有一次，他布置我们先预习课文，就转到六年级讲课了。他在那边问了一个问题，冷场半天，还没有同学举手回答。我虽然一只耳朵，却听明白了，还把答案想清楚了。于是在另一边就雀跃起来，举着手，半蹦着高，嘴里还喊出声来：“我来！我来！”生怕失去表现自己的机会。

没料到孙老师勃然大怒，用教鞭敲着讲桌，呵斥我骄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了不起。一顿倾盆大雨、当头棒喝，我懵了、蔫了，大概这就是所谓震撼教育吧？从此就灭绝了性格中的“张扬”，变得“少年老成”了。

前些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比较中美教育的帖子，对孩子的“自我表现”采取鼓励还是压抑，完全是两套不同的思路。也许，我的经历可以提供一个例证。唉，那一年，我还没到十岁。

当我再次转到上海念书的时候，在老师和同学眼里看到的这个乡下孩子功课好、懂礼貌、不是非，还……少年老成，几乎是零缺点，从此前程似锦。

这一切，要归功于孙老师的当头棒喝。❷

【述往】

## 我在内蒙兵团的经历（二）

张保和（美）

张老飞元旦

在火车上，我和同学校但不同班的胡斌，周健林、朱元星等人坐在一起。说来也怪，我们这几个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其中周健林的父亲是红学大师周汝昌，胡斌的父亲是工程师，朱元星的父亲是一中学校长，而我的父亲是建筑师。本来大家也相互不认识，但自然而然地就坐到了一起，一下就成了朋友。

当时，我们只知道是去内蒙古，但具体地点根本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拉特前旗位于包头市以西大约 100 公里，属于黄河河套地区。乌梁素海，中国的八大淡水湖之一，就在乌拉特前旗境内。乌梁素海据说是抗战时，中国军队将领傅作义为了阻止日本军队前进，将黄河河堤炸开而形成的。在大戈壁，大草原上形成了一个约 100 里长 20 里宽的人工湖，也是一件奇事。但我没有考证过以上的说法。

北京到乌拉特前旗不过 800 公里。就算是慢车，也只要二十来个小时。但我们的列车路上走了一天半，原因是我们的列车没有先行权，要让别的列车先过，所以花了很多时间等待。到了乌拉特前旗站后，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

以下的地图显示了乌拉特前旗的位置。



下了火车后，在黑暗中，我们爬上了已经在等候我们的拖拉机的拖斗车。拖拉机是那种四个轮子的，前面两个小的，后面两个大的。在我们那里，四轮拖拉机主要用来做运输，而履带拖拉机则用来耕地。我们把行李放在拖斗车的底部，人就坐在行李上面，远高于拖斗车的挡板。现在想起来，人坐在高于车辆挡板的行李或货物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后来就听说过有人从车上摔下来致死的事故。但在那时都是那样做，因为一是车开得都较慢，二是人命也不值钱。

我所在的内蒙古建设兵团二师十九团九连的驻地叫张老飞圪旦。圪旦即高地的意思，因为村子都喜欢建在高地上，那里的很多村子都叫什么圪旦。顾名思义，张老飞圪旦一定住过一名叫张老飞的人。张老飞圪旦在乌梁素海的最西北端，离前旗大约60公里，在河套平原的最北边，再往北走10公里，就是属于乌拉特中旗的丘陵地带了。那里离外蒙古边境也只有100公里左右。从前旗到张老飞圪旦这60公里我们走了大约三四个小时。因为拖拉机本身就慢，另外道路也很差，都是坑洼不平的土路。一路上尘土飞扬。等到了驻地，我们全身满脸都是土，已经互相认不出来了。内蒙的路况很差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反浆”现象。在内蒙，由于冬天气候寒冷，包括在道路在内的任何土壤都会冻起来。等到开春时，土地解冻，道路变软，加之被车轮碾压，道路上就会出现一条条深沟，甚至泥潭。所以在春天，车辆很容易被陷住。等到了夏天，返浆现象消失，但道路的表面也已是千疮百孔了。

下车后，一片漆黑。显然，张老飞圪旦没电。在今后我在那的五年七个月里，那里从没有过电。在拖拉机的灯光下，隐约看到几栋土坯房。每幢土坯房前，都有一个埋到地里一半的大水缸，是为大家日常用水而设。因奔波多时，再加上

路上尘土飞扬，下车后，自然口干舌燥，马上找水喝。所幸连里知道新兵要来，已经将缸里加满了水。我们就将水杯伸到缸里盛水喝。但水一喝到嘴里，发现是咸的。我先以为我的杯子里面不小心有了盐，于是把杯子洗了洗，再盛再喝，但水还是咸的。后来才知道，这里喝的水都是浅井的水，由于土地盐碱化，水里含盐碱度非常高。长期喝这种盐碱水对身体一定没好处，另外，盐碱多的水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滑。用这种水洗衣服，尤其是用过肥皂后，好像衣服总是涮不干净。

因为累了，我们在土坯房里的炕上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走出了房门，往周围一看，看到了我们一生最为震撼的一幕。张老飞圪旦不过就是在大草原上的大约十来幢土坯房。周围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农田或荒地，几乎看不到任何村落，任何树木。所有我所熟悉的一切，亲人、楼阁、街道、商店、车辆、树木、都市生活等等，都好像是在另外的一个世界。

对我们这些从北京市中心闹市来的人来说，这一幕实在是太陌生，太可怕，太震撼了。我和胡斌、王铁铃、周健林等几个同学随后走到在营区后面的大渠上面向南大哭一场。忽然一下，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开始考虑自己的将来。但一想到我有可能在这么荒凉的一个地方度过一生，实在是太恐怖了。但这也是我记忆中在内蒙唯一的一次哭泣。因为哭泣实在没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就不再哭了。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了在内蒙的新生活。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些只有十几岁的青年应该还在学校里读书，在父母的呵护之下生活。但现在，我们要在无论在气候、工作或生活上都要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独立生存。但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必须去适应、调整、学习。

## 九连

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与1968年9月，下属第一、二、三、六师等共六个师，分布在内蒙各地。每个师又下辖几个团，而每个团又下辖几个连队。我们中学的所有的人都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建设兵团二师十九团九连。内蒙古建设兵团二师十九团的团部设在乌梁素海最南端的坝头村，下属的连队都分布在乌梁素海的周围。有的连队是渔业连，像在坝湾的一连，坝头的六连。渔业连的

主要工作是在乌梁素海里打鱼以及其他一些副业。我的挚友赵仓就分在一连，刘文森在六连。我所在的九连则是一个农业连，主要任务是种地。

九连一共有三百多人。其中有五个现役军人任连级职务，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加上一个军医。十几个复员军人任排长，班长的职位。九连还有一些原乌拉特农场的场员，其中还有一个人闹出事来，我会在以后叙述。知青的数量应该在三百人左右。除北京的知青外，还有天津、保定等地的知青。后来在1970年里又来了一些浙江余姚的知青。在刚开始时，知青的岁数应该都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

还有些知青是找关系自己来的。像石家庄步兵军校的一些子弟。我们班里的张志廉就是其一。其中印象较深的自己来的还有北京来的干部子弟林燕南和他弟弟林燕北。后来这些自己找关系来的又都自己找关系走了，大都参了军。

因为兵团连级以上的职位都由现役军人担任，大家都认为兵团近似军队，较正规，较严格，家长也比较放心。现在想起来，由军人管理确实有其好的地方。大多数现役军人都很尽责，管理确实也比较严格。但军人受的训练是去打仗的，而不是生产。他们只会用军队的习惯和方法发号施令，但对怎样让地里长出粮食来，则是一窍不通。这是兵团不能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他们用那一套军队的纪律来管理那些知青也并不适用，到底知青和军人在职能，待遇等很多方面十分不一样，不能等同对待。

从1969年开始到1974年解散，我们九连的指导员一直是王世祥，而连长则换过几任。王世祥指导员皮肤黝黑，参加过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其实他才四十四岁，但很显老，所以大家都叫他“老指”。他好像是上海郊区人，即江苏人，但在北方人的部队混迹多年，口音已是四不像了。听说因刚开始拒绝听从分配到边疆来，他还受到了处分。从指导员受处分这件事看来，当时很多现役军人恐怕也不愿意到兵团来，也嫌苦，但军令如山，最后只好服从命令。老指工作非常勤恳，非常辛苦。但不管环境怎样艰苦，老指的军装总是很干净整齐，让我印象深刻。在这一点上，他可能还是有江浙人的习惯。一会我讲他的一个故事。

现在想起来，那些连里的现役基层干部大都已是四十来岁的人了，但还要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和知青们一道摸爬滚打，也实在是非常不容易。在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中，实在没有任何赢家。九连解散后没多久，老指就复员回老家了。他的

家乡是鱼米之乡，复员后的日子应该不错。但听说老指复员回乡后不久就过世了。这可能和他在内蒙的辛劳有关。

九连的连长换过好几任，其中印象较深的是第二任连长赵明亮。他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因为他的个子很小，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土豆连长”。土豆连长也是个工作狂，经常跟着我们一块下地干活。我的排长刚开始是复员军人蔡正福，后不久他就找关系调到团部去了。他的继任是外号“老黄牛”的另一复员军人赵竹君，干活也特别卖力气，是劳动模范，一直和我们待到九连解散。

前面提到，兵团实行供给制，发军装并管吃。当时军装十分时髦，年轻人都以穿军装为荣。但兵团的军装其实不是真的军装，而是用质量很差的平纹布做的假军装，穿不了几天就破了。所以大家还是要穿家里带来的衣服。一年后，发的衣服穿破了，家里带来的衣服也破了，所以大家衣服上都是补订。我还学会了自己补衣服。后来连里弄来一台缝纫机，有专人给大家补衣服，省了大家不少事。

除管吃穿外，刚开始一月发五块工资。第一次发了两个月工资，十块钱。因为我父亲那时还拿生活费，家里较拮据，我将其中五块寄给了我妈，另外五块寄给了我的干妈，包静安。他们那时家里被抄光，一点收入也没有，生活非常困难。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干妈》就是为纪念她而作。后来我们的工资好像是一年涨一块。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军装就不发了，但工资长了一些。后来在网上看到，国家为每个去内蒙兵团的知青发了四百元安置费，但不清楚这些钱是怎么花的。

刚到兵团时，已经八月底，农忙季节已过，我们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军训，包括各种操练，齐步走、正步走、跑步，甚至一些军事动作，像匍匐爬行等等。每天早上6:30听号起床，起床后一个小时早操，晚上10:00听号熄灯睡觉。所以，刚开始的生活非常军事化。

在军训中，匍匐爬行是一个非常累的活，在寒冬腊月都爬得满头大汗。身上的棉衣本来很脏了，爬一次后，就都磨干净了。但衣服也很快就破了。当时政府的想法可能是一旦和苏联开战，我们这些孩子兵也可以被派上些用场。记得只有第一年里有军事动作的训练，后来就没有了。

我是属于那种较散漫的人，在严格的军事生活中，自然不适应。其实我自己还是挺想做得好一点，只是在班长，排长的眼里，总是做得不够好，经常受到处

罚。记得有一次，我和另外几个人跑步总是跑不好。到了吃饭的时候，蔡正福排长让别人都去吃饭，而罚我们在操场继续跑。蔡排长自己也不吃饭，盯着我们跑。好不容易跑够了，蔡排长又要给我们训一通话。这时，不知怎么回事，连里的一头猪跑过来，拱了蔡排长一下，惹得我们哈哈大笑。这一下，蔡排长更生气了，又让我们跑了好一会才罢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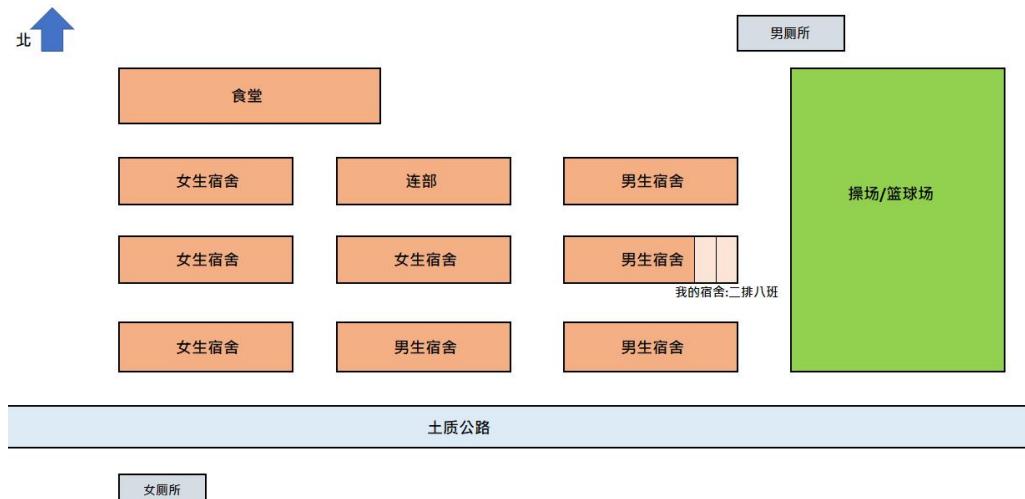
按照解放军的传统，士兵在饭前一定要唱歌。我后来在一部九十年代拍的连续剧《走向共和》中看到，袁世凯训练的新军在吃饭前都要唱“谢饭歌”，谢袁大帅赐饭。不知解放军饭前唱歌是不是和新军唱“谢饭歌”一脉相承。一般是一个排在一起列队，唱文革时期流行的歌曲，像“大海航行靠舵手”“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但在饭前，大家早已饥肠辘辘，哪里有心思唱歌，所以就敷衍了事，唱得飞快。这时排长就要我们重唱。可大家是越唱越饿，而越饿就越唱不好。所以经常要反复唱好多遍，最后弄得不欢而散。饭前唱歌这个习惯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复员军人都走了才没有了。

在1970年要和苏联打仗的风声很紧。现在看来，这还真不是空穴来风。正是苏联要跟中国动武的压力致使毛泽东向美国摇橄榄枝，从而导致了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尼克松访华后，紧张形势缓和，不知和后来停止军训有没有关系。但半夜紧急集合的训练好像持续了好几年。紧急集合大约都在半夜一点钟左右。最难的是还要在一两分钟内打好背包。打背包是个技术活，要又快，又整齐，又不会散。然后背着背包列队跑步跑好几里路。第二天早上照样按时出操，上工。

## 住

整个张老飞兵团营区大约有十多幢土坯房，其中九幢主要土坯房都宽约30米，深约5米，分布成三排，三列，呈三字形。连部在第三排的中间一列，火房较大，是在最北边单独一幢。除连部，火房外，每幢土坯房有四个门，八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大炕，占据了房间大约一半的面积，是典型中国北方室内布局。每个门都有一个里间，外间，住一个班八个人，一个炕睡四个人。每个炕都连接着一个用泥砌的灶，用于做饭或冬天取暖。

以下就是一张营区分布的简图。



九连营区里没有街道，没有商店，只有营区前一条鲜有车辆通过的土路。因为新鲜，每当一辆汽车偶尔从连队前面的公路驶过时，很多人都会跑出来看，向汽车招手。这恐怕也是一种试图和外面世界联系的努力，起码是精神上的联系。因为我们实在太孤单了。

一到九连，我就被分配到二排八班，住在东列，第二排房的最东边的门里。我在二排八班一直待到73年夏天。刚开始，二排八班班长是复员军人杨万四。班里最初的成员记得有张志廉、胡斌、刘志国、小谷、小崔、李振坤（傻六）、张战州等人。

在内蒙生活的一个极大挑战是气候。张老飞圪旦属于沙漠型气候，昼夜温差很大。好处是不管白天多热，晚上总是很凉快。但那里冬天的天气极为寒冷。在11月初就冻冰了，要到三四月份才化冰。而我们大多数时间又在室外作业，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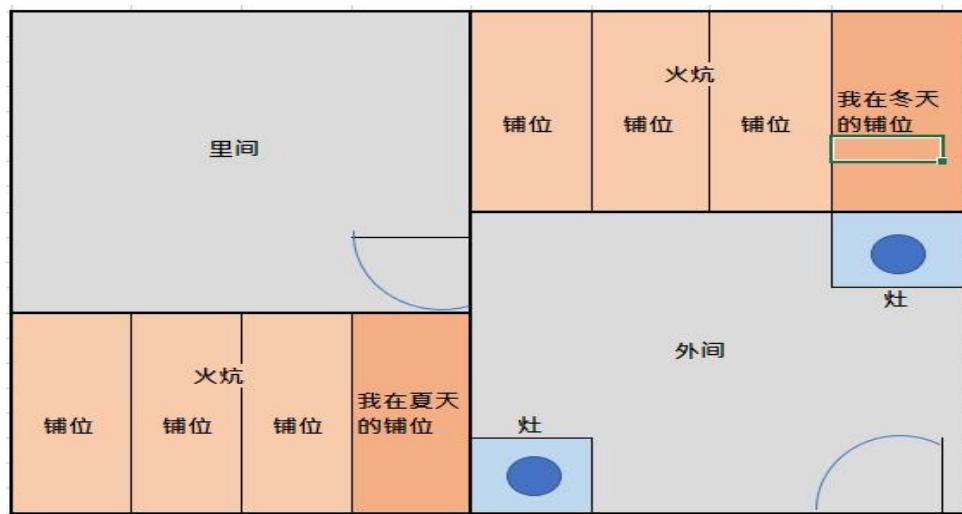


加寒冷。为了御寒，当地百姓冬天都穿皮衣皮裤。学生们刚开始还不愿多穿，特别是不愿意穿棉裤，嫌难看。后有一从保定来的王姓同学因不穿棉裤受冻，得了急性风湿性心脏病，险些丧命，应了当地的一句老话，“爱俏不穿棉，冻死不可怜”。后来大家就都学乖了，穿起了棉裤、皮衣。也开始睡毡子、皮褥子。在冬天如果不穿皮衣，戴皮帽子，很难在户外长时间活动。有一次冬天外出，我坐在开放的卡（1972年夏在二排八班宿舍前）车斗里，尽管皮衣皮帽裹身，但脸一直被

迎风吹，将脸部冻僵，下车后有一个多小时，脸上都做不出表情。在很冷的地方不能戴口罩，因为口罩一下子就成了一块冰坨子，贴在脸上，比不带还难受。

在中国北方，人们都习惯于睡土炕。每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占据大约半间房面的土炕。因为炕一般都和灶相连，也有取暖的作用，所以也叫作火炕。初到内蒙，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睡土炕。在北京，我们家里用的都是弹簧床。因为弹簧床都是软的，我们家里的褥子都很薄。另外我们家是南方移民，被子都是从南方带来的，也是又小又薄，所以在临行前特意买的前面提到的木棉褥子。但木棉褥子看起来很厚，但用几天后，里面木棉就结成了几大块，移到脚部。我基本上就像是直接睡在硬土炕上。因一辈子从来没睡过硬床，刚开始的几个月，睡得我浑身都痛。到了冬天，更是雪上加霜。那时大家没有时间，也没有煤或其他燃料烧炕。我的身下是冰冷的硬土炕，上面是又小又薄的棉被，真不知道我的头三个冬天是怎样混过来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我在72年春节第一次探亲后，从家里带回来厚褥子，厚被子，又在当地买了羊毛毡子才有所改善。

我本来是睡在里间靠墙的一个铺位。杨万四班长为了自己住得舒服一些，充分利用自己当班长的特权。在夏天就睡在外间对着门的那个铺位，较凉快；到了冬天，就要换到里间紧靠灶头的那个铺位，较暖和。而我正好在杨班长想要的那个冬天的铺位，于是在第一年（69年）的十一月初，杨班长就让我和他换了铺位。下面是我们住的房间的一个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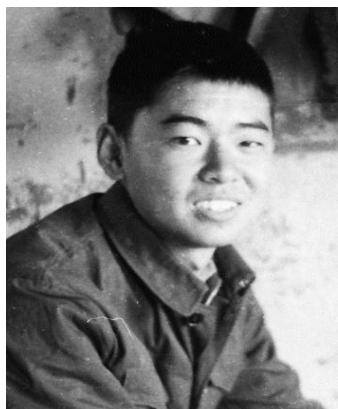


在1969年初冬的一天，杨班长从他的一个复员老兵老乡那里弄来一条狗。因为那时城里不准养狗，我们这些城里来的人都很少见到过狗。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喜欢带着那条狗玩。但几天后，连里发了话，不能养狗。杨班长就只好

决定将狗打死，吃狗肉。一天，我们将那条狗带到打麦场，用棒子，铁铲等将狗活活打死，十分残忍。如果在美国这样做是要牢的。据说，炖狗肉一定要时间长，狗肉才能烂。于是，第二天，杨班长专门让两个人不上工，留在家炖狗肉。具体是哪两个人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我是其一。具体的分工是一个人捡草原上的干枯植物，一个人烧火。另外，杨班长还特别指定用连着他的铺位的那个灶烧，目的是将他的铺位烧热，让他晚上睡觉暖和。那两个人烧了一天，到了晚上，狗肉也烧得差不多了，但忽然发现杨班长的被褥起火了。原因是那时灶和炕都是泥砌的，在长时间的火烧下，灶和炕接缝的地方就裂开了。因杨班长的铺位就在灶旁边，窜出的火苗就将杨班长的被褥点燃。说时迟，那时快，在我们将火扑灭后，杨班长的被子基本被烧光。

当时，被子是个人财产的很大一部分，所以杨班长为此号啕大哭，非常可怜。杨班长好像在这不久，就回河北老家了。这些老兵也是响应政府号召，来到边疆。但待遇可能也不尽人意。如果不能被提升为干部，在收入上也不会有什么进步，还要受背井离乡之苦，还不如回乡种地。所以不久后，大多数的复员军人就都走了。

另一个生活上的挑战是内蒙的蚊子特别多，也特别大。人在地上走路时，头顶上就老有一团蚊子跟着，飞得很慢，发出像飞机一样的嗡嗡地响。因为个大，它可以叮穿薄衣服。当一个蚊子在叮我们的胳膊时时，我们肌肉一绷，蚊子的嘴就被肌肉夹住，跑不掉了。这时，我们都可以看到蚊子的肚子因吸满了血，都变成红色的了。如果用手再将蚊子拍死，皮肤上就是一摊血。蚊子喜欢早上和傍晚出来。所以早晚出门，要特别小心。当地人用一种马尾做得像太监用的拂尘一样的东西，边走边挥，驱赶蚊子。如需要早晚上厕所，则非常麻烦。如身上有任何一个部位露出来的话，蚊子就会蜂拥而至，享受一顿人血大餐。一下子，那个露



出来的部位就会被叮满了包，痛苦异常。记得我和胡斌在夏天浇地上夜班，在一清晨胡斌就有过这样一次被蚊子攻击的经历。刚去时，被叮得特别厉害。后来时间长了，好像好一点。不清楚是被叮惯了，还是蚊子叮腻了，不爱叮了。记得有一次在写信时，我就随手抓了两个蚊子放到信里，寄给对方看。

左边的照片是我坐在何锦弟、王铁岭房间的炕上照的。我手下的应是用箱子络起来的桌子，上面放的书是毛泽东选集，当时唯一可以看的书籍。

在张老飞圪旦是绝对没有地方洗澡的，就是擦擦身而已。我在内蒙第一次洗澡是利用到乌拉特前旗拉粮的机会在前旗的一个澡堂子洗的。那时，我已经到内蒙大约一年半了。因为脏，我后来还长了虱子。在1972年第一次回家探亲时，把家里吓得够呛。我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才虱子给弄没了。

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是草原上很少有树。我记得只有在乌拉特分团部附近有几棵树，我们连营地附近一棵也没有。刚去时，连里还弄来一些树苗，种在连队前面的空地上，但那些树苗一棵也没活成。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草原上种树那么难。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向往着找到合适的树种和技术在空旷的大草原上种出大片的树林来。

因张老飞圪旦没电，我们都是用煤油灯。但烧煤油有烟，所以我们的鼻子里都是黑的。天黑后，读书很难。好在那时除了毛泽东选集外，也没有什么书看。记得刚开始时，大家都有从北京带来的手电筒。一到晚上，一道道手电筒的亮光在连队营区闪烁。没几天，那些手电筒的电池就用光了，营区就只剩下了煤油灯昏暗的灯光。

在内蒙，还经历了几次沙尘暴。那时整个世界都被黄沙笼罩，一夜之间，任何东西上都盖上一层厚厚的黄沙。早上起来，就像从黄沙里钻出来，觉得人都快给埋起来了。在北京，天气预报都说沙尘暴是从内蒙古来的，但内蒙的沙尘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过那时的大草原环境实在是非常好，可以说没有任何污染。蓝天白云，加之绿绿的大草原，风景非常美。可惜那时人们连饭都吃不饱，谁有心思去欣赏风景呢？

## 食

这个章节的题目也可以叫“缺食”，因为在内蒙的近六年中，最缺乏的就是食物，基本上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我们当时的政府发的月伙食费是十三块五毛，粮食定量是一个月四十五斤，再加四两油，但实际的供应多少，或是供应什么，就要依情况而定了。确实，我们本来应该是自己生产粮食，自给自足的，但因为土地、经验、技术等种种原因，一直生产不出来。另外，随着文革的深入进行，

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也是每况愈下，全国的粮食供应恐怕都非常紧张，所以，我们这些在食物链末端的人群就很自然的没东西吃了。

刚开始时，除了玉米面窝头，有时还有馒头吃。一天三顿，一顿四两，两个窝头或馒头。因为食堂人员没有经验，馒头经常有没有发起来或碱放的太多等问题。因内蒙严寒的气候，蔬菜很少。一年起码有半年没有蔬菜，只能吃咸菜，海带等。即使在夏季，蔬菜的种类也很少。我记得经常吃南瓜。刚开始时还有些油，到后来，油也没有了。肉当然更少了。加之高强度体力劳动，光靠那一顿两个馒头或窝头根本不够吃。

很快，馒头没有了，改成光吃玉米面窝头了。玉米面窝头当然不如馒头好吃，较硬，但还是粮食，还较经饱。在大约1971年开始，玉米面窝头也没有了，改吃白薯面了，这样开始了我们在内蒙最最困难的一段时期。白薯，也叫红薯，面是由白薯干磨成的，而白薯干则由白薯切成条晾干而成。用白薯面做成的窝头逞深褐色，有些透明，也有些弹性。咋吃起来，有些甜味，还可以。但吃的时间长了，特难吃。因为白薯干本身经常已经发霉，做出的窝头也有一股霉味，使它更加难吃。最主要的是，白薯不是粮食，不经饱，吃了后，一会就饿了。那一阵子，如果能吃一次玉米面窝头就是改善伙食了。不知为什么，蔬菜也是越来越少。有一段时间，老是吃海带，都吃伤了。我到现在一看到海带，还害怕。最差的时候，连海带或咸菜也没有了，只有用辣椒面下饭。

在文革中，时兴吃忆苦饭，就是弄一些很难吃到东西给大家吃，如野菜汤，麸皮窝头等，说那是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时人民吃的饭，对比现在，让大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可就是在我们已经吃白薯面的地步下，也还要吃忆苦饭，当然不外也是野菜汤加麸皮窝头。我记得不知为什么，有一次忆苦饭是在伙房后的煤堆旁，全连集体吃的。为了使忆苦饭好吃一点，火房在野菜汤里加了一些平常没有的油。这一下子可好，野菜汤供不应求，因为大家好久没有吃到油了。就是因为这一点油，忆苦饭成了改善伙食，真是天大的讽刺！

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O’ Henry）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饕餮姻缘》（Cupid Ala Carte），里曾经讲到，如果能把一个快饿死的人脑子里想的东西编成一本书，那将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菜谱。我可以证实人在极端饥饿的时候，脑子里确实想的都是吃的，而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菜谱，那可能要依那人过去都吃

过些什么而定。我在那些日子里脑子也都是在想吃的东西，不是家里的饭，就是北京饭馆的饭。有时候也和同学一起回忆北京的生活，像逛王府井，吃馆子等等。我的一个姨夫叶笃庄有过二十年牢狱之灾，在狱中饱受饥饿煎熬，也证实了这种情况。

欧·亨利在那篇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埃德·考利尔，试图用节食来获取一个姑娘的芳心，但最后终究不能忍住饥饿，没能坚持下来。他在放弃节食后，也就是放弃了追求那个姑娘后，誓言要在牛肉里打滚，在鸡蛋和火腿里洗澡，并要将世界吃成饥荒。小说里说的自然是夸张，但我是特别能理解这样的心情，因为饥饿真是可以让人不理性，铤而走险，甚至疯狂。以下是几件我能记起的关于饥饿的事情。

大约在1971年春天，全连的男生都去四连大余太附近挖渠。那可是一个特别辛苦的工作。人就住在工地旁的帐篷里。每人一天的指标是要从坝底挖一立方米的土再将其担到坝顶。一担泥土起码要一百斤重。这是我第一次扛这么重的东西，肩膀都磨破了。因为体力消耗太大，饭随便吃，但只有玉米面窝头，也没有菜，只有咸菜。我一顿最多吃过九个二两一个的窝头，再加半脸盘玉米面粥，加起来应该是超过两斤的粮食，是我饭量的最高纪录。

那时一年大概可以吃到两三次肉。好像连里每年在春节时杀一头猪，为了春节改善伙食。但其中一部分要留到七月份，麦收时吃。那时也没有冰箱，肉就放在存放蔬菜的地窖里，温度相对较低。但到了七月份，肉也已经长蛆了。但我们也不在乎，都吃下去了，因为太饿了。

在最饥饿的时候，我们曾去马圈偷吃马料。马料那时是榨过油后的豆渣，硬得像石头一样。但我们也把这种生的豆渣吃下去了。我的同班好友胡斌还记得有时候我们饿得晚上睡不着觉。有一次麦收后，有些麦子放在场上，因为太饿了，我们在夜里将没有脱壳的麦子煮来吃。但带壳的麦子根本不能消化，不但不解饿，还引起胃痛、便秘种种问题。

大约在1970，兵团乙型肝炎流行。我的好朋友赵伦，就是在一连染上乙型肝炎的，而我所在的九连的乙型肝炎病号也不少，大约每个班里都要有一，甚至两个，所以起码是十分之一的比例。乙型肝炎病号给吃面条，作为病号饭。那些

病号一般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而我们也不顾传染不传染，就把病号吃剩的面吃了下去。幸好我还没被染上。

我记得因为粮食不够吃，有一阵子连里弄来一些土豆，煮了给我们吃。有些土豆都已经发黑变质了。一次同班的李振坤和国绍斌打赌，赌注好像是五块钱，将一盆变质的土豆都吃下去了。李振坤果真将那盆土豆吃了下去，赢了这个赌，但之后好像他难受了好几天。国绍斌因为输了赌注，想把输的钱赚回来，过了几天又和李振坤打赌，将一脸盆白开水喝下去。就在国绍斌马上要把那盆水喝完时，他的鼻子和嘴忽然同时像喷泉一样往外喷水，使其前功尽弃。结果国绍斌两次打赌都输了。

1972年夏浇灌时期的一天，伙房弄了些鸡蛋来给大家改善伙食。我们八班正好轮到夜班浇地。因为正好不睡觉，我，胡斌，李振坤就在夜里从伙房的窗户爬进去偷了十几个鸡蛋吃。后来，李振坤把我和胡斌告发了，他自己算是立功赎罪吧。后来老黄牛排长也没有怎么样，让我和胡斌在排里做了一个检查，草草了事。老黄牛排长是个好人，他知道大家都太饿了。

还有一件奇事不得不提，但不是关于人的。在中国北方过年改善生活一般都是包饺子。北方的习俗是年三十包饺子，年初一吃。因包饺子太费时，伙房没时间给大家做，就把面和馅都发到班里，让大家自己包。1970年春节，我们班包好饺子后，将其放在灶台上，就去睡觉了。饺子是为了十二个人吃的，数量起码有七八百个，而且个很大。那时大家都特别能吃，很多人一顿可以吃一百个饺子。可是初一醒来后，发现饺子一个也不见了。刚开始还怀疑是被别的班恶作剧，给藏起来了，但后来发现原来是耗子干的坏事。内蒙草原上的耗子特别多，特别大，特别厉害，这我们早就有耳闻，但厉害到一夜将七八百个饺子全部搬光，实在不可思议。大草原上，人烟稀少，又缺食物，不知那么多耗子怎样生存。不过那次的七八百个饺子应该够它们吃一阵子了。

我父亲滴酒不沾，所以我们家从没有喝酒的习惯。在去内蒙前，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喝过酒，但到了内蒙后开始喝酒。在70年春节和何锦弟、胡斌、王铁岭等一起过春节。那时特别想家，开始借酒浇愁。喝的酒好像也不是烈酒，而就是一种廉价水果酒。但我喝了几口酒，就醉了。据何锦弟记忆，我好像还说了不少胡话。到内蒙后大家都喝酒，所以也是环境逼着你喝。另外，在那种艰苦的环境

里，喝酒也提供一种暂时的解脱。通过练习，我后来最多可喝半瓶烈酒。但是，我的胃也被喝坏了，后来一喝酒就胃痛。那可能是酒本身对胃就很有伤害，那时又没有什么菜下酒，基本上是空着肚子喝。再加上我从前又没有喝酒的训练，所以胃一下子就受不了。在内蒙，几乎每人也都抽烟。但我一直没有染上抽烟的习惯。我对抽烟喝酒天生就没有兴趣。

回京后，因为没有了喝酒的环境，就马上不喝了。我父亲滴酒不沾，我好像也没有喝酒的基因，所以放弃喝酒对我来说一点不难。,我父亲也不喝茶和咖啡，但他还喜欢喝可口可乐，这可能和他后来得糖尿病有关。现在，我一方面像我父亲滴酒不沾，也不喝茶和咖啡，另外又进了一步，连任何饮料也不喝，只喝凉水。

那时，中国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一般大约是四五十块钱，但那可是要用来养家糊口的。所以，五块零花钱应该并不是太少。但我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对钱根本没有什么概念。刚开始，每月发了工资后，用自己的五块再向别人借五块凑成十块去买两个罐头和两瓶酒和几个朋友吃一顿。我记得乌拉特小卖部有种梅林牌红烧肉罐头，里面一半都是白花花的猪油，但那时根本吃不到油，绝对没有胆固醇的问题，猪油多多益善。那两个罐头几个人分，一人也就是几口而已，但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就一分钱也没有的花了。那时连肥皂，牙膏等都不用了，过一种近乎原始人的生活。

大约在1970年里，父亲的工资恢复了，存款也还了，家里开始寄些钱和食物来，但也不能太多。我的父亲在当时是高工资，我母亲家里也很有钱。在文革后期，我父亲的工资被恢复，我家被没收的银行账户都已发还。在当时，我们家应该可以算是在中国很富裕的家庭了，但我在内蒙还是因吃不饱，饿得皮包骨头。这恐怕也是文革时期特有的一个怪事。当时的问题是，家里也不能给我寄太多的东西，因为寄多了，会给我找麻烦，让我戴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罪名。胡斌还记得有一次，王指导员将大家家里寄来的东西在连队里展览，以此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家里寄来的东西当然也在其中。但后来这些东西还是还给了我们，没有被没收，说明那时连里干部的作风还是挺清廉的，不过大家也不太敢让家里寄东西了。

另外，大家都没有吃的，即使你有吃的，也不好意思一个人吃。但如大家分的话，有多少也分不过来。所以只好都不吃。尽管是这样，有时候，家里还是寄一些东西来。我探亲也会带回一些。我一般就是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块吃了。

何锦弟还记得我家曾给我寄来咖啡，午餐肉，凤尾鱼罐头等食品，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煮咖啡喝，吃午餐肉，凤尾鱼的情节。在七十年代初在内蒙大草原上喝咖啡，肯定是开风气之先了。有意思的是，我到美国四十年，从来不沾咖啡，而咖啡在中国则已是大行其道。提起午餐肉，我有一次一气吃了一整罐家里寄来的午餐肉，吃伤了。后来很多年后，我都不要再吃午餐肉了。

在北京，甚至在国外，得知我在内蒙生活过多年后，经常有人问我内蒙的牛羊肉好吃不好吃。说实话，我都不大记得在内蒙是否吃过牛羊肉。另外味道在那时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了。除了一年一两次猪肉外和前面提到吃过几次狗肉外，我记得吃过一次马肉，还有一次骆驼肉。骆驼肉特别膻。吃完后，嘴都膻得张不开。另外还记得我们去老乡家买过一两次鸡吃。牛奶及羊奶是绝对没喝过。不过我在内蒙学会了一样东西，嗑瓜子。我在北京从来不嗑瓜子，但在内蒙过年时有时有葵瓜子吃。直到现在我有时还会嗑葵瓜子。

几乎在我们营地的正北，五六里远，有一个较大的村落，当时叫五工区。那里也有一个商店。记得那有一样北京没有的东西——白糖。在北京，白糖是定量的，要票，好像是一户一个月一斤，多了绝对不能买。但在五工区的商店里随便买，但好像也没什么人买。仔细想起来，糖是一种副食品，用来当主食的调剂品或是在吃饱了以后当零食的。如果没有主食，白糖也不能当饭吃，自然也就没什么需求了。

吃的好坏和生活状况当然会影响到身体。那时大家都是瘦得皮包骨头。我一米七五的个子，还不到一百斤重，肯定是营养不良，而营养不良也造成了我在1975年病退回京。在后来的一个名为“病退”的章节里会对这段经历有较详细的描述。在1970夏天，还得过一次很厉害的痢疾。从此，我就很容易泻肚，成了到现在还有的后遗症。另外，就是老寒腿。如膝盖受了凉，就会疼，到现在也是这样。■

【述往】

## 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七）

杜钧福

### 二十六

在新的12连，我们重新分了班，郑少白、朱振和和我在三排十班。这时彼此开始熟悉，连队里提倡开展思想斗争，在班里也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斗争。这是1968年底。

刚到这班的时候，正在搞“忠字化”。青海盐湖所的康宁和高原生物所的沙渠到小站买来一张毛主席像，贴在宿舍墙上，衬以红纸。没想到第二天一看，由于浆糊是湿的，红纸上的红颜色透了过来，弄的主席像挺难看。于是，班里的两位党员开始上纲，说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是对学习解放军的态度问题。康宁很不服气，说我们贴主席像就是从解放军那儿学来的。另一位组员也跟着批判他们两个，而且更不讲道理。

在我们班，班长分配这位组员和我组成“一对红”，就是两人经常在一起谈心的意思。这也是学习解放军。我和他谈了一次，发现他只说别人的坏话，从不作自我批评。

到了冬天，农活少了。开始练习打背包和紧急集合。一天夜里四五点钟吧，号声突然响起来。大家赶快起来，穿衣，打背包，然后背上背包到外边排队。我们都有思想和物质准备，并不被动，也就用了两三分钟。站好队后，连长说，三点多钟，有美蒋一个团在塘沽空降，我们的任务是去搜索。于是我们在连长带领下，在野地跑了半个多钟头，就回来了。

回来后洗脸吃饭，免不了议论这事。盐湖所的田安生、周元荣说，连长讲话慢条斯理，不像有紧急情况的样子。他们又说，连长平常讲话就是这样，等于收回了对连长的批评意见，但为时已晚。马上，这位组员和一位党员就上纲，说他们是对解放军的态度问题。另一党员在作了自我批评后也跟着上纲（可能他也说了什么）。被批评者当然不服。周元荣老实，没说什么。田安生说你别想从批评人中捞到什么。旁观的郑少白打抱不平，也参与进来，说你批评人家，你作得怎

样？

于是这几天都用来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积极的思想斗争、学习解放军问题。田安生和郑少白受到批判，说他们的说法不利于开展积极思想斗争。一天下午开会，又说这些问题，有人说要讨论能不能从批评中捞点什么的问题。大家都不同意再讨论。我所的吴逸民就说了一个补塑料布的问题。

冬天里天寒地冻，没什么大田农活可干，入冬以来我们主要在屋子里开会。但我们九、十两班承担一项补塑料布的工作。所谓塑料布就是育秧用的农用塑料薄膜。其中有些破了，要用电烙铁补好，待来年春天用。这活容纳不了很多人。我们两个班轮流，每天出两个人。一开头是九班的陈挺恩先从解放军那儿学来技术，然后教给我们。

前一天轮这位组员和九班的伍鸿基值班。中午他得意洋洋地说，我和我徒弟补了三块半。但他补的很马虎。陈挺恩检查时向他提出意见。他不服，使劲扯陈补的塑料布，说陈也补得不好。陈当然非常不高兴。在下午的会上，知道事情经过的吴逸民就把这事说了。因为陈挺恩跟我说过此事，我就在会上更详细的说了。这位老兄没什么说的，因为这正是典型的对待批评的问题。他作了检查。但吴逸民和我的发言，后来仍被认作逆流。

过了几天，班里又讨论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形成两种意见。两位党员认为，必须彻底批判阻碍积极思想斗争的言论，如能不能从批判里捞点什么。否则就有顾虑。他们自己就有顾虑。班里别的人除一人未发言外，都明确认为，过去的事不应再讨论，应针对新出现的问题。

自此以后，这位老兄成了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典范，成了不可批评的人。谁说他不好，首先两位党员就和谁急。好比说，有一天，他接到他妻子一封信。他说他爱人要下放，但他表示不回天津，可到了晚上他又回去了。他请假回去挺容易。第二天，他妻子又来了明信片，原来根本没下放的事。郑少白说，回去就回去，唱什么高调？一位党员马上横眉立目地说，你了解情况吗？后来连里领导知道了真相，让班长作他的工作。班长刚一提，他就大叫，说别人对他政治陷害。领导对其爱护，是让班长私下作工作，但他不买这账，闹得人人知道。

应该说，两位党员都不是坏人。他们也不是一点理也不讲。他们的问题，主要是自己的党员意识太强，不肯混同于普通老百姓，所以总是站在老百姓的对立

面。当他们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时，他们是通情达理的，完全可以交朋友。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党员时，就变得横眉立目，不近人情，不讲道理，以至于穷凶极恶，为虎作伥，为恶势力张目。他们以一种自己不完全明白或完全不明白的是非标准为判据来判断是非，从而根本丧失了是非观念，表现为严重缺乏正义感。他们所理解的党性变成了人性的丧失。

又过几天，不知为什么，聊天聊起了戚本禹。有人说，66年底保守派成立联络站批戚，各有各的帐，戚当时支持造反派，他也是两面派。这位组员说，他们的组织也加入了这个联络站。我很奇怪，说你们不是造反派吗？他说确实加入了。

可过了一会儿，他找班长，说有人说戚本禹支持造反派，要给戚本禹翻案。别人问他前后的话是怎么说的。他说都忘了，只记得这句话，一定要批判。我提醒他说过他们曾参加批戚联络站事。他又否认说过此事。到了晚上作一天总结的时候，他坚持要批判这一“反动言论”，一直闹到12点。最后连长指导员都来了。他们说，这很好办，这句话本身是错误的，但又有后面两句，至多言辞不当而已，以后注意就是了。这样，他才作罢，累了一天的我们才得以睡觉。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政治陷害。但没人批评他。

69年中，连里总评，班里的人都对其有意见。但排长仍要把他评为“五好战士”。排长喜欢他，因为他要两面派。班里开会，如果排长不来，他就不怎么发言；如果排长来听会，他就一二三四，讲得头头是道。当然也许排长和他是一类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为以后的事实所证实。

## 二十七

在农场的“再教育”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斗私批修”。

那年头搞运动，最重要的就是想出一个新名词，用以动员群众。所谓“斗私批修”也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而是文化大革命中想出来的新名词。这在1958年叫作“兴无灭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牺牲自己，为人民群众；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这就是社会生活政治化，政治生活道德化。共产党员被认为是建立或基本建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生活目的完全不是为己而是为他人，为共产主义事业。所以他们无须思想改

造，即使谈思想改造也有不同的含义。而我们这些人，不但要改造思想，而且要脱胎换骨的改造，光扒一层皮是混不过去的。这就是我们大学六年和进研究生院以后下乡四清以前每天要作，或至少每天要说的事。大致来说，如果生活稍微好一点，这个思想改造就强调得多一些，生活困难一些，如在饥荒时期，强调得少一些。

我们几乎每天干这种事，有真假两种动机。真动机是真信，真想改造自己思想。假动机是应付。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我自己是二者兼有。我想，舍己为人，总是一种高尚品格，自己确应仿效。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比较幼稚，对这些还很信，总觉得自己好像是有罪，老是在作检讨，但渐渐感到困惑。首先，我感觉，为别人多想想是办得到的，但不为自己想是绝对办不到的。想根除这种“个人主义”无异于自己抓住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是根本不可能的。往往是用更高级更隐蔽的私代替初级的简单的私。结果私字斗不掉，却增加了虚伪性。

其次，我发现，说那些党员已经解决了世界观问题实在大谬不然。在他们中间确有少数是很好的，起表率的。但也有相当多的人不见得比普通群众高明。而且，如果把他们身上的问题也说成是个人主义的话，那么他们的个人主义和普通群众的个人主义是非常不同的。被他们所批评的普通群众的个人主义往往是好吃懒作、不思进取，在我们这些人就是只专不红。而那些党员干部，他们的个人主义的表现就要复杂和曲折的多。我认为，普通老百姓的所谓个人主义，其实算不得什么个人主义，只是一种生存的本能，或者政治上不怎么开展，不愿意或不会到党支部去汇报而已。而他们那些人的个人主义，才是货真价实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

所以，对那些年代流行的政治口号，我原则上都衷心拥护，但我有自己的理解。这理解可能非常不同于我身边的那些人的理解，是否符合那些口号提出人的初衷我就不知道了。我愿意改造自己的思想，但怀疑能否改造，而且认为改不改没什么了不起的。普通群众的思想也应改造，但也有一个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但是，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不改造，我们国家就会变修。这就是我对“兴无灭资”或“斗私批修”的理解，而且我认为我的这种理解是原教旨的。显然，这里面有一个内在的矛盾：难道党员干部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吗？

我还特别反对一种说法。他们说，右派分子之所以是右派，就是因为他们太自私了。“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是反右时常说的话，目的是把右派分子从道德上根本否定。现在，党员干部们吓唬我们说，你们再不改造思想，就要变成右派！我对此说极为反感，认为是对革命理想的亵渎。我说，个人主义不一定发展成右派，对大多数人不会发展成右派。以这种理由来改造思想，是很消极的。

但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造思想就是一种被动行为。他是你追求某种其它目的时的副产品。一个革命者，他的感情是被激烈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在这种感情作用下，他的思想会升华到一种崇高的境界，并表现为崇高的行为。这一境界不是或主要不是靠主观修养得来的。过分强调修养则为唯心论。这是我对刘少奇的批判的思想基础。

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思想改造的课题无人提起。广大群众回想过去的所谓思想改造觉得颇为可笑。党支部那些人老批评这个那个太自私，老追求个人利益。他们确不追求，因为他们不追求自有人给他们送上门去。例如每年的困难补助，总是给党支部的人。所以那段时间老百姓觉得解放，很重要的是没人老要求他们自我检讨。文革以前长期倡导思想改造在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中造成的原罪感基本上消除了。消除之后，就很难恢复了。文革后社会的变迁，这是基本条件之一。

在造反派掌权的一段时间里，没人提学雷锋。大家觉得，那好像是一种过时的东西。而过去倡导的一些事，如知识分子的革命化、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都以一种全新的、更自然的方式体现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高度统一。我们认为，这更合毛泽东思想的本来意义。

军宣队进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斗私批修”，这个课题作为一种“原罪”重新提起，而且把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好，派性什么的，都归之于知识分子的思想不好，受的是旧教育，必须进行再教育。

我听了不少人的这种“斗私批修”并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发现有少数老百姓还是真斗或者有真斗的成分或试图真斗，但多数人，特别是头头，则是借斗私攻击对方，以更大的私斗较小的私。还有工宣队，借斗私之机搜集整理造反派头头的材料，和小说中的牛虻在教堂忏悔而被主教利用一事极其相似。

到了农场，本来就专为接受再教育去的，当然免不了再搞这一套。可当时不搞业务，没红专关系问题。不搞文化大革命，对文革的事都有些忌讳说。劳动呢，大家都卖力气，但力气大小不同，与思想不一定有关。所以，接受再教育就和作好事相联系。大家努力作好事，表现自己。其极端者，每天自动掏厕所，说大粪臭，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更臭。

我对这事有保留。我认为，作好事的唯一的目的应是好事被作，至于作好事的主体并不重要。这才是真正的无私。例如这块地方脏了，要打扫一下。打扫的唯一目的应是使这块地方变干净。这是唯一纯洁的目的。从这一目的出发，如果有别人打扫了，目的就达到了，而没必要同他争。如果这里面搀杂了别的目的，就使这件事变味了，异化了。所谓别的目的，说是思想改造，其实说穿了，还不是想弄个五好战士当当，还有人想入个党什么的，仍然是为稻粱谋。所以，本来是为了改造思想，却弄的思想更复杂，更肮脏。还有，你抢先干了这个活，不是显得别人落后，剥夺了别人当五好战士的可能性吗？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大家抢着干一件活，就像面前有块蛋糕，大家一齐去抢一样。这样的作好事搀杂了更多的政治目的，本身就特自私，还特虚伪，因而特没劲。我不愿上赶着作这种好事，当然也不愿显得特懒。所以我在这问题上持一种中性的立场。其结果就是我没评上五好战士。当然也许有别的原因。但到了到达农场的第二年，大家把前途看明白了，这种做好事的劲头就松懈下来了。我这种中性的立场就显得不太差了，于是就在最后一次被评为五好战士。

从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各单位以来，另一种活动是开展忆苦思甜。我们在所里还吃过忆苦饭。其实在四清运动中，我们就开展过此种活动。但农民们往往忆起58年之苦，令工作队员尴尬。我们到农场之后，这样的活动益发普遍开展。我们或听录音或自己开会，进行这一活动。

在我听过的忆苦录音中，最甚者要算进驻北京鼓楼中学的军宣队指导员所作的了。这位指导员主要控诉他的母亲在旧社会被阶级敌人杀害。她受尽酷刑，死得很惨。除去对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有疑问外，我对其代表的忆苦思甜作了思考和批判。

所有这些，都企图说明一个道理：旧社会是地狱，是火坑，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千万不能走回头路。但这种教育，对我们并非首次。我认为，这一批判在

量上是极端的，在质上并不深刻。对旧社会为什么黑暗，我想或许有远比这种忆苦思甜更深刻的表述。

旧社会当然黑暗，但也不是没有光明。有男盗女娼，也有仁义道德，而这仁义道德也不能都说是假的。有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也有阶级合作，尽管这阶级合作未必都很情愿。所以，旧社会之苦，在数量上并非极端。

我所感受的对旧社会最彻底的批判，是蕴涵着深刻的人道主义的鲁迅、老舍、巴金等大师的著作。在国外则有托尔斯泰、契柯夫、雨果、罗曼罗兰等人。老舍先生描绘了向上的、年青的祥子的毁灭，不就是对旧社会最痛切的批判吗？人力车夫老马和小马祖孙的命运，以及后来小福子的命运，使祥子失去了他最后的希望而走向彻底堕落。

鲁迅先生更为直接地批判、诅咒他所说的“非人间浓黑的悲凉”、“深广而久远的苦痛”。在这个社会里，人分十等（而不是简单的对立两阶级），每个人被人吃，又想吃人。这是何等的悲哀！让我们读一读《复活》、《第四病室》、《狂人日记》、《祝福》这些著作吧。我们从中得到的感受是“忆苦思甜”所绝对不能比拟的。

正因为我对旧社会的苦的认识有一些想法，我又想了与此有关的另一问题。不是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吗？当然中国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样说不合逻辑。但如果把此话理解为不要退化到任何人剥削人的社会去，也未尝不可。但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先要识别是否已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是否有这种识别力呢？

我想，假设现在已发生资本主义复辟。那么。新的统治阶级如何向我们，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呢？我想，他们复辟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很可能就是忆苦思甜。他们要把资本主义（或其它旧社会）描绘得比实际要苦的多，使人们不觉得现在已复辟了资本主义。或者拿鲁迅先生的语言来说，所谓忆苦思甜，就是处于奴隶时代的人们回忆做奴隶而不得时代之苦。这是奴隶主安排他们作的，目的是要他们安于被奴役的现状。

从这一分析出发，我对当下是否已复辟资本主义打一个问号。我怀疑我所需的是冲破铁屋的呐喊。然而以上都是发生在我思想内部的事。我从不对人说。

## 二十八

1969年春，我们农场开始清队。这是意料中的事。谁都不奇怪。

我们到农场之后，所里关于清队的消息就不断传来。

先是所里自己组织工宣队，由所工厂的工人进驻实验室。所工厂的人都是我们的造反派哥儿们，能整出什么？但很快，整个院里进驻了真正的工宣队。我们所的来自一个毛纺厂。原来来自空军的军代表早已撤出，换了一批军宣队。

我们在农场，体会不到这些军工宣队进驻时是什么声势。我们只知他们进驻不久，就有两个人自杀。一个是六室的刘彭业。他是北大63届毕业生，办公室和我们在一层，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所以很熟。他父亲是动物所的专家，运动初期曾受到冲击。他死的很惨，先是喝了硫酸，痛苦到极点但一下子死不了，又从三楼跳了下去。他为什么自杀，谁也不知道。

另一个是四室的曾振强。他是上吊而死。他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谁也想不出他为什么自杀。

稍后自杀的是七室的朱砚磬。她也是大学生，不知道在何处被打成右派分子，也许已摘帽，但摘帽右派和不摘没什么区别。她终身未嫁，在我们下农场前也没人触动她。后来听说她参加了议论“中央首长”的事而被整。她死的也很惨，是躺在宿舍的床上，手脚缠上电线，最后一合闸。她死时穿上一件她最好的红毛衣，但死后手脚都烧焦了。我想朱砚磬，还有上述两位，可能是失去了对生活的哪怕是一点点的希望。

新的军工宣队对毛主席表现得更忠。马俭的名言根本不容许重复。当人们批判马时，说反革命分子马俭丧心病狂，竟敢猖狂攻击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什么什么，他们马上跳了起来，说你们岂不是在扩散反革命言论吗？怎能容忍这样作呢？在他们看来，这正如审判纵火犯时，自己或让犯人当场再放一次火一样。所以从此以后，除去原来知道的人不敢说以外，谁也再不能知道马俭说过什么，工宣队成员也一样。他的名言被封在档案里，成为最高机密。这实在是我所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事，也正是军宣队工宣队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实在不可救药的明证。

大批各色各样的人被揪出来，多数是“现行”问题。我们室运动初期因瞎画而揪出的那个“反党分子”又重新收监。没有一个能找出毛病的人能漏网。

在我院，我所情况大概属中等。上海植物生理所在工宣队进驻后，全所职工被关在所内，不许外出，后来据说抓了三分之一的反革命，65年毕业的大学生也被打成特务，还抓了什么“梅花党”。这是当时流传的手抄本小说的内容，现在成真的了。此外长春光机所搞的更是恐怖，有各种各样的残酷刑罚。东北地区大致都是如此。文革后期我去大连出差，听说当地文艺界一位非常著名的人在担任军代表支左期间，发明了一种称为“鼻钩”的刑具，在审判清队对象时，用这种钩子钩住对象的鼻子，将其全身吊起来逼问口供，据说很有效。后来我翻阅过“人类酷刑大全”之类的书，未看到有这样的刑罚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周扒皮之“半夜鸡叫”，目的是叫长工早点起来干活，是很功利主义的。而“鼻钩”之类，似乎本身就是为了拿别人的痛苦取乐。鲁迅先生说奴隶造反成为奴隶主之后，比原来的奴隶主更加凶残。信哉！

除以上情况外，其它的消息就是谁谁揪出来了。揪出的人有各色人等，罪名最多是现行反革命，其实就是说了一句什么话。告密和陷害受到空前鼓励。夫妻子女好友之间相互揭发。粟达人也被揪了出来，因为他替坏人张目。还有就是我们这些人都被贴了大字报。张殿琳跟我商量，说所里有他的大字报，是不是申请回所参加运动。我说大可不必，因为如果要你回去，不回去也不行；如果不叫你回去，申请也没用。

我们农场也有人跃跃欲试。有一次乘给连里提意见的场合，有人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文工团，团里有一个地主出身的演员，在戏里扮演正面人物，在演戏时借剧情的需要殴打贫农出身的演坏人的演员。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他这话是有所指的。当时连里抽调了几个人经常出去演出。里面有我们研究生张殿琳和张泽湘。他们都是地主家庭出身，拉了一手好胡琴。这话就是冲他们去的，问连里执行什么阶级路线。还风言风语听说，还有人提找什么人画画儿的问题。

既然涉及我，我不得不说话。我在班会上说，你们知道我们农场大田里一个字一人多高的大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是什么人竖起来的吗？这都是原来这农场的劳改犯干的。他们能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之中有什么人不能干呢？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的责任。

然而，渐渐就有所里人来外调了。但没找我。

然后，院里从我们部队揪回去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同学，数学所的胥鸣伟。

另一个是徐鲁溪，因为讲了江青的坏话。据说都是周恩来批的。

没揪我们回去，但我想逃不了这一关。

果然，部队里传达了开展清队的决定，说以正面教育为主，不搞批判。但恢复了夜间值班，显得形势紧张。经动员后，各人均讲自己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经过，也就是把可能与问题沾边的事全都交代清楚。在我们班，我和朱振和经历的事最多，自然成了重点。其标志就是军里派来一位协理员，曾参加我班开会。我不知道什么是协理员，但看他岁数较大，想级别不低。这次班会后，他冲我摆摆手，我就跟他出去。他问我，朱振和讲的怎样？我当然说不出他如何。

我和朱振和每人写了一些材料。其内容就是针对当时整的问题，主要是“反三红”：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就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言，我们确实对周恩来总理我院运动的领导有过不同意见，并议论过。但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也不是领头的，这事谁都知道，不可隐瞒。当然所有涉及总理联络员的是也全都交代清楚，因为他们说我们反联络员是假，反总理是真。还有另一件事我很担心，那就是我也议论过江青。那是在66年底，江青接见合同工临时工的代表，听他们控诉文革前受到的迫害。江听着流出了眼泪，还罚劳动部长马文瑞他们站着，斥责他们。过不了几天，中央就下了通知，宣布解散合同工临时工的组织“全红总”，江青接见那天通过的一些决议无效。显然江青干了一件蠢事。她接见的那些人肯定不是好人。但我说话还很谨慎，我只是对徐鲁溪说，江青不应流泪。流泪是小资产阶级情感。这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我交代了。另外还一句讲谢富治的。我想关系较小。在这方面还有保险柜事件。虽然我没直接参加，但知道一些情况。

至于反军，虽然我们不认为我们反解放军，但往这方面联系还不是没材料的。其主要的就是四川问题。“武装保卫成都”就是反对解放军。这就是当年“红成”的观点。对这个逻辑我一直不明白。

第三点是反对革命委员会。这个问题也有。那是1968年，朱振和倡议在所里办一个油印小报《全无敌》，是否算革委会或造反大队的机关报不记得了。他找了几个编委，我也算一个。有一次，他约革委会写一篇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文章，结果到时候没写出来，也许他们根本没学。于是，朱振和就在报上开了个天窗，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都同意这样作。后来，我们挨批的时候，人

们引经据典，说开天窗这种方式，是原来对付国民党的，是对付敌人的斗争方式。所以，我们这样作，就是把革委会当敌人，当然就是反对革委会。

这些问题，我写了几十篇稿纸，交了上去。

过了些天，我所室里党支部一位成员来农场，挨个找人谈话，连里也有人在座。他对我说，我还有问题没有交代。我实在想不起什么问题，心里很不愉快。但又过了些天，连里副指导员找我，把我写的材料退还给我，说我不过是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而已。谁能说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学得很好呢？我把这些材料烧了。

在“忠字化”时，还出过一件事。为迎接“九大”，我们班在墙上弄一些关于党史的图案，边框用葵花。当然是由我来画。这是画熟了的图案。画的时候先画中心的圆，然后将圆等分12份，画花瓣。为什么12瓣呢？因为12瓣对称而8瓣太少16瓣太多。但就是这12出了问题。我在红纸上画好就去干别的事了，由别人去剪。我过了半个钟头回来，发现我们班长张茂盛正在急忙将贴在墙上的图案撕下来。我问为什么。他连说不好看不好看。我说不好看也没必要这样急。他还说不好看。我过了一会才明白，原来有人说或者说发现，12瓣的葵花像国民党党徽。其实即使都是12，二者也不一样。但问题是班里的人在剪我画的图案时，或者缺乏艺术细胞，或者贪图方便将曲线剪成直线，形像就变了样。以后我画葵花再也不画12瓣。当然再后来什么也不画了。

张茂盛是绝对好人。他在作的是赶快消灭罪证。以后这事在农场从未谈起。也许那个害人精不知道。但回所后批清时还是有人贴大字报提出这个问题，说某人为什么如此如此，但没下结论说我在为国民党招魂。我只能对有关的所有人表示感谢。

“清队”当然不只是我们物理所的事。像我们隔壁九班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的研究生，几乎清一色都是造反派，后来成了“反军”（其实是反许世友）的“好派”，当时受到很大压力，回所后继续受迫害。北京的其它几个所，情况也大致如此。

清队在几个女生连里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恐慌。要知道，像我们团的11连，有好些从戏剧学校芭蕾舞学校来的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当然也有人说她们比我们更有社会经验）。在她们中抓阶级敌人，实在是非常荒谬，但谁也不敢不认真对待，57年反右时17岁的右派多得很。而且据说，她们中的“敌情”比我们这儿

还严重得多，我估计主要是“反江青”的问题。在清队进行过程中，女生连中相当多的人精神极度紧张，几度发生讲错话的情况，把该打倒的说成万岁或相反。对这种顶风作案极端反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行为，部队方面只能严肃批判，彻底消毒，别无它法。然而这批判又引起了更厉害的精神恍惚和紧张，在批判会上又继续说错话，越是忌讳说的话越挂在嘴边容易说出来，弄的谁都下不来台。■

### 【资料】

## 反党分子迟群、谢静宣言论摘录批判材料之三

清华大学材料组编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 目 录

- (一) 谢静宜在昌平桥梁工厂的讲话(摘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二) 迟群在欢送毕业生去青藏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三) 迟群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上的插话(摘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
- (四) 迟群谢静宜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 (五) 迟群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
- (六) 迟群同机械系毕业班要求去农村、边疆的部分学员座谈时的讲话(摘录)  
(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日)
- (七) 迟群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 （一）谢静宜在昌平桥梁工厂的讲话（摘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这次来想和同志们见见面。同志们对我们很亲热嘛，我们很受感动，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给我们连在一起的，没有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我们是不能在一起的。原来我听说同志们在斗争中东西被盗了，衣服丢了一部分，仍然坚持走开门办学的道路，坚持搞教育革命。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我们应该检讨，同志们这种精神我们是很受教育的，这次来给同学们带来几件大衣，给同学们穿。

以前我们对刘冰这个人是很尊敬，是很客气，认为他是个老同志，因此多次征求他的意见，我们有什么缺点你给我们提一提，我们坚决改正，及时改正。每次征求意见，他总是说没有，你们做的行，可以可以，可是没想到背后插上一刀。

从现在看来，刘冰这个人确实是很毒的，很狡猾的，我们工农兵学员，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一刻也不能忘。

他们为什么从我们开刀呢？因为是毛主席派我们来掺沙子的。他们想赶我们走，我们不能走，我们不能白来啊！工作困难，压力比较大，我们一定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正因为这样，刘冰你越是叫我们走，我们越是不能走，跟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定了。他们从我们身上开刀，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北大也是一样，一开始先告三十六军，后告八三四一，诬蔑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在哲学系前边画了五张漫画，把工人宣传队画成是毒蛇、蠢猪，否定教育革命，从教育阵地开始。在清华我就跟柳一安说过，你完全忘了本，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能登上无产阶级教育阵地吗？你能当上党委副书记吗？谁看得起你？

脓包不一定在哪里鼓，教育阵地上有脓包，总是要破。教育革命联系到整个社会，社会上不是有人说：工厂不是唯生产力，而是不生产，反对批唯生产力论。

刘冰等人为什么总要反对我们呢？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我们并不害怕，这是好事，就是要公开出来教育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刘冰的信在全校念给同志们听，刘冰听了就发抖了，他害怕了。教育革命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搞对了还是搞糟了，是前进中的问题。过一、二年就有

人翻一次案，根本问题是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只清华大学，而且教育革命也要解决，要辩论清楚。周荣鑫部长刚刚上台不到一年，就讲了那么多怪论，有人问能不能贴他的大字报，我们说可以贴。他讲了那么多言论，我们有什么不能反驳他？要辩论清楚，他文化大革命前就是走资派。

我同你们并不认识，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我们连在一起。你们要给毛主席争光，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们是上不了大学的。上大学搞开门办学到工厂和工人结合，没有白来，受教育，思想收获很大。

他们说要培养杨振宁、李正道这样的人，培养专家，只专不红。我们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和美帝、苏修有根本区别，不一样，如果我们要培养这样的人，我们和他们不也是一样了吗？有人说五年之内不要工农兵学员，我们说十年之后也不给你们。以前就和刘冰争论这个问题，是很激烈的。我们工宣队前一段受压，压得够呛，现在才清楚了，是好事，我们也很受教育。

我们参加过一些宴会，象“八一”招待会，“十一”宴会，有些事看不懂，有些 人要给照相，我就侧着身子，怪怕把我照上。感到有些思想不对头，我们在第二桌，他们老干部在第一桌，有的人离得很远，挤过去同一些老干部握手，到一起就谈不完了，没完没了，老干部犯了错误，被解放后他们在一起谈批斗了多少次，这是什么意思？岂不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有些人很不像话，还背着手装喷气式，表示挨斗了，好像挨斗的次数很多，斗了一百多次。他们对我们新干部、年轻干部看不惯，冷冰冰的，这是些现象，青年干部受压，不解决这些问题，文化大革命成果巩固不了，还是毛主席教导的很鲜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救了他们。

这次使全国都受教育，是好事。教育革命怎么样，报纸上这几天登得很多，全是教育革命的事情。有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光登教育革命的事，很想问一问，有的单位打长途电话来问，每天就有 40 多单位来问这个事，朝农感到奇怪，也来问，这几天为什么光登他们的文章。来清华参观访问的人很多，昨天有四十八个单位，四千多人。周末那天有八千多人来参观，这是个好事，是一场阶级斗争课，我自己上，大家也要上。我们要很好地批刘冰反对我们的教育革命，我们在开门办学的道路上，要以实际成绩，来进行驳斥，是不是像抽风似的瞎胡闹。

## （二）迟群在欢送毕业生去青藏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不讲阶级斗争这个纲，要谈基本路线，那是一句空话，要谈什么现代化统统是空话。不讲阶级斗争这个纲，同志们去参加铁路大会战，你那个铁路再长，那也是给资产阶级修的；你到农村扎根，粮食打得再多，那是给地主资产阶级打的粮食；我们宁肯少一点，要的是无产阶级，这一点很重要，不仅过去重要，现在重要，将来更为重要。

同志们即将奔赴我们的国家各个地方去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这个斗争的关键时刻，同志们像一颗一颗的火种，撒到全国的各地，同志们要充分意识到这种大好形势，同时要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就是主席所说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 （三）迟群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上的插话（摘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

△（当荣泳霖介绍完外地在天安门事件时的一些情况后）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便于领导运动。情况不要往外讲，最近1~2天出现的事情。有两句话，“北大不大中华大，清华不清人民清，”这些东西知道就行了。

△（当x x x讲到对一小撮不能手软，听说逮了一批，我们很高兴时）开批判会时，一个内容，就是要批x x x，x x x。该捕就捕，该开除的就开除，不能显得党委无能为力。“永不翻案”的人翻了案，“不得人心”。

△研究一下形势：校内、校外，不研究不行，不然是盲目的。反击反革命逆流，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要一查到底，该捕就捕，该关就关，该审就审，这些人这么嚣张，这个问题研究一下，定下来，那些该报公安局的，提出来。去年七、八、九没有人查，现在为什么不查，他们还在十年后见分晓，这是什么言论。有的更严重，就要查，就要审，就得捕。

## （四）迟群谢静宜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李士存谈到追查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重点对象情况时）

迟群：今后对重点人，对学员发生的事情，一定把家中情况讲清楚，作点分析，有的可以把家庭范围扩大一些。什么原因促使他犯罪，要追查。出身写清楚，是走资派或犯走资派错误。

谢静宜：这次统统追下去，管他到那里，去年没查、没算，是批邓无力。

迟群：少数单位查到部一级、军区领导、省委书记头上去了。不敢查了，顾虑可以理解。现在中央下了决心，要查到底。三令五申后还有顾虑，就是本人问题了。为什么不查呢？为什么不敢查呢？

（当李士存谈到要“对于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嫌疑分子要列入专案，发动群众进行审查”时）

迟群：标准是什么？一千多人仅三人（按：指全校去天安门的一千多人中有三人是重点对象），少了点，是否面太窄了。试化厂就没有？有些人就去，抄反动诗词，传反动诗词，就要批，管他什么人？不抓不批不审查，怎么能讲清楚？不能一笔糊涂账。否则怎么谈得上清查呢！不能一步一步让。开始比如审查50人，100人，逐步清楚，区别开，最后可能缩到十几人。

谢静宜：区别，必须有个过程。由大到小，逐步清。清查后再区别。

（李士存谈到建工系打了招呼还去天安门的有61人时）

谢静宜：先清查，处理放后。

迟群：处理并不难。每单位去多少人？拍照多少？抄反动诗多少？写诗多少？几个数字，总的人次，值得提出的几种数字。在性质问题上能说清楚的，搞个集中的东西，作点分析。

谢静宜：有人去了，讲去看看，但也要讲清楚，人多难分了，坏人不多，人少就好分了，吴德同志讲话就是让多数人走，其中也有坏人跑掉了。有一个人在民兵指挥部揭瓦，一听吴德讲话，眼看着跑了。如果群众少，就好办多了。所以去看看也是上当了，吃亏了，要讲清道理，吸取教训。这种人主要是教育。

迟群：前面讲的，这么多谣言，这么恶毒的诗词，为什么去抄？为什么如获至宝？为什么甚至想藏起来，不交出来？你又不是创作者、制造者，为什么隐瞒、传播、掩盖呢？我们现在不能说这个人是反革命，但是很不正常的情况。我感到不正常。

谢静宜：这些人为什么那么感兴趣？什么动机？有什么任务？为什么？要认真追查。反动诗词的内容，谣言的内容，同他的立场、世界观和思想产生了共鸣。为什么在这个背景下，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引起了共鸣？不能离开这个背景。表现就是不批邓，对批邓有抵触情绪，运动阻力很大的地方正是在天安门广场最活跃了，最起劲了，我们这些人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对这件事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否则不是左了，就是右了，就会把严肃的阶级斗争看成一般的事件。

谢静宜：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去七机部八十四次，他们对总理的话一次也不听。现在却表示敬爱了，为什么？

迟群：看来天安门事件同外地有些事有相似，有联系，相配合。天安门事件在清明前后活跃起来了，手段相当恶劣。总理逝世时，清华的邻居，不得了了，外面舆论似乎造成清华反总理了。有人喊着“保卫”，但在逆流面前，搞得不坚定了。当时，我们校内不是有那么一些人当时就转向了，就没有坚定的立场了。水利系就有个班要送花圈，越谈越对立。

越来越清楚，他们手段很卑劣，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后来一戳就穿，就是妄图分裂中央，转移批邓的大方向，让邓小平东山再起。这次天安门前就是如此。有的搞悼念活动一褒一贬，一抬一压，这就是反革命活动，服气不服气，就是这个性质，为什么那么活跃？为什么不跟党委要跟反革命走？为什么打了招呼之后还要去？为什么多年的工作在你身上一下子化为乌有？与反革命却一拍即合。

政策问题还要研究，包括打招呼的时间问题。

有的人查查历史还很好，有的有毛病，有的没什么毛病。查家庭，有的可能有问题，有的是走资派还在走的原因，有的是杀、关、管的原因，阶级的原因。有的可能看不出原因，就是不学习，不改造世界观，堕落成新的反革命，被拉下水，堕落了。天安门事件回答了这个问题，各种亮相。有的老反革命全家去，有一个老反革命七十二岁了，还去。如何联系这个问题来认识？去分析这种现象

呢？每个人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少数人是要算一算的。告诉那个同志，我们和你谈到几点钟，这是对这些同志的爱护。林彪自我爆炸温都尔汗，大家有震动，当邓的三项指示为纲出现后，谁又想过天安门事件的出现？矛盾转化就是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成为对抗性矛盾。批邓，有人就散布“主席保邓”，批邓，有的人不了解，还极力吹捧邓。有的党员、团员、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党的建设，不谈这个问题行吗？这是个实在的问题，要迫使每个人回答这个问题。是否一开始就如此认识？现在再逐步认识，到什么程度？清查要注意这个问题，本身也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教育，表现在现在几个数字上，根本在提高阶级斗争觉悟，提高对运动的认识上。不是收场了，当前对运动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性质还没搞清楚，怎么能说收场了呢？

迟群：“听信谣言不可避免”这个观点就可以拿出来议论、讨论、辩论。“有真有假”，“从上面来的”，“上面没批”，“无风不起浪”都是这一类的观点。有人说我怀疑清华党委对总理是否有感情，等等，实际上在他那里已经有了结果。他们的问题很清楚，他们的用意非常明白，出几个问题让我们被动，他们想出一个我们不好开口讲话的问题，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的本意不在悼念上。说他们用悼念进行反党活动并不过分。

迟群：这样做下去，不必担心扩大化的问题，不用担心伤了一些不必要伤的人的感情问题。

（当xxx谈到查谣言已查到干部子弟身上时）

迟群：够格的干部子弟传谣，搞清楚，党委单独打一个报告，给中央，如实报告。有的老子不一定吓人，大官，不是走资派，有的老子吓人，大官，儿子也吓人。这个情况，搞一个材料，搞2、3期简报，能快的，就搞个报告，给中央，报市委。确实，有一些人把一些老同志、工农兵学员吓住了，这些人甚至没有级别。干部子弟总的是个好的印象，但确有一部分人不知什么情况，有的捕风捉影，有的人以假传真，有的造谣，确实有人上了当。大批判会上念一段希特勒的话（即重复多遍即成为真理，靠谣言起家等等意思的话），星期四批判会是这个内容，现在看来火候还不够，首先是认识上的问题。

我们不要上当，似乎清华园里基本矛盾变了。在干部子弟中，他们是孤立的。

（汇报完后）

迟群：前面插话已经说了，

1. 关于认识问题。对追查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如何提高认识？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是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暴露，是邓小平反革命路线的必然结果。清查是深入批邓，不可避免，势在必行的一个重要的具体内容。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天安门事件，矛头就是指向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矛头对准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性质是严重的，斗争是激烈的，是有你无我的生死大搏斗，没有调和余地，要有足够认识，不能有任何调和主义、折中主义的观点，书生气十足是不行的。斗争不是孤立的。至于这方面提出的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阐述，以后再讲，要带着这些问题，学习马列、学习主席有关教导。

2. 关于清查。作了刚刚开始的一部分，要坚决一清到底，采取有效措施，集中力量搞清楚，如果需要，可以考虑在某几个单位采取专门形式，在党委领导下工作。如清查小组，党委书记要兼任，不能一般清一清，查一查，搞明白几个人就行了，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问题，不只是形式上的清查，不能手软，半途而废，不了了之。

3. 关于政策问题。最根本的一条线，是敌我性质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性质的问题，搞清楚就比较好处理，两类矛盾混在一起的不好处理，希望大家多作文章，认真分析，加以区别。对清查对象的情况做具体分析，再谈区别。如自觉去的，有行动的（拍了，传了，抄了，参与打、砸、抢行动），这同出于好奇，无意围观，无反革命的目的要区别开；犯了错误的能立即承认交待的同坚持反动立场顽固不化的，要有区别；交（指上交抄来的诗词）的早晚还有区别，根本是交不交。制造的同传播的要区别开来；蓄意制造混乱传播加油添醋的同一般的传播相区别，把参与反革命事件，同幕后的操纵、策划者区别开来，策划者是少数。今天不系统谈，说出来几点。对老反革命要充分注意，对新反革命也要充分注意，对传谣严重的干部子女要问从哪里来的，触及老子的利益也触及这些人的利益，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要做点调查研究，给中央写个报告，用什么形式再考虑一下，就天安门事件写一个报告，就一个专门问题写，同时报市委。一面清理，一面认识。天安门三月十九日开始献花圈，三月二十五日开始有

献给总理的，三十日前后增多，三月二十九日有的送悼词，四月四日～四月五日外地也出现了写悼词，大杂烩，有的走资派本人，走资派子女，流氓阿飞，四月六日抓了90多人，多数是青年人，少数是老年，老反革命少，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四月四日、五日，老反革命拍手“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凡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最不得力的单位送花圈最大、最多。有的相当大的单位将“总理遗言”印了，广为传播，煽动性很强。谣言扰乱思想，有的就发展到反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谣言是去年七、八、九三个月谣言的继续。谣言有国内的，有国外的。

念一个材料 ①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的关系。

②天安门事件是有计划。

③天安门事件后的阶级斗争动向。

材料里有“明祭周，真奠蒋”的话（蒋该死是四月六日死的）。

## （五）迟群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

今天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走资派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走资派的面目是什么？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了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还在走的特点是什么？规律是什么？要不断探讨和认识。毛主席讲：“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段指示的一个要害问题是谈了走资派的问题，谈了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的阶级实质是什么？面目是什么？

（一）在政治上，走资派都是搞修正主义、坚持修正主义的。这就是它的旗帜、纲领。关于纲领，恩格斯讲过，纲领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这是识别一个政党性质的标志，走资派的纲领就是修正主义的纲领，修正马列主义的纲领，竖起修正主义的旗帜。因为它代表阶级的根本利益，根本的目标，资产阶级又在共产党内，所以，走资派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我们常讲的，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

产力的矛盾”，林彪的要设国家主席，搞反革命政变的《571》工程纪要，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两只猫”，都是纲领性的东西，是识别他们的路线的纲领性的东西。他们本质上都是搞修正主义的，不过是每个时期喊出的口号不同而已。再出现一个修正主义的头子，决不会再喊出“三项指示为纲”了，正如邓小平不重提刘少奇、林彪的口号一样，而是提出一个容易迷人的口号。

(二) 在理论上，走资派的理论基础是两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尤其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毛主席说：“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邓小平搞翻案复辟，要倒退，熄灭了吗？没有！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说明没有熄灭。无产阶级不承认阶级斗争熄灭，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也不承认熄灭，两个阶级都不会承认，修正主义讲熄灭是为了欺骗群众，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毛主席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三) 在思想上，走资派都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这是中国的特产。一切搞复辟、倒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乞怜于孔孟之道，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重要思想武器。林彪不读书，不看报，但对孔孟之道颇有研究，我们编过《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林彪要克己复礼，就是倒退，邓小平和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克己复仇了。一切机会主义的头子，搞复辟、倒退都乞怜于孔孟之道，都搞形而上学。历史总要向前发展，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要倒退，只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只能用孔孟之道欺骗群众，毛主席在重要指示中提到要批孔，就是因为邓小平等这些修正主义的头子都是尊孔的，都是反对革命，反对前进的。

(四) 从经济上看，走资派都是竭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因为资产阶级法权是走资派的重要经济基础，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手段。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这个问题不展开讲了。走资派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一部分权力，在一些部门，实际上已改变了所有制的性质，变成资本主义的了。前段讲了不少。如刘少奇，也有邓小平的份，在合作化时，大笔一挥，一下子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六一年提出“三自一包”，正如《决裂》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相当厉害。他们提出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读书做官，还有“三名三高”，无非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加深三大差别。（谢静宜：他们想把资产

阶级法权的名词勾掉，指使胡乔木，讲翻译错了，现在有人揭发了。）胡乔木翻了德文、俄文、英文、法文书，讲是“权力”概念，不是“法权”概念，极力要将“资产阶级法权”勾掉，以取消走资派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有非常恶毒的用心，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在五六年毛主席就指出：有的人为了保持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就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五八年有一场大论战，后来七千人大会上也有争论。去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邓小平就想把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去掉。他们取消它，就是为了想扩大它，他们不是概念上的糊涂，资产阶级法权是他们的命根子。邓小平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物质基础，他盖房子就是。他的房子面积虽然比林彪小一点，但质量远是林彪达不到的，如果不是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反攻，他已住上这所行宫了。邓小平提出：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资产阶级法权如何限制，就是为了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就说明，资产阶级法权是他们的命根子，无产阶级稍一触动，他们就跳出来。大家平时讲的“一座小楼平地起，首长见了心欢喜，从此有了根据地，老婆孩子加女婿”，这段顺口溜，也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小楼起来了，是属于他的，是他的根据地，不仅自己用，而且下代也用，成了命根子。（谢静宜插话：事实上也是如此。北京市房子比较紧，但这些小楼一直没腾出过，他们自己住了，后来是儿子住，孙子住，楼不能腾，调房子也不行。）有同志对我讲，一个走资派住了五六十间房子，我都想不到，我想房租拿得起吗？一问，原来只拿两间房的房租，因为他们的卧室是两间。这些情况不是什么假设，一调查都很清楚。我们不反对领导人住小楼，我们讲的是走资派住的小楼。如果让他们腾，他们不腾，工人不让进来，连一只脚也不让进来。有的人死了，还得有一个名誉，原来是什么“长”，还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待遇，要吗？到台湾去要。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台湾的蒋经国说，大陆已经有国民党的精神党员了。那些文化革命中畏罪自杀的，要什么名誉？只能要个走资派的名誉，叛徒的名誉。我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艰苦奋斗干革命，你们逃脱革命，叛卖革命，还有什么名誉？在一些地区、单位和系统，等级吓死人，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五）从组织上看，走资派必然推行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为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如果没有一条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就无法贯彻，走资派在组织上必然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历次的机主义头

子都是如此。他们必然分裂革命队伍，分裂群众队伍，文化革命最为明显了，刘少奇、邓小平镇压群众，分裂革命队伍。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统统如此，毫不奇怪，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第九次路线斗争我们参加了，对这一点有体会。林彪组织大小舰队，用这样的一些人贯彻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林彪反党集团时，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工作。邓小平也是如此，搞还乡团、复辟派，用“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人，搞复辟，也拼凑黑班子。今日上午我去200号，遇到国防科委的一位领导同志，他讲：去年听到邓小平、张爱萍专讲“老、老、老”，心里甜滋滋的，哪知他们搞的是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一伙不是讲如何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他们是讲“老”中的偏右部分，是“老”中的少数，老干部中大多数是革命家。邓小平一伙破坏毛主席讲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把大批的中、青打下去一大片，而扶植一小部分，这在组织上起了恶劣的破坏作用。那些还乡团、复辟派们，语言够疯狂的，有的叫嚷：“我是走资派”，“走资派造林，造反派砍树”，意思是走资派造的事业，毁在造反派手中。邓小平请胡乔木吃了一次饭，讲了三句话，胡乔木讲只记得两条，有句忘记了，就是三句话：还乡团，复辟派，倒退。邓小平就是让干这种事的人当一、二把手，他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不是很清楚了吗？！当然，在处理的时候要慎重，情况不完全相同，不是清一色，也不是铁板一块，各地区也不平衡。

(六)在策略手段上，走资派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搞两面派；搞阴谋诡计，制造谣言。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批判胡风反党集团时，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他们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推行修正主义货色，历史上不少见。林彪是最典型的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甚至别人歌颂主席的话，他也拿来讲，成了他的，如“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别人讲的，他拿来写了，成了他的，但最后，他竟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经常举的那本语录中，全是两面派的东西，就在那个本上写着，要顺着他，不要顶，他走前，我走后，不要引起他的怀疑，……全是两面派。这些走资派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变换策略和手法。他们的地位本身对人们就有欺骗性，对林彪、邓小平，群众一般不会往坏处想，常常是坏事往好事上看，坏话往好话上想。当然，他们的欺骗是不会持久的，时间一久，群众就会觉得不是味。如朝农的同志来校做报告，他们讲感到不对味，闻到了一股气味，

刘冰他们不痛快了，不想放录音，因为朝农的同志嗅到了右倾翻案风和教育部长周荣鑫放修正主义观点的气味，为这件事在常委会上斗了一个回合，最后刘冰被逼得同意放录音。那次去200号，庆祝党委成立。我去了，讲了三十分钟，代表党委讲话，后来刘冰又代表党委讲话，歇斯底里地喊了半天，是有准备的。一次布置第四季度工作，会上我讲了话，讲三项指示问题调整了一下，刘冰会上也讲了话，他一反常态，对我讲的不表态，他只讲了十月份的工作安排，最后，还临时加了一段，就是在200号讲的一段。他们接过革命的口号，当石头往我们身上扔，还让你不好讲什么。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他们伪装得更加巧妙。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当时大家认为三项指示是毛主席的指示。关于领导班子问题，当时我也讲过“敢字当头”，谁知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讲过最近有好几种提法，在一次东厅常委会上，我讲了：核心问题，是毛主席讲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离开了第一条，就抽掉了“敢”的阶级内容。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接过革命的口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几乎所有的搞修正主义的都造谣、污蔑、欺骗群众，欺骗人民，欺骗党，欺骗毛主席，蛊惑人心。邓小平也是这样的。他造谣造到毛主席头上去了，强加给主席，包括“老九不能走”，传到全国，张爱萍还专门解释，胡说什么这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是爱护知识分子的政策，再次强调不能走。第一，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从未有过“老九”的提法，主席对知识分子作了三种人的分析，这是科学的结论。第二，还“不能走”，如果真是老九，那就要走。他们造谣、污蔑，欺骗群众，只能达到一个目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主席对老干部，有了错误，总是拉一把，在实践中锻炼、考查，可是邓小平不自量，资产阶级野心大暴露，疯狂翻案。

一切走资派还有个特点，就是制造谣言，蛊惑群众。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搞假检讨，自称是“张飞”，实际上是“粗中有细”；陈伯达在庐山制造五大谎言；林彪的“面带三分笑”；邓小平的“永不翻案”。这些，只能看成是反革命的策略。毛主席就对邓小平的“永不翻案”一针见血地指出：“靠不住啊”！邓小平彻底翻案了。还必须注意的是，蒋介石是如何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是用飞机，大炮，宪兵，特务，密探；走资派靠什么？在某种条件下，是可能用飞机、大炮的，但常见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保自己，这比飞机、大炮

还厉害，是反革命的策略。还必须注意：每当革命高潮时，走资派总是用经济压革命，破坏生产，破坏革命。第九次路线斗争我们已遇到过，现在不也是有这种情况吗？虽然是少数地区，但不是个别的。这些，都是走资派的本性，资产阶级的本性，复辟派的本性。特别提一句，邓在受到批判时讲：“去年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是不应该的，但我是光明正大的。”也有人讲邓小平搞修正主义是“明明地搞”。搞修正主义的人从来都是搞阴谋诡计的，如果像上面那样说，只能讲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胡乔木他们抓了那么几个人，他们强加于人，让人写诬告信，在医院里叫一位诗人写信给毛主席，因为这位诗人在延安时毛主席知道他，叫他写信，以引起主席的重视。他们还让一些作家、演员给主席写信。（谢静宜：这位诗人讲有病，住院，不能写，他们那一伙人就说我们给你写，你在最后签个名）。这些信都让写给邓小平，转毛主席。

（七）从国际根源上看，走资派都有国际根源。修正主义的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国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历次大的斗争，机会主义头子都与国际修正主义互相配合，遥相呼应。我党几次大的路线斗争，国际上修正主义者都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引起苏修的反应。林彪垮台了，苏修吹捧他们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党”，“说出了决定性的话”，是“决定性的力量”。这次，苏修对邓小平受批判有一系列的反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希望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合伙搞修正主义，邓垮台，他们感觉得可惜，对他们是惨剧。走资派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列宁关于时代的论断没有变。

（八）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产阶级的存在。毛主席有许多论述，说明资产阶级的存在，这次主席在重要指示中又讲明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有人说，这在经典著作中找不到，那正是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主席讲的最清楚不过了。从大的阶级斗争来看，凡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大的进攻时，资产阶级、一小撮反革命都要跳出来破坏、捣乱，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进行垂死挣扎。联系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说明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没熄灭；说明一小撮阶级敌人心不死，有朝一日就妄图夺权，他们首先搞反革命舆论，在邓小平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前提下造舆论，手段都是一样的，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

指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非常反动、露骨；他们采取反革命的暴力行动，打人，烧车，烧营房，这是什么性质？是反革命的暴力，是反革命性质的问题；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从这点上讲，邓小平就是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总根子，他们打出邓小平的旗号，拥护邓小平，不批走资派，不批邓，这就充分说明了他们的内在联系。他们采用反革命的两手，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其重要的经验，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及在每个领域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如果再出现类似事件，我们就知道如何处理了，不会优柔寡断了，当他们一伙暴徒冲击人大会堂，打人，放火时，有些同志还象文化大革命中对革命群众一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要采取铁的手腕，再出现这种人就坚决镇压，毫不客气，毫不手软。这次清查工作，只有看清了这场斗争的性质，认清邓小平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面目，才能把清查搞好。校内有人不仅传谣，而且还造谣，这就是反革命行为，不斗争，我们就失去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就会迷失方向，一点也不能含糊。控41班武书莲的问题，就是反革命的学生，就要开除学籍、党籍，押送回去，这就体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如果我们软弱无力，就是对广大革命群众的残酷和打击。

（九）由于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存在，国内资产阶级的存在，资产阶级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决定了这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毛主席指出“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每隔几年，搞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总要跳出来向无产阶级进攻，这也是认识走资派的一个重要规律。刘少奇揪出后，有人以为没事了，又出现了林彪，林彪摔死后，又有人以为平安了，又出了邓小平，邓小平被揪出来了，以后呢？要在理论上、实践上做好准备。

（十）一切修正主义者、反革命的破坏、捣乱必然是短命的。毛主席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他们不但是以

失败而告终，而且必然是短命的。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时间虽然短，但危害性大。看了几份关于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材料和照片，很有历史价值。

### 第二个问题，关于深入批邓的几点意见

政治部搞的几点意见，五部分还可以再推敲一下，涉及毛主席指示的归纳的问题。

(1) 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批邓的强大思想武器。如果学习不扎实，就不可能批邓深入持久，有的批了还会翻了，因为武器没学好。如何不厌战，如何越斗越有劲，越斗越敢斗，就要掌握武器。要选学马列、毛主席的其他论述。毛主席这么短的时间，讲了四千多字，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文献，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我们在这个历史时期容易理解他，亲身经历这场斗争应该比较容易理解，条件是好的。

(2) 要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算邓小平的反革命罪行，弄清其极右的实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机会主义的头子几乎都是极右的，某个时期也有采取形左实右的手法。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不是个人对个人的关系，刘冰等人一开始总想缩到一个学校，一个领导班子，甚至少数人的问题上。11月3日后，第一个回合，就是讲对迟群有意见，对迟有意见，最多是提错了，能打成反革命？实际上是革命群众同走资派的斗争。……

十月二十三日，毛主席指定六人开会，其中有邓，我和小谢。开会后，就讲怎么解决，我们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上去后等着批，他们就在学校里动起来了，到处拉人，哪知是批了他们。第二个回合，惠宪钧站起来，大哭，说我是军人，有罪，大家对他热烈鼓掌。随后柳也站起来，边讲边流泪，大家也适当鼓掌。刘冰很被动，也跟着站起来。小谢点了：缩是缩不回去了，老走资派。会开完一回去就要求谈话，先是刘冰，后是惠宪钧、柳一安。现在看来，还不行，他们可以接受犯路线错误，但是一些问题上矛头是针对谁的，他们回避。

对邓小平的罪行，要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批。我们编了两本材料，还有一个大字报选编，在第十四页上有胡乔木的交代：“今年一月十七日，他说……”。要加注：当时中央批评邓小平，不应让胡参加工作，实际上是讲邓不宜参加这项工作。批胡就是批邓。胡乔木历来篡改别人的话，如“灿烂的政治思想之花，……。”

是假的，不是毛主席的。他历来用自己的思想改别人的文章，是政治落实到业务的翻版。

（3）把欺骗性大的画皮再突出地加以揭穿。一般的画皮剥了一剥，有些没剥干净，有的剥了还罩着一层呢！如“三项指示为纲”，具体剖析还不够。……

关于“四个现代化”。他们打着“四化”的旗号，取消社会主义建设。要说清楚，我们还是要搞“四个现代化”，问题在于用什么统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条件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理论上讲不清楚，给人的感觉是邓小平讲的“四化”。

又如邓的经济思想，在许多人那里有欺骗性，认为关心生产，对生产有研究。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是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洋奴买办思想。

所谓“经验”是什么？经验都具有阶级性、实践性，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是造走资派反的经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邓小平的经验是不触动走资派根本利益的经验，他们可以讲长征、抗日战争、打败蒋家王朝，为走资派贴金！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可以讲许多许多，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派，只能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走资派，他们从来是党的同路人，他们要的是复辟、倒退的经验，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维护既得利益的经验。老同志推翻三座大山的经验是宝贵的，尊重他们在毛主席领导下革命的经验，但我们从来反对走资派还在走的经验，为走资派还在走服务的经验。还有哪些画皮？

（4）必须紧密联系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邓，因为批邓绝不是孤立的。毛主席指示中进了“清华的斗争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绝不是个人问题、个人的罪孽，是一层人，是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所决定了的，不以个人主观愿望为转移。有人讲“除了邓就没有走资派的人”，他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但是否马上搞那些人？还是首先坚持批邓大方向。不是孤立的，但要抓住重点，才能解决那些人的问题。其他人同邓有区别，邓在中央，是副主席，党、政、军大权在握，地位、作用都不同。

(5) 把邓的言行同国内外机会主义头子的言行对照，如伯恩施坦、布哈林、托洛茨基、考茨基、陈独秀、刘少奇到林彪。批邓要找到机会主义头子的共性和特点，要花费时间和精力。

(6) 同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联系批邓。邓的代表性，就是代表了没落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代表了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认识到这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危害性、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性、疯狂性、欺骗性。绝不是说几句错话的问题，没有什么恶果的问题，他们马上要占电台，向全国呼吁，甚至他们要同苏修相勾结。要看到这一事件的危险性，也就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危险性，难道非要到人头落地时才能看到？

(7) 同批孔结合起来。孔孟之道是邓搞复辟、倒退的思想根源。毛主席提到的有关著作要看，还有有关批林批孔的文章。

(8) 结合纪念《五·一六》通知十周年批邓。《五·一六》通知中尖锐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通知发出后，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宣传报道上将有一个大规模的行动，发表重要文章，宣传、报道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及时的，必要的，这是好的时机，难得的时机。

(9) 在批邓中，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真吸取教益。毛主席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条路线，一种观点……”一个阶级、政党、团体要注意，个人也要注意。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同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同林彪搞政变的斗争吸取了什么经验？同邓这个声称“永不翻案”的人斗争吸取什么经验？他在文化革命中被揪出，后进桃园，在桃园中检讨表示永不翻案，后出了桃园，一出来就翻案。他复辟倒退的速度比我们预料的要快得多。这又吸取什么经验？大家都要认真总结，好好研究一下。有的人讲总结了两个字“住院”，那是走资派们的总结。但我们呢？他们有的人是政治病，一有重大斗争，医院床位就紧张，历来如此。现在，深入批邓还刚刚开始，因为运动是群众性的，要好好发动，走资派不能让他们漏了网。

(10) 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两面派的丑恶嘴脸，必须结合邓是如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好好揭一下。那次“3.26”给政治局汇报时，讲得比较

约束，邓输了理，能讲什么呢？这个头子的本性难改，要进一步戳穿他搞阴谋诡计。

(11) 要使批邓的问题，做到人人都知道。要广泛发动群众，毛主席多次讲：“要使人民都知道”，让人人都知道邓是什么人，知道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只有广泛发动群众，家喻户晓，才能使批邓深入下去。

(12) 要及时总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及时宣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带来的巨大变化，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教学、科研、生产搞上去，这是合乎逻辑地搞上去的，这样才能使批邓深入持久下去。

每个环节都要抓紧，不能到年终紧张，前松后紧要逐步改变，要紧但不能太累。开门办学中问题还不少呢？一个点一个点地抓好不好？客观上不管，我们主观上是否这样？听说有一个单位，我们想去一趟。开门办学是必由之路、广阔的道路，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我们要打破原有的体系，坚持开门办学的方向。社会上面的运动问题，会有不平衡，要处理好。政治活动、业务学习也要处理好。讲的例子不用传达。

## (六) 迟群同机械系毕业班

### 要求去农村、边疆的部分学员座谈时的讲话（摘录）

（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日）

朝农的经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经验，从长远看，这是必由之路，说长远也不要多长吧。

你们走这条道路也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既然这是新生事物，就会遇到传统势力的阻挠，阶级敌人的破坏。所以作为一个革命派讲，应看到面前还有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矛盾，就在你这小人物的身上，默默无闻的岗位上。

我们的教训往往是一边在讲毛主席的指示，一边又上人家的当。阶级斗争是纲，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就讲，主席二十多年来一再讲，承认它要在理论上实践上非常清醒地看到它，实践它才行。历史上许多事非常巧合，但形式上会变化，敌人不会愚蠢到今天还说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说布哈林那样的话，或者林彪的那个最、最、最，也不会说邓小平那样的话，但正因为这

些已被批判过了，他们就会用你感觉不到的形式让你上当，越是破产失败，他们越是疯狂反抗，要不然路线斗争到邓小平就停止了，不会的，仍然会有斗争，会有别的机会主义头子。在你们的道路上会遇到这些问题，而且会首先发现它。群众高于领导，去年比较早抵制三项指示为纲的是贫下中农同志，东北的一个煤矿、小新庄。他们也遇到些麻烦事，刮东风时，什么人都去了，报社的，出版社的，县里的，一百多人的队伍。刮西风时都撤了，剩下一个人，县里的，是观察的，小靳庄的同志说一个也不要了，给轰走吧！那时他们受的压力我知道，可是使不上劲呀！看到一些小条，出版物提到小靳庄就不能出版，小靳庄的名字到处都要拿下来，压力很大，他们顶住了，你们不采我们自己干，一直顶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他们内部团结，就是顶着干，这一年高产了，过了长江。原来水不好，又打了一眼好井，现在有二、三口甜水井了，喷灌也有了，盖了好多新房，自己盖的，一个大队办这么多事，了不起。他们不搞邪门歪道的，工分值很高，一个劳动日一元三、四角，但社员只拿一元，其他积累，办公共事业；粮食也多，一年能有七、八个月吃面粉，加上大米和其他，很好的。它是大队为核算单位，集体种自留地，社员发菜票，到队里领菜，至少拔掉了自留地的私有观念吧！所以下了班有空上夜校，唱样板戏，他们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邓小平就要整他们。你作为革命者，也会遇到这些问题的。

去年，有些同志跟我讲：“迟群同志，周部长讲话为什么不传达？”我的感情很复杂。我也不知周荣鑫为什么那么凶，邓也注意我，迟群到朝农去了，参加大寨会议去了，都知道。我算什么？！周搞了很多鬼名堂。我吃了安眠药碰了点指甲，周来看我，说是奉命来看你。后来周患心脏病，我也去看了他，我说我可不是奉命来看你的，觉得应该来看你，周说“你是壮年今后靠你了，我说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后来，教育部成立不到四个月，他提出要总结两个月，实际上是要翻过去五年的案。我注意了他的每一期简报，凡是反对主席路线的，他都表扬。周那些讲话，我不知道，同学问我，以为我知道，我不知道。后来有个教师问我，我问他我们学校属谁领导？他说当然是中央，我说不对，我们属北京市领导，市委不叫我们传达，我们不传达，以后我都这样回答。北京市科教组也知道了。后来我找来看了一些，感到很不像话。

你们以后也可能碰到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辨别是非，谁是马克思主义，谁是修正主义，很吃力的。我经历的几次路线斗争，高、饶、彭、黄都不太有亲身感受，刘少奇这次体会稍深一些，确实非挖出来不可。林彪这次，就经历了，讲的话几乎对自己有影响的，……邓小平这次开始也缺少准备。74年秋我结束了在国防科委的常委工作，75年春就刮风了，我们同邓接触较少，没有准备，同时又有新的特点，到年中，有些感觉，但想得也不多。开始对有些错误，有些错事，也往好处想，但事情多了，量变引起质变，引起了后厅会上的那段话（几个“敢”和接班人五条的问题），觉得不妙，提醒自己保持距离，但也没想太多……

以后怎样？把历次路线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准备新的斗争，路线斗争一点不含糊的，残酷无情的。主席讲七、八年来一次，历史的总结，现在仍然如此，决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都是阶级关系，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邓小平等人都没有来往，为什么那么恨我，我同工农兵学员总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情，谁要说你们坏话那是不行的，人与人的感情还是阶级感情，路线感情。

## （七）迟群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管理也是社教，学技术，首先是路线问题，要弄清路线。划等号作普通劳动者。另一方面，主席提倡我们的干部要读马列的书，革命的书，批判机会主义头子不读书、不看报。毛主席也一贯提倡我们多增加一些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总得学点文化，多懂些知识，不能以“不懂”自居。无产阶级需要培养自己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否应当认真地学点东西呢？当然，蒋南翔的垮台绝不是因为业务上的无知，不是因为他对清华55个专业不懂而垮台，而是路线上垮的台。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多懂点知识好，要尽量学点知识，但也不会成为全校55个专业的专家，应该懂一点，方向对头了，学问越多越好。大老粗掺砂子，不懂教育革命能行吗？

当前，主要是批邓，是批走资派，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这个，人家要翻案。发表主席的批示，（按：指中发〔76〕3号文件，主席64年关于社教的批示）当然是打招呼，要加深对主席早在十几年前指示的认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思想不是主席突然提出来的，而是早就提出来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主席早就发现了。看一件事情要从多方面来看，我是说有一定条件的，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多学习点东西，知识得知道一点。我们看到的主席的指示，包括7·27以来的主席的指示，主席希望我们增加一点知识，懂英文更好，没有一点文化知识也难啊！有的“大官”也不是原来就“洋”，一开始也是土包子，洋起来比洋的还洋。我们大家要努力学习，这当中有个目的，也有个方法。

批邓还只能说仅仅是开始，许多基本问题，邓小平究竟是哪些问题，还说不太清楚，我自己就是这样，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有时讲十条，有时讲八条，就说明不是很清楚。但不能因为我不清楚，就不去讲，不去宣传了，相反，要大量讲、宣传。讲错了大家纠正，讲对了，大家交流，互相学习。

我们现在看到党内一批批反党的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派们倒下去了，他们提供的教训是什么？如果我们放松了改造，不学马列，不按主席指示办，就会和他们一样走到反面，不是谦虚，是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规律。认识到这一点，经常警惕，总比盲目好。最近组织机关下去，开会，下去的就有收获，要有固定的联系点，经常下去，从书记到机关工作人员。

暑假有些同学要回去了，要加强教育，各地不平衡、不一样，会遇到各种问题，有的比去年七、八、九还七、八、九，回去也是开门办学，带回来问题天就坍了？要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员和群众两个大多数，坚信党的各级领导，没什么了不起，是开门办学，只是形式不同就是了。

主席的指示，我理解，就是为了深入批邓，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资产阶级在党内，说明走资派还在走的问题。斯大林犯了大错误，就是没有摸到这个规律，没有总结出这些思想，以致造成现在这样的惨剧。

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开拓处女地的急先锋，勃列日涅夫用农业把赫鲁晓夫赶下去，但他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

我听到、看到的，想印点材料给大家，让大家独立思考，给原始材料，自己去分析，判断。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在教育上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

的？提供点背景、历史材料，从这里理解主席的教育思想，不然顶不住啊！为什么右倾翻案风一来顶不住？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世界观、立场问题，也就是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没学好。研究研究为什么风一来就顶不住？教育部也在研究。有个周荣鑫，他就是邓小平营垒的人，怎么顶，但是有顶的。学习主席指示，要解决根本的立场、世界观问题。走资派口口声声讲不要跟人要跟线，正是他们在大搞因人划线，甚至整到群众头上，称“走资兵”。主席历来指示很清楚，每次运动，都不是指向群众，而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搞走资派。凡是搞了群众的地方，领导就都有点问题，这是讲大的运动。当然，清查反革命，极个别人，那已不是群众，是另外一个问题。主席指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不是讲的民主人士，他们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革命对象，斗争对象，当然，不是我们依靠的力量，当然，是否都罢官了？不是，还有走资派还在走，斗争是复杂的，有的就停职反省了，当什么“长”的，但有的还在走。社会上搞臭了的地主、资本家比较容易识别，比较臭，反复认识多年了。四清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没理解，文化革命中 16 条也提出了，我们没完全理解，林彪事件出来后，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它，当时注意力放在死党、上了贼船的。后来批《571》工程纪要，批孔孟之道，林的军事路线，这还没完，又讲批林批孔。可这次运动，不是查死党的形式，而是讲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不是不理解吗？再来个 64 年的社教指示。

地富反坏右那些人当然是破坏因素，专政对象，但是我国、党内，能决定国家命运和政权性质的，最危险的，是党内的走资派，走资派比地富反坏右更具有危险性，要看到，欺骗性越大，伪装越隐蔽，危险性就越大。邓小平讲三项指示为纲，讲 9 号文件 后的变化（当然，9 号文件不能一下子否定），但他讲的是 9 号文件前文化革命以来一团糟，是他上台后才改变的。邓小平这个机会主义头子，使用了历次机会主义头子全部的反革命政治经验。

邓还有一个手法。讲主席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是我行。讲这讲那都要整顿，说向主席报告，主席同意了。邓小平为何欺骗性大？因为他是在党内，掌握着党、政、军大权。

考茨基、伯恩斯坦这些机会主义头子在马克思还在时，尽管修正马列主义，但口头上还打着拥护。而我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邓小平在毛主席健在时，就恶毒攻击，这个历史经验要好好总结。

托洛茨基是臭狗屎，但他差一点成了列宁的接班人，后来列宁揭露了他，后来是斯大林解决了布哈林的问题。我讲的意思是怎样理解资产阶级在党内？要抓住实质研究。他们有权后，权力就成为资本，改变了政权性质，经济基础算个啥？那完全是商品关系。他可以不解散公社，他不那样直接作，不然农民就很容易发现，但直接同他们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放过的。他不用提包产到户，只要把法权用在这里，他们占用了许多劳动成果，他们给了多少钱？这不是吸工人血吗？他完全用党给的权力贪污来的。他并没有改变工厂、生产队的所有制的基本形式，但问题是，商品却源源不断装入口袋。正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样，不改苏维埃的名字，打着列宁的旗帜，却完全蜕化成为官僚垄断阶级。林彪的毛家湾的房子设计比起邓来，还是小巫见大巫，虽然面积小。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现在一联系实际，他们就紧张，害怕，因此，他们就是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

阶级烙印问题，主席讲了阶级社会的阶级烙印问题，有个问题，资产阶级在党内，有没有一个烙印问题？到了农村，贫下中农就给介绍，别走错了门，政策界线非常清楚。现在，到工厂、学校、机关中会不会有人告诉你：别走错了，走到走资派的房间中去，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可主席讲走资派他们是我们斗争对象，比十几年来批臭了的那些人更为危险。

我们干了几件得罪人心的事：如干部子弟用车接送上大学的问题，我们抵制了，这实际上是一场同走资派的斗争。我对革命派讲，对自己的子女的教育方法不对，但当时我们还不太理解。去年，我才知道这件事引起了一场大的风波，他们对子女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一些革命的老同志讲，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头别在裤带上干革命，儿子还不能坐汽车？岂不知，他这样做，正是在葬送他为之流血的崇高的革命事业。

走资派子女有没有一个阶级烙印问题？为什么这样保爹保妈？从前讲“一年土，二年洋……”这同讲“我爸爸是某某部长、司令、政委，是那么大的官，管着你”是一样的。对老同志，我们尊重他们的革命历史、革命经验，但如果他不

革命了，反对革命了，我们就要坚决斗争。我们的主席是最老的了，但他支持小人物、小官、青年人、造反派。

认识了这些，就能清楚，如何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所以我说要盯着领导，不要总把眼睛盯着群众。要一级盯一级，群众盯支部，支部盯总支，总支盯党委，党委盯校党委，我们要盯着市委、教育部、中央。在学校，重点是盯校党委。前年 x x x、x x x，去年刘冰等4人都在校党委。眼要盯住领导，不要盯在群众头上。在学校，大家盯住我。我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这次下点，联系教学班，就是为了向群众学习，查走资派，寻找走资派。这样就给各级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求，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加强革命化，加强思想改造，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抓住世界观的改造，强调一个斗字，“八亿人不斗行吗”？“斗争哲学”，“老顶”，就要敢斗，要有马列主义，不然不清楚，辨别不了真假马列主义，而且还要求有政策、策略水平，不然会导致方向上的失败。要认识党内资产阶级除去邓小平，还有一层人，但同邓小平有区别，区别只在于一个在中央，一个不在中央，一个全局和局部的区别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邓小平这个人和他的路线、策略、手段要进行解剖、认识。他们①制造反革命谣言，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②抛出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③组织上破坏老中青三结合，扶植、网罗、重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有的“九次”犯了那么大错误，邓一上台，连升几级。④大搞全面整顿，对文化大革命疯狂地翻案倒算，⑤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⑥鼓吹洋奴买办思想，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还有十七年和民主革命中的老账。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手法是造谣。他们无中生有强加给主席。邓小平说什么“从军队到地方都是整顿……，我报告主席了，主席同意了。”这是造谣。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全面整顿不是整到文化大革命头上了，主席怎么会赞成呢？

主席对《水浒》早就有研究，邓小平造谣说纯属是文艺评论，他就这样背着主席强加给主席。

我希望大家不要在外面讲，知道就行了。邓小平造谣还多着呢，包括《创业》的评论，《海霞》主席的批示问题，他们是发动人告状的问题，我讲的不是电影的缺点、错误的问题。他们要达到的目的，绝不是让文艺有更大的革命，绝不只是打倒一个电影，一个文化部，而是要借此打倒一些人，分裂党中央，他们干这

种事，用毛主席的指示，达到个人的目的，任意扩大传达范围，不胫而走，弄得面目全非。“老九不能走”，不存在这个问题，也是强加给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是强加给主席的，主席根本看都没看，结果来了一个“主席已圈阅”。再有就是发动各界人士，包括有影响的人士，写诬告信，分裂党中央，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在教育、文化、卫生、科技、新闻界，全都插了手。一些完全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的问题，却发动人告状。甚至给一个作家找人代写诬告信。还通过各种渠道，自己的子女、亲属，散布了大量反动的政治谣言。刘冰等人听了造江青同志的许多谣言，有的就是根据政治谣言作为依据判断政治形势的。教育部、组织部，李琦他们串通好了，5.1、10.1不让我的名字登报，5月2日还让我到教育部开会，要出我的洋相，我还是去了。邓小平从73年就开始记清华的账，74年恨得咬牙切齿。

政治谣言大部分是从“大官”那里来的，容易使人相信，有的是经过一些反革命添枝加叶，确有一个小舰队。清华也不简单，有些谣言就是清华的，是清华土造的。总根子在上面。我个人意见，天安门事件并未完全查清，因为大官们还没有讲清楚这个问题。乱透了的地方才能真正锻炼左派，左派才能掌权。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小说反党，用自我批评的方法反党也是一大发明。有的人给主席写信，说犯了滔天大罪，正如xx讲的。不管他的名字在报上登得多大，在左派心目中，他一钱不值。搞修正主义的一套总是要清算的。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全局，是策略。他们把马列、主席的话组织起来，完全为自己服务，科学院汇报提纲第一稿，讲了科研六大关系，后来第四稿变成十条语录，正如主席讲的（致江青的信），目前还没有做到：左派用主席的另外一些话组织起来把右派打倒，斗争正在开始，要继续努力。

辽宁的“三来三去”，方向是对的，要害问题是对着干的，至于具体做法上，允许一部分由国家分配，留个尾巴，包括到艰苦的地方去。学习、批判、搞好教育革命、工作要扎实。开门办学是必由之路，措施上要留有余地，不要绝对化。工作要扎实，不要给留空子，防止钻空子。要强调无产阶级的乐观主义。为什么谣言一来就有人听信？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把队伍中的不坚定者拉出去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悲观，马列必胜，修正主义必败，尽管有曲折，但共产主义必胜。

建立班子，要考虑能顶风的班子。

走资派就是吸血鬼。清华干部队伍是不错的，清华储存了相当一批干部，我们现在如果要拉走一些干部也可以，确实后继有人，我感到骄傲，是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jiyi.bjb@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